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在全球化调整中深化亚洲区域合作 曾培炎 (005)

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国改革 40 年的回顾和思考 高尚全 (008)

新形势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再思考 范恒山 (029)

2017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简析 许宪春 (043)

· 国际经济 ·

中国软件出口：现状趋势与战略机遇 王晓红 (054)

推进沿边重点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研究
——以瑞丽经验为例 周先平 朱新蓉 张健 邱龙宇 (072)

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
——基于 2010—2015 年相关数据与引力模型分析
于 倩 王雁芸 (085)

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四地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经验总结及路径探索
——基于贸易通关便利化视角 王珍珍 甘雨娇 (100)

• 智库信息 •

“一带一路”建设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

——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圆桌会议综述一 夏友仁 (113)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和治理注入新活力与正能量

——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圆桌会议综述二 任海平 (117)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0)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6)



CONTENTS

Deepening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djustment of globalization	<i>Zeng Peiyan</i> (005)
Reform: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forty years of China’s reform	<i>Gao Shangquan</i> (008)
Reconsideration of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Fan Hengshan</i> (029)
Brief analysis of economic oper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i>Xu Xianchun</i> (043)
Chinese software exports: status, trend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Wang Xiaohong</i> (054)
A study on promoting cross – border use of RMB in key areas along the border	
<i>Zhou Xianping, Zhu Xinrong, Zhang Jian, and Qiu Longyu</i>	(072)
Border effect of sub –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five provinces	
(regions) of Northwest China and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Based on relevant data and gravity model analysis from 2010 to 2015	
	<i>Yu Qian and Wang Yanyun</i> (085)
Innovation of trade supervision system: experience summarization and route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FTA in four areas	
—Based on the view of trade facilitation	<i>Wang Zhenzhen and Gan Yujiao</i> (100)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s a new opportunity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Xia Youren</i> (11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jects new vitality and positive energy in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Ren Haiping</i> (117)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在全球化调整中深化亚洲区域合作^{*}

曾培炎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但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亚洲经济将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全球化是几十年来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亚洲经济体先后创造了几轮“亚洲经济奇迹”。经济全球化作为历史趋势不会逆转或终结，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是未来亚洲适应全球化调整、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新思路、新动力，尤其为打造东亚区域合作升级版插上一对有力助推的翅膀。

关键词：全球化 亚洲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

前些年，谈论国际经济形势使用最多的关键词是“复苏”。当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主要经济体大多实现增长，国际贸易增速有望改变连续6年低于全球生产总值（GDP）增速的状态。但2016年以来，“去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成为新的热词。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越来越多的反自由贸易案例，给经济复苏带来了不确定性，亚洲经济将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应该说，全球化是几十年来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亚洲经济体先后创造了几轮“亚洲经济奇迹”。不可否认，全球化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至今，人们

^{*} 本文为作者在博鳌亚洲论坛曼谷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仍历历在目，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都是当年这场风暴的重灾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亚洲国家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博鳌亚洲论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经济全球化作为历史趋势不会逆转或终结。当前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不全是全球化带来的，也不可能通过逆全球化得到彻底解决。亚洲各国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出发，都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应当更加理性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趋利避害，找到合适的政策均衡点。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是未来亚洲适应全球化调整、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当今世界，北美、欧洲和东亚是全球经济三大板块，各自拥有 20 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而东亚是三大板块中最活跃的一极。近 30 年来，东亚经济年均增速在 8% 左右，近 5 年来也保持在 5% 左右，是欧洲和北美乃至全球经济增速的 2 倍甚至更多。而东亚经济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多年来区域合作的顺利开展。2016 年是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元年，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10+1”“10+3”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取得进展。但近年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外部需求下降，经贸制度安排出现碎片化，地区安全风险上升，各国面临结构转型阵痛，内顾倾向有所抬头，亚洲各经济体不同程度受到了挑战。

在此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3 年多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不久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取得丰硕成果。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致力于建设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东亚各国特别是东盟国家，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是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历史上曾对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将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新思路、新动力，尤其为打造东亚区域合作升级版插上一对有力助推的翅膀。

第一，助推区域国家发展规划升级。“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提供了共谋发展的大平台。印尼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构想，泰国提出了“泰国 4.0”和“东部经济走廊战略”，其他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的发展规划，着力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将这些规划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有利于更好地形成合力，助推各自目标的实现。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平台，各国发展规划还可以延伸衔接全球，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效果。

第二，助推区域统一大市场升级。“一带一路”建设将巩固提升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依存性，进一步激发释放东亚 22 亿人口、20 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形成的内需市场潜力。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多个经济走廊建设，东亚与中亚、南亚、西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将更

加紧密，进而更有效地开拓欧洲、非洲等市场，整个市场空间规模扩大，可以直接面向全球 65%以上的人口。

第三，助推基础设施联通水平升级。亚洲地区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不到北美和欧洲的 1/5，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电力、电网、通信等能力提升空间很大。按照“一带一路”倡议设想，全面升级的亚欧班列、油气管道、海上通道、空中丝路等交通网络，可以显著降低远距跨区的物流成本，更方便地通达远端市场。长期以来，本地区一些国家还存在交通不畅的困扰，若能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通海陆空通道，将大幅提升开放度和发展后劲。

第四，助推贸易投资制度安排升级。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相应的制度软环境。亚洲各国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差异较大。“一带一路”建设提倡“包容发展、共商互利”的原则，争取最大公约数，有利于构建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区域制度安排。东亚地区应本着积极稳妥的态度，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尽早落地，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尽早达成。还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关经贸安排，推动与其他地区商谈跨区域经贸协定。

第五，助推金融服务及安全体系升级。长期以来，亚洲地区发展主要依靠域外资金，融资成本高，资金来源不稳定，而且容易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一带一路”建设注重发挥多边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作用，为建设周期长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有力支撑。亚开行、亚投行都将基础设施作为未来贷款的重点方向。中国决定向丝路基金增资 1000 亿元人民币，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达 3000 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专项贷款约为 38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建设还将支持建立区域信用评级体系，完善跨境资本监管，增加货币互换和本币交易，共同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

当今时代，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东转移。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亚洲地区应继续走在区域合作的前沿，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新机遇，提升区域竞争力，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经济全球化，创造新一轮辉煌的亚洲发展奇迹。

责任编辑：李蕊

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国改革 40 年的回顾和思考

高尚全

摘要：在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迎来 4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历经“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四个阶段。改革推动了整个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的五大转变，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仍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法治政府建设等诸多挑战，而近 40 年实践得来的经验和启示是我们继续取得改革开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胜利的重要法宝。

关键词：改革四十年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全面深化改革

作者简介：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 40 年的光辉岁月。40 年来，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我们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我们从无到有构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断进行完善，我们扭转了文革的动荡混乱走向依法治国并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中国的改革

^{*} 本文为“改革开放 40 年”征文。

事业当然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的航程历经千难万险，改革的开拓却从未停歇。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事业迈入了新的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虽然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充满挑战，但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正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 40 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即将开启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 40 年改革的基本历程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四个阶段。

（一）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1978—1991 年）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地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财税体制方面，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流通体制方面，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培育农产品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1980 年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随着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

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同时，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开放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开辟了一批经济开放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2 年）

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宏观管理体制方面，1994 年提出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方案，确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得到加强。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施“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三是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发展，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四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2003—2011 年）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 2020 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了投资体制，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土地、劳动力、

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四）“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12 年至今）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非常明确地表明，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与此同时，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如前所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为此成立了 7 个专项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分解为 336 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 37 次会议，会议内容囊括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过去的改革当中一直难以解决甚至回避的诸多议题，并出台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方案，彰显了新的领导集体直面改革难点的勇气。通过“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二、中国 40 年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突出矛盾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40 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体现在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一）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响依旧强大。“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发展进步仍然受到禁锢。1978 年 5 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

（二）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今天，我们已经彻底告别了由国家计划统配社会资源的时代，市场繁荣、产品丰富。绝大多数人认为，遵循价值规律、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极为不易，是改革开放曾经走过的最艰难的历程，也是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就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农产品日渐丰富，但城市经济因延续计划管理体制未见大的起色。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后，经过不懈探索，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发展构建了最为重要的制度基础，使价值规律深入到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微观单元发挥作用，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活力、发展热情。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五个主要环节：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要求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其后 10 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以这五项工作为中心，推动了我国的发展进步。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认可，也是使市场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里程碑。无疑，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各项工作中长期存在一种“左”的偏见，盲目自信，唯我独尊，

排斥国外好的做法和经验，使我国经济管理、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等很多方面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初，国务院决定设立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按照市场取向进行改革探索。1984年，国务院决定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1985年，中央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成为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推进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吸收利用外资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转变，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经济总量在2011年度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二位，并连续20余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为使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中央政府部门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使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与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相一致。一些长期难以突破的顽疾在这个过程中被顺利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得到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迸发出更大活力。

（四）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就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依法治国的要求更加迫

切，因为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正是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并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1999 年 3 月，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 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文革”那样的政治混乱，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下顺利发展。法治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主体的微观交易行为，比如商业谈判、签订契约、解决纠纷等，无不需要法治的规范。市场交易遵循成熟的法律制度，纠纷能在良善的司法体系中获得合理解决，市场主体就会产生稳定的预期，就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市场经济的活力就会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必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非常繁重而艰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

（五）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

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改革 40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 1978 年到 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 元提高到 33616 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 134 元提高到 12363 元。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乡家庭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 1978 年的 57.5% 和 67.7% 下降到 2016 年的 29.3% 和 32.2%，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居民预期寿命从 1981 年的 67.8 岁提高到 2014 年的 75 岁。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到 2030 年，“人民身体素质明显增强，2030 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0 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文盲率从 1982 年的 22.8% 下降到目前的 4.1%，每年有数百万高等院校毕业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 40 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的健康。

二是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国的企业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 11.6%，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 30% 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三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将这一理念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最高层次，中央深改办也专门出台了各项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凡此种种，体现了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畅通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

三、中国 40 年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立足基本国情，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借鉴有益经验，不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完善，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我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

（一）在 40 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第一，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的进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典型的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五大、十六大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从“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回顾中国 40 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的发挥。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并倒逼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市场化带来的劳动积极性、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的创新创业的活力无限焕发，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为国家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 50% 以上。在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

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定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定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的制定更加科学，但是无法解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问题。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才能产生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所形成的数据和联网才有意义，否则何以持续发展繁荣？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不动摇。

第三，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第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二）40 年的改革进程带给我们不仅是改革方法论上的经验，也在价值观方面给予启示

第一，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了权力的巩固而改革。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是和谐社会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在改革的初始动机上，邓小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问题。1978 年 3 月 10 日，邓小平同志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 年只搞了 2300 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 年 9 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 20 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是中央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而推进改革的强有力的信号。在地方上，中央定调前“包产到户”这样的改革举措在初始阶段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像万里等当时的地方领导人，都以无畏的胆魄和对人民的感情毅然作出了这些改革措施背书的抉择。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同时注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努力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达到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无限的动力和创造力，改革就能够依靠人民。事实证明，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就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各方面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又要充分扩大社会参与度。改革的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我们的改革始终注重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导、积极推动与充分发挥群众改革创新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坚守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什么是市场？最通俗地讲，市场就是人与人交换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抛开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运动轨迹，市场静态的基础就是不同产权的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因

为分属不同产权，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为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交易越活跃，则市场越繁荣。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产权的主体之间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会造成重则强取豪夺，轻则打击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都将使生产被破坏，交易关系难以持续。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正确的认识，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谁来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理所当然要靠政府保证。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参与竞争；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就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就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交易主体之间难免发生各种纠纷，而依据法律可预见的、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能够消除矛盾，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企业之间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力还受到腐败势力的压榨，难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时也是对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求的具体落实。

四、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

（一）十八大以来改革的重要进展和突破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议》，制定了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以全面推进改革的《决议》为基础，中国改革事业在战略布局、改革难点以及市场地位上都获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乃至突破。这些进展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获得重大突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就是从

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逐渐变革为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从而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市场的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这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和完善改革的过程，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 20 多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央认为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做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政府定价范围进一步缩小。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我国价格市场程度进行的测算，2012—2016 年，我国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为 94.33%、94.68%、95.16%、96.45% 和 97.01%。其中，2016 年比 2012 年累计提高 2.68 个百分点，而 2016、2015、2014 年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比上年提高 0.56、1.29 和 0.48 个百分点，明显大于 2013 年 0.35 个百分点的水平，反映出近三年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和挑战。世界经济严重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新的洗牌。与此同时，国内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继续进行深刻地调整和改革。中国经济面临着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和调结构的两难困境。在这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央及时作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决定和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开启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形态发展的结构之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让绝对过剩的产能退烧去热；去杠杆，消除瘀堵虚肿，让资金血脉畅行；去库存，消除困扰发展的炎症病痛；降成本，减税降费，为企业休养生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补短板，提升基础设施、加强公共服务、培育发展新产业，让经济社会发展强身健体。2016 年，化解煤炭产能超过 2.9 亿吨，压减粗钢产能超过 6500 万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着力点，就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结构之

变的关键。十八大以来，国务院破除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国务院各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618 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 283 项。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接近 90%。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 87%，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得到了有效落实。极大地提升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第三，国家政治体制顶层设计适应了新的要求、获得新的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长期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背景下，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对过去领导改革的行政部门本身进行改革，这就对改革领导者的决策效能和执行力提出了重大考验。为了推进改革，中央先是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力提升了改革的决策效能，使过去总是被回避的改革议题，比如户籍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等等，能够集中力量摆脱各种利益羁绊获得正面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高还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上。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持续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而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全面深化改革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出了通过各项制度建设，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总目标。2014 年，党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每年安排国务院领导同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到会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专题询问更加规范化、机制化和常态化。2015 年 6 月，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转发了《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探索建立代表履职激励机制”等具体措施，为各地积极开展县乡人大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创新与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也获得很大进步。2015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七种协商民主渠道，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系统谋划了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通过以上种种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日新月异。

第四，反腐倡廉效果显著，依法治国有效推进。进一步推进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需要廉洁奉公高效的党员和公务员队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查处，破除了过去一段时间党纪国法松懈腐败滋生的各种潜规则，横扫了贪腐猖獗的不良风气，党纪国法为之肃然而振。中央对于滥权渎职的腐败分子，上至中央常委，下至乡村干部，不管是军方大将，还是地方大员，但凡触犯党纪国法，均依法予以严惩。坚

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这样大规模的反腐浪潮，激浊扬清，民心得以振奋，党风得以清正，使全体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掌握权力行使权力的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地规范行使权力、自觉避免滥权渎职行为，这为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肃清腐败的基础上，中央通过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从制度建设上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2014 年 10 月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党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的庄严承诺和有效推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真正成长为一个执政党。在新一轮改革的起点上，如何处理改革和立法的复杂关系尤显重要。改革必须尊重法律的权威，在 2014 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这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品格。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先立后破，在法治的轨道上来推进改革，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改革的成本，同时也分担改革的风险。在司法层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明确提出了改革路径：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这些改革，有效促进了司法公正，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啃下这块硬骨头也是十八大以来改革的重大突破。

第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创造绿色环境打下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全面、清晰地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后的又一大创新；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密集推出，体现了党遵循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期待、彰显执政担当。2015 年 9 月 22 日，被誉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四梁八柱”的关键性文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被锁定在八项制度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引人瞩目地提出了要树立的六个重大理念——树立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体现党以先进理念引领改革，割裂已经固化的部门利益，通过高层面的协调机制将各类生态资源纳入统一治理的框架之中。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制定修改的法律就有十几部之多。当今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构建起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两份改革文件使领导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第一次进入到了生态领域；《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推出后中央环保督察组相继进入 23 个省区市，问责超过万人。为转变发展观念、打破“唯 GDP 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公布，生态责任成为政绩考核的必考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形成了全面铺开、点上突破、上下互动、统筹推进的良好局面。2013—2016 年，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从 3 个增加到了 84 个；2016 年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 78.8%，同比提高了 2.1 个百分点，城市颗粒物浓度和重污染天数持续下降；2016 年，全国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同比上升 3.2 个百分点；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长期困扰我国的生态问题得到了初步的扭转。

第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为增强国防能力、实现国防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支军队，只有勇于变革，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主持新一届中央军委第一次常务会议时就鲜明提出：始终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前进，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夺取军事竞争主动权。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经习近平提议，党中央决定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盘子，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单独作为一个部分写进全会《决定》。2015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式审定通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军事上落后会被动挨打，而政治上蜕变则不打自垮。改革强军，首先要拨乱反正，激浊扬清。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一针见血指出了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随后掀起军队反腐风暴，郭伯雄、徐才厚等“大老虎”纷纷落马。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人民军队，也为人民军队改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千头万绪，必须牵住牛鼻子。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了打破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上。把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指挥、建设、管理、监督等路径更加清晰，决策、规划、执行、评估等职能配置更加合理，更加聚焦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职能，使军委机关真正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成立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建立健全军委、战区两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了平战一体、常态

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重塑了人民军队的指挥架构，使人民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大幅压减了陆军规模，陆军占全军总员额的比例降到了 50% 以下；以原 18 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 13 个集团军，调整优化了结构布局。十八大以来，我军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领导管理体制实现历史性变革；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取得实质性突破；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实现体系性重塑；联勤保障体制改革完成关键跨越；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改革迈出坚实步伐。可以展望，未来改革必将取得更大的丰硕成果，我们的“强军梦”必将实现。

第七，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2014 年早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思路、主要任务和政策保障，细化为 104 个重要改革举措及工作项目，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布置了任务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更好地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2015 年 10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2014 年 12 月，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随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把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城乡规划，开启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在互联网时代，整个舆论生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2014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随后，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 年 5 月，经中央批准印发《关于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作出全面系统部署，网络内容建设全面展开。同年 6 月，《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体制改革攻坚克难、全面发力，一些重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重点改革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文化活力迸发，文化魅力生长。

（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改革步伐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在改革 40 周年之际，中国的改革事业仍然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推进改革步伐。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仍有待突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从

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承包制，最终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历经长时间的摸索。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同整个改革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和创造的重要经验。但是最近还有人认为，按照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要求，改革以来不仅没有消灭私有制而是大力发展了私有化，“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号召“私企的共产党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作斗争，夺回劳动成果，推翻剥削制度”。企图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消灭私有制，在我国和苏联都实践过，都以失败而终结，难道还要以惨重的代价再搞一次吗？我国有一些“理论家”以本本为依据，批私有化，否定改革成果。我们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这个问题。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宣布：“目前，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144.1 万亿元，上缴税费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1/5，增加值约占全国 GDP 的 1/7，2016 年进入世界 500 强的国有企业 83 家。”“国有企业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私有化了，国有企业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我不赞成我国私有化，但调整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国有资产从固化的实物形态转化为流动的资本形态，不是私有化，而是在流动中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不是靠什么本本，而是靠实践。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是《决定》里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当时参加了《决定》的起草工作并主张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但是当时阻力很大，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当时中央认真听取了实践中的意见，最终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果断地写进了《决定》。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用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二是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

探索的重大课题。“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企业改革方向不能动摇。产权清晰，就是企业拥有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及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度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长期资不抵债的依法破产，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合理制度。要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实行“三大”转变：要从企业法调节向公司法调节转变，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为股权关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党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的怪圈。

三是坚持和加强国有企业中党的建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证。但如何正确、全面理解和执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不是对企业事无巨细都要管，而是党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问题抓住不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经管班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了，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从来强调的是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改革本身就是为了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改革 40 年，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证明，这 40 年生产关系的变化调整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时今日丰富的物质基础。整体上，国有企业仍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如前所述，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创造的 GDP 占我国 GDP 总值的 50% 以上；民营企业贡献的税收超过国有企业占国家税收收入的 50% 以上，部分省份甚至超过 70%；民营企业提供了 80% 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 70% 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 90% 的新增就业。根据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2015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民营企业成为捐赠主力军，其捐赠额占企业年度捐赠总额的 52.24%，比国有企业高出 19.47 个百分点。因此，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样新的历史时期，考量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不能还是用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初的思维定势来考虑并下定论。新时期的改革决策者更需要站在经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国企问题。国企的改革方向必须要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必须要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要求，必须要从降低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和制度成本继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角度去考量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譬如反对行政垄断、提高能源交通通讯服务国企的效率，降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品的服务价格。这样整个经济体的成本就会降低，我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我

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就更足。与此相比，如果不顾市场和法治，以行政手段去强化提高这些国企的“盈利水平”，确有可能表面上实现做大做强目标，但显然与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新时期的国企改革，必须认清新时代的特征和需求，作出科学的决策和判断。

第二，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突破。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对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需要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地方债尚未构成直接现实的危险，但是我国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归属于地方的直接税少而间接税多的情况，造成没有明确的地方债务问题的解决之路。类似房地产税这样的直接税的缺失，使得房价飙涨，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的正常路径，严重透支居民消费能力，继而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要破除这一风险，就必须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财税体制突破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财税体制改革关系着纳税人尤其是纳税企业的负担。据一些学者统计，2015 年中国 GDP 是 67.6 万亿元，财政收入为 26.67 万亿，宏观税负为 39.4%（这里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际比较，我国是宏观税负较重的国家之一。政府行政性收费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又紧密连接着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的优越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国家。做同样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缴纳的税费）应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如人意，这固然是因为我国政府还承担了大量投资的职能，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其效能是让人怀疑的，也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行政体制还有很大改革空间。如何在《宪法》基础上，真正通过深化改革约束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科学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最后，财税体制改革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断提高。但同一些宏观税负比较接近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支出，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人民有改革的获得感。不折不扣推行这些改革，必将民心大悦，民心大振，民心归一。

第三，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10 亿，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 6.56 亿。信息交流的便捷和覆盖面的广泛对经济社会乃至经济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正在发生的智能工业革命，世界各国都力争在这一潮流中把握先机，取得优势。作为上

一个变局中因为闭关锁国而导致落后挨打的国家，中国人民在这方面尤有痛感。因此，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在互联网应用的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当然，由于科技研发体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但是，仅仅是服务业的互联网化，就已经给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包括阿里、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装、小商品市场和门店的衰落；互联网金融的勃发和动荡，乃至我国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第三方支付带来的无现金社会的兴起；互联网社交带来的信息流转的加速度等等。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监管体制之外。这些监管机制，有些是必要的，比如防止非法集资的金融监管措施、针对第三方支付规范等等，有些则是本来就应当被淘汰的，还有一些则是在新经济背景下不合时宜的。这种情况对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监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监管抱残守缺，则有可能因噎废食而使我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被竞争对手所超越；而如果监管缺位，类似非法集资监管套利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互联网新业态的适度监管程度的拿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考验。另外，政府部门除了直接的监管功能之外，还担负着与监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垄断，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副作用是垄断变得更加易如反掌，互联网产业往往号称有第一就没有第二的生产空间，互联网的跨界搏杀能力更能够使垄断涵盖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这个互联网的大时代也是智能制造的时代，各种创新创意层出不穷，经济持续发展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创新创意，要保护人们创新创意的积极性，就必须加强专利和非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反击垄断对创新的伤害。综合以上两点，在互联网时代，就要特别注重加强反垄断的力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各类创新创意的保护。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新特点。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变化的基础上，通过“五位一体”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沈家文

新形势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再思考

范恒山

摘要：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加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统筹发展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城乡协调发展势头进一步向好，但受基础与体制机制等制约，统筹城乡发展仍然面临严峻形势。新时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居高谋划、科学推进。特别是对一些关乎大局的问题，要深入研究、提高认识、廓清思路。当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要紧扣消除二元经济体制、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要求，着力抓好一些重点工作。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 小康社会 新型城镇化 农村现代化 区域协调

作者简介：范恒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过去一些年，我国在解决城乡矛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了良好势头。当前，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城乡统筹发展任务依然艰巨，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

一、深刻认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意义

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全局。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加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是协调发展。我国的发展不仅要讲总量，更要讲质量、讲人均水平。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经济总量虽不如我国，但在人均指标、发展的协调性方面，则比我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从国内看，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我国农村人口虽然逐年减少，但乡村常住人口仍然接近 7.4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57.01%，比重依然较高，并且还有 4300 多万贫困人口。农村整体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差距显著。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也在于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是不是能步入小康。如果广大农民、广大农村没有实现小康，就谈不上真正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和社会的评价。当然，统筹城乡发展不是要绝对拉平补齐城乡差距，事实上也很难完全拉平补齐，但是城乡差距不能太大。要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来解决。

（二）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互促共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现代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高低与质量好坏，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水平与质量。一方面，农村现代化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土地等重要的建设要素。没有农村土地的保障，城市的发展就没有新空间，城市建设需要新增大量的建设用地，每年国家安排的城市建设用地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来源于农村的耕地。没有农村提供的大量劳动力，城市就不能有效的运转，就没有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中险活、脏活、细活、累活大都是由进城农民干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都是由农民工承担的。没有农村提供的大量农产品的供应，城市就没有新鲜蔬菜、水果和粮食，城市居民的生活就会陷于困境，难以为继。总之，“三农”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也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现代化。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推进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变革。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短缺，人均耕地仅 0.09 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 0.6 公顷，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化经营无法推行，传统生产经营方式难以改变，这是“三农”发展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新型城镇化发展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相应带来了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增加，为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创造了条件。而城市企业进入农村则大大加速了实际推行的进程。另外，新型城镇化也从总体上提高了土地集约节约水平，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我国城市辖地都不仅是单纯的城市，往往还包含着广大的农村。因此，从规划到操作的

各个环节，城市发展与统筹城乡自然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促进农村加快发展。城镇化对农村的促进还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即一部分进城农民积累了一定资金和技术之后，往往会返乡创业，这种特殊的“逆城市化”现象也有利于推动新农村的建设。总体来说，城乡统筹发展能够有力有效地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空洞的概念，它是资源要素和经济社会活动以空间为载体合理配置和有效运转的结果。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具体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及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上。城乡是典型的区域类型，既体现着特殊的空间存在，又代表着不同的资源要素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聚与运转类型，因而其发展状况直接决定区域发展的状况。换言之，城乡差距是区域差距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城乡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内容，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总体上讲，城乡统筹发展较好的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就比较高，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城镇密集区，对农村辐射带动力度较大，区域整体发展比较平衡。反之，如果城市不强、农村较穷，区域发展也就比较落后，协调性也较差。如西北地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力度较小，区域整体发展相比东部地区差距较大。通过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生产资源要素和经济社会活动在城乡区域空间上均衡分布，有利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四）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新型城镇化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据测算，每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带来年均1万元左右消费需求和2.2万元投资需求。所以，新型城镇化是消费需求的“倍增器”、投资需求的“加速器”，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对农村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另一方面，农业是发展基础，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也将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城市和农村虽然反差很大，但差距就是潜力，不足代表需求，落差形成势能。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无论是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是在个性需求方面，我国城乡区域间的人群在现实获得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填平补齐这种差异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或内在需求，将为推动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提供了强大动力。

二、准确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统筹发展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城乡协调发展势头进一步向好，但受基础与体制机制等制约，统筹城乡发展仍然面临严峻形势。

（一）城乡统筹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发展水平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或可支配收入年度实际增长速度均快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统筹发展取得了积极显著进展。

城乡统筹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围绕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人、地、钱等重点环节，开展一系列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改革。在城镇发展方面，国家调整了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修改完善县级市设立标准以及设立县级市申报审核程序，并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人口管理方面，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在财政政策方面，出台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在土地管理方面，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数量挂钩机制。印发实施《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在一些关键方面，加大改革力度、采取得力措施。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所有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或意见，各省均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和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建立了制度性通道，部分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居住证制度方面，《居住证暂行条例》明确了居住证上附着的六项公共服务和七项办事便利。截至 2016 年底，25 个省（区、市）已出台《居住证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各地居住证发放量稳步增加。部分地区在全国基准水平上进一步增加了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项目，居住证“含金量”不断提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已实现全国统一，并初步实现“钱随人走”，在公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比例达到 80%。30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全民参保计划试点工作。城乡养老保险衔接有序开展。23 个省（区、市）出台城乡医保整合方案，除黑龙江、甘肃外基本实现省内异地就医联网和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全国 80% 的市县将进城落户居民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纳入公租

房保障。

城乡统筹发展的平台和载体加快培育。城市群既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平台，也是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发展的平台。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靠近农村、贴近农民、联接城乡、亦城亦乡，农民进入门槛低、束缚少，是统筹城乡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围绕这两类平台的建设培育，加大了工作力度。城市群培育发展方面，印发实施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哈长、中原、北部湾6个城市群发展规划，进一步强化城市群城城间、城乡间的联动及对区域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建设方面，增加城市数量，优化城镇体系，近年来审核批准7个地级市、12个县级市。聚焦提升发展质量和补齐设施短板，加大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推进供水、供热、燃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特色镇培育方面，印发了《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组织开展了一批试点，协调安排资金并推动建立相关基金支持建设。

城乡要素流动取得新进展。重点推进农村产权和土地利用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等试点。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率达97%。截至2016年10月底，14个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共退出宅基地20774户、12413亩。土地利用制度方面，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模和范围，允许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截至2016年10月底，12省（区、市）已产生6.41万亩节余指标，9省份流转使用指标4.1万亩、收益115.26亿元。

（二）城乡统筹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但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层面实际存在的重工业和城市、轻农业和农村的倾向造成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发展中利益牵制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稳固，城乡间发展还很不平衡，城乡协调互动的良性格局仍未形成。

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明显滞后。农村水电路气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管护机制还不完善，绝大多数村庄缺乏统一规划，道路硬化、集中供水、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坑塘沟渠整治、村庄绿化等还没有系统开展。一些地区还存在人畜混居，有大量村内和田间道路需要建设。2015年，全国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得到处理的建制村比例仅为62%和18%。畜禽粪污与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严重不足，城市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大量向农村排放。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依然严重落后于城市，农民医疗、养老、低保

等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也仍然低于城镇居民。

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仍处高位，超过普遍认同的国际警戒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从 2010 年的 12507 元扩大到 2016 年的 21253 元；2015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地区的倍差为 4.07 倍。据 2017 年 3 月发布的胡润富豪榜，大中华地区富豪人数超过美国，而北京又超越纽约位居第一。全世界富豪最多的十个城市中，中国就占居 5 个（含香港）。个人拥有资产有的超过 2000 亿人民币，富可敌国；有的则处于贫困线之下，年均不到 3000 元。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六省区贫困人口均超过 500 万人，西藏、甘肃、新疆、贵州、云南五省区贫困发生率超过 15%，全国重点县和片区县的贫困发生率平均达 22.1%，这使得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难度大大增加。

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要素净流出困境。长期以来，由于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距，土地、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不断从农业流向工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一方面，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土地，支持了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建设与工业生产大量占用优质耕地，每年因占用减少耕地约 500 万亩，而且由于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往往占优补劣，耕地质量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谁来种地”“农村空心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从业人员中 50 岁以上的比重约占 50%，农业劳动力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下降，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大，“懂经营、善管理”的农业经营人才尤为紧缺。尽管这些年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矛盾依然突出，我国县域地区的存贷比远低于城市，资金外流问题仍较为严重。面向中小企业和“三农”的普惠性金融发展滞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贷款支持障碍重重。

县域经济发展支撑能力有待加强。县域是国家的基石，郡县治，则天下无不治。县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县域兴则区域兴，区域兴则国家兴。县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主体空间单元，县域发展好，促进城乡协调就有了基本保障。但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整体不足且很不均衡，需要积极培育、大力振兴。主要的问题，一是贫困县数量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止到 2015 年底，县级行政区为 2850 个，除去市辖区外，包括县 1397 个、自治县 117 个、县级市 361 个，其中，国家贫困县有 832 个，占县（自治县、县级市）总数的 44%。二是县域经济发展能力较差。相当一部分县域除基础设施薄弱外，突出问题是产业同质老化，特色性不强、成长性不足。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更为突出。由此也形成了东中西部县域间的发展差距悬殊。比如，2016 年东部地区的江苏昆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160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18.9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5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 万元；而属于国家贫困县的中部地区山西大同

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6.9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6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8 万元，两者差距可谓悬殊。三是县域间培育新经济新动能差距明显。这几年，有的落后地区有效把握一体化发展机遇和先进共享技术，实现了科技要素的转移和产业的“无中生有”，从而超越传统产业基础实现了新经济新动能的率先发展；但有的地区仍然固守老观念、老结构、老方式，错失机遇，新经济新动能发展缓慢，经济增长乏力。在一些地方，大城市对县域的虹吸效应明显，致使县域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严重不足，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动力和能力受到约束。四是县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平衡。当前的财政体制下呈现着“财权向上、事权向下”的特点，这使很多县域无法对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重要领域实行必要的投入，欠账很多，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的后劲薄弱。

三、深入研究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居高谋划、科学推进。特别是对一些关乎大局的问题要深入研究、提高认识、廓清思路。

（一）关于建设理念问题

统筹城乡，主要矛盾在建设乡村或农村。在推进城乡统筹时，我们到底怎样来建设农村，未来城市和农村应该呈现怎样的格局才科学合理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当前，很多地方把农村建设得如城市一样，宽阔的马路、气派的广场、连片的人工绿化带、社区公园等，感觉就是把城市建设的那一套照搬到农村来了。事实上，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质化，统筹城乡也不是消灭农村，消灭农村不如做美农村。做美农村，不仅将给我们一份念想，留一个回旋的空间，还会给未来人民提供一个不一样的家园。迟早城里人会把农村家园当个宝，很多人会回归到农村，吃田间野菜、消费农家乐，享受这一给身体和精神带来愉悦的美好空间。古贤曾用“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描绘过农村，不要让这份美好随着统筹城乡而消逝了。未来的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新农村，既要“产业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也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当然，适当建设农村聚居点、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必须的，但要科学规划、规模合理，如果搞得像城市小区一样，农民上楼了，但生产、生活不方便了，生活成本也高了，没有“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了，这样的城镇化或城乡统筹应该说是比较失败的。

（二）关于城乡协调互动问题

城乡协调互动的关键问题是处理好大城市的扩散效应与虹吸效应的关系。一方面，要发挥大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扩散效应。“大树底下好乘凉”，大城市是带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各种因素，中心城区会将优质资源要素向周边区域布局，形成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的合理分工。大城市发展起来了，能够形成对农村的反哺，促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企帮村。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城市要素向农村扩散，城市力量为农村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应对大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大树底下不长草”，城市也会吸附农村的各类资源，影响农村的发展。当前，我国还存在资源要素向特大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的现象，一些城市中心区表现出明显的“虹吸效应”，没有形成城市中心区与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国外的情况总体是特大城市相对较少，美国稍微多一点，但美国人少地多；俄罗斯的土地几乎超过中国的一倍，但特大城市也不多。我国的城市往往是一个个摊大饼式发展，崇尚“大大益善”，有的地方一个新区设计就是几千平方公里，这样城市本身的发展是粗放的，这种粗放式发展的城市不仅带动不了农村，反而会形成一个农村化的、品质不高的城市。为此，要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入手，划定特大城市的边界，促进城市集约发展，防止大城市过度发展无序扩张，挤压周边中小城镇和农村发展空间，并将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等功能适当向周边转移，发挥“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和乡村共同发展，形成功能互补、协调互动的格局。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克服“虹吸效应”、发挥“扩散效应”的一项重大实验，主要是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解决北京过于“肥胖”患上“大城市病”而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的问题，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河北雄安新区正在规划建设，北京市内一批区域性批发市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学院、医院等有序向北京城六区之外疏解，北京市“虹吸效应”有所减弱、“扩散效应”正逐渐显现，这些努力也将为其他地方解决好“大城市病”提供了良好范例。

（三）关于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城乡统筹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关键在人。经济发展规律显示城乡对立问题在城镇化中期最为明显，在城镇化后期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也就是城市和农村没有很大的区别了。实践中也有例外，比如当前拉美某些国家，城镇化率早已接近 80% 的水平，但城市里遍布贫民窟，贫富不均、社会分化严重，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伪城镇化，

不是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我国要加快实现城乡统筹，就必须加快推进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未来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提升约1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60%左右，预计2030年能达到70%，但对我国而言，那时恐怕也还不能说已经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因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进程还比较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只有41.2%，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个百分点，人口在城乡间流动将会持续更长时间。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应该真正使其安居乐业，有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务相配套，不是简单的在城市有一份工作。即进城人口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来支持保障，可以保证长期居住和可持续发展。所以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关键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同时解决户籍附着的福利差别问题。现在户籍制度并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限制农民的自由，但是附着在户籍上的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化政策如何处理，近2.5亿农民工待遇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交通事故同命不同价的问题何时可以消除，如此之类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另外，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愿意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占比呈总体下降的态势，原先受户籍阻隔“不让来”和“不能来”的问题，转变为“不想来”和“不愿来”的问题。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非转农”的“逆城市化”现象（当然，这与前面提到的进城农民返乡创业不是一回事）。究其原因，一是城市生产生活的高成本导致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涨；二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发展使得城镇的“高福利”逐渐弱化，吸引力下降；三是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减、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的过程中，城镇就业创业和发展机会减少；四是新农村建设等反哺农村的政策，很大程度改善了农村面貌和生产生活条件。当然，也有部分农民习惯原来“听鸡鸣狗叫、看日出日落”的生活方式，不愿融入或者融入不了城市现代生活方式。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低，再加之地方吸纳落户不积极，制约着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同时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比重较高，且落户意愿较强，但这些地区过于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短期成本，推进户改和实施居住证制度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够大。有的地区落户门槛仍然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特别是对省外人口和普通劳动者门槛较高。已实施居住证的地区，也存在居住证上附着的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过少的状况。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精准施策予以解决。

（四）关于城乡土地制度问题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这种制度设计，是基于当时整体环境的，它更多的是发挥了人的积极性，

物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甚至由于一家一户承包耕耘的制度设计，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田间整理等出现弱化，农业规模化经营、机械化操作等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农民是集体土地的实际占有者，理应合理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但长期来在征收农村土地过程中，农民并没有完全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这制约了农村开展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进而也制约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向农村流动。2016 年 10 月出台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作出新部署，提出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即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村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关键举措，也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重大突破。新的制度安排，顺应了土地要素合理流转、提升农业经营规模效益和竞争力的需要，在保护农户承包权益的基础上，赋予新型经营主体更多的土地权能，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为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方式以及更先进的科技、强势的市场主体进入农村、服务三农创造了条件，能够大大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新的制度安排，丰富和细化了农村土地产权，实现了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保障了农民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并推动农民参与到农村的规模经营中，融入了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不仅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更对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使之在无形之中完成了城镇化的过渡。这是统筹城乡的一个重要体制设计，不仅有利于农村发展，也有利于城市发展，效果不可低估。

（五）关于资金投入问题

城乡统筹的关键问题是制度设计，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资金问题是一个根本环节。据有关测算，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东部地区人均成本在 20 万元以上，中西部地区 10 万~15 万元左右。这些成本，还只包括当期静态成本，主要是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追缴，基本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费用，不包括未来发展的动态成本。同时，在成本分担时，政府可能要承担 60%~70%，意味着推进 100 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近 1000 亿元投入。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地方政府能否承担这么大支出压力，都需要认真思考、冷静分析。另外，农村地区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资金也需要政府大量的投入，如何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也是压力较大的问题。

四、扎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任务

当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要紧扣消除二元经济体制、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要求，着力抓好一些重点工作。

（一）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体制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要先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城乡一体，规划引导都不够，顶层设计和微观设计都比较滞后，推进力度上也比较薄弱。现在农村光从房子看就富裕起来了，从茅屋到砖瓦房，再到水泥房、楼房，至少换了四代。但由于缺乏规划，农村乱象依旧。很多地方看起来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当前农村一体规划的成本显著提高，一是拆迁赔付大幅攀升，二是权益意识膨胀导致部分农民提出较为苛刻的补偿要求，三是传统风俗和风水观念强化形成较大阻滞，但仍需要下大力气推进这项工作，并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切实强化规划引导，促进城乡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在空间布局方面，要完善县域村镇建设规划和镇、乡、村庄规划，促进城镇合理布局。小城镇和农村社区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重视小城镇和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聚集人口，不断提高小城镇和农村社区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在土地规划方面，应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控制下，探索编制村庄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划定城乡建设用地、住宅用地、生态用地，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在建设规划方面，要重点解决当前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功能布局不够合理的问题，做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强化城乡基础设施的衔接互补，实现基础设施城乡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统筹推进城乡水务、交通、能源、社会事业、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村特别是村庄规划，不一定强调统一式样、整齐划一，要因地制宜，体现独特的地域和村落特色，有浓厚的乡愁村韵。城市规划也是如此，一要充分体现独有特色风貌，二要着眼于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城市病”。通过规划和建设，使每座城市成为“独一个”而不是“同一个”。

（二）建立健全城乡利益平等交换机制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构建城乡之间平等的利益交换机制，切实改变城市依靠优势地位不断吸纳农村低廉要素资源的状况，充分发挥政策调控作用，推动资源要素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自由平等交换。农业补贴方面，应进一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导性

和精确性，重点补主产区、适度规模经营、农民收入、绿色生态。比如，13 个粮食主产省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但种粮比较效益低、没有税收来源，农民富不起来、产粮大县财政收入增补上去。怎么平衡？出路是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和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力度。为此，国家出台了《关于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意见》，对完善补偿机制作出了部署。再比如，提高农民收入，在确保农产品价格稳定的同时，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直接补贴到种粮人身上，让种粮人真正得到实惠。作为一种方向，还可以研究探索由农业直补改为保险间接补贴的思路与方式。土地方面，要按照中央要求，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处置权利，改革完善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管理制度，改变以往城乡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的不合理现象，推动农村土地资源向资本转换。劳动力要素方面，进一步清理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政策，促进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让农民外出务工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得到劳动安全、工伤大病有保险，有地方住，子女能上学。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就业、居住、缴税、缴纳社保等作为落户条件，让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市民。金融方面，长期以来，有些金融机构不仅不对农村提供金融服务，还把农村的资金吸收以后投放到城市或其他盈利行业，农村金融资源大部分支持到城市、工业上了。另外，农民获取贷款资金非常困难，农村的土地、牲畜、农作物包括农业生产设施等资产都难以作为抵押物。总体上看，农村经济发展缺少金融要素的支撑。要加快农村金融机制创新，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保障金融要素资源向农村、农业、农民进行倾斜。2017 年中发一号文件对此提出明确要求，要加强督查，细化举措，确保落实到位。

（三）强化城镇对城乡区域带动作用

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新型城镇化，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一是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优化提升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东部城市群，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培育发展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呼包鄂榆、天山北坡等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使之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让中西部地区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二是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推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外转移，加强与周边城镇基础设施连接和公共服务

共享，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1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区域中心城市要完善城市功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延伸面向腹地的产业和服务链，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和带动效益，带动农村地区加快发展。三是培育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加快完善设市标准和市辖区设置标准，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设置标准，将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置为市，适度增加中小城市数量，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配置，提升产业人口承载能力。赋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允许按照相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市政设施标准进行建设发展，激发特大镇发展潜力。远离中心城市的小城镇和林场、农场等，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服务农村、带动周边的特色小城镇，使其充分发挥统筹城乡的载体作用。与此同时，在特色小城镇发展中也要防止政府大包大揽、盲目扩张，重数量轻质量、重形轻魂，以及房地产化等不当倾向，避免借小城镇建设，大搞新城新区建设，搞房地产开发等。

（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向、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本选择，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战略举措。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结果，前提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企帮村的有效机制。没有城市和企业进入农村，没有工业反哺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很难融合，也很难全面展开、深度发展。可以说，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企帮村机制自然嵌入农村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涉及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要突出重点，找准症结，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特别是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高度重视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鼓励农业企业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相关支持政策要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挂钩。政府在安排相关项目和资金补助时，要把利益联结作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有效带动农民增收，确保农民受益。同时，使农村集体经济也在融合中发展壮大。二是妥善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培育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主体，是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任务。既要抓好大项目带动，支持大农场、大合作社、大企业发展，特别是通过打造一批产业链条长、商业模式新、带动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也要积极创新政策，调动普通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能让普通农户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大潮中掉队，更不能

让普通农户的利益受损。三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归根到底是市场行为，要充分尊重企业与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经营决策权，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市场环境。近两年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势头很猛。政府部门抓乡村旅游，重点应抓规划、抓基础、抓环境、抓主体、抓营销。特别是要以县域为重点加强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集点成片、连点成线的发展，打造精品线路，避免一哄而上、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倾向，防止过滥过乱影响乡村旅游品质。

（五）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展长效机制

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调动各方力量，要健全有关政策机制，全面协同推进各项工作。一是完善调动各方主体积极性、能动性的工作机制。消除有关政策障碍，推动城市人才、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主动向农村流动。涉及有关激励、奖励机制和退出机制，鼓励企业、个人积极参与城乡统筹发展，同时要重视调动农村居民参与城乡建设的主体积极性。二是建立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推进机制。继续增加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形成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在资金项目安排、涉农补贴等方面，对市场主体逐步实行无差别政策。探索建立城乡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对市场投资的带动作用，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对于经营性、使用和市场运作的城乡统筹发展项目，交由市场主体建设和运营。三是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基础，要通过优选人才、优化手段、创新机制，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可依托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资源，发挥工业企业的支撑带动作用，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经营制度的创新，引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集体农庄、家庭农场模式发展，提升现代农业组织化、规模化水平。

责任编辑：沈家文

2017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简析

许宪春

摘要：2017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巩固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从生产角度看，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三次产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速比去年同期回升；从需求角度看，最终消费支出增速比去年同期略有回落，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明显回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下降转为增长；从收入角度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速比去年同期略有回升，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升，1—5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明显加快；从价格角度看，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去年同期收窄，工业生产者价格和货物进口价格明显上涨；从结构角度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从新动能角度看，工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网上零售额快速增长，新动能继续积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角度来看，“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新进展。

关键词：2017 年上半年 经济运行 经济增长 三次产业

作者简介：许宪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2017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巩固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速保持了年初的良好势头、居民收入增速加快、居民消费价格稳定、经济结构继续改善、新动能继续积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取得新进展。预计全年经济将保持平稳运行的状态。本文从生产、需求、收入、价格、结构、新动能和当前重点改革任务等七个角度简要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状况。

一、从生产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生产角度看，2017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三次产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

（一）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

2017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6.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3.5%，第二产业增长 6.4%，第三产业增长 7.7%。从三次产业看，对经济增长起主要贡献的是第三产业，因为只有第三产业的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速都低于经济增速。上半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1%，推动 GDP 增长 0.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7.8%，推动 GDP 增长 2.6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9.1%，拉动 GDP 增长 4.1 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这些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2%、21.0% 和 9.8%，是拉动第三产业增速的主要动力（见表 1）。

表 1 2016 年上半年及 2017 年上半年中国 GDP 增长率 (%)

	2017 年上半年	2016 年上半年
国内生产总值	6.9	6.7
第一产业	3.5	3.1
第二产业	6.4	6.1
第三产业	7.7	7.5
农林牧渔业	3.6	3.2
工业	6.5	5.9
建筑业	5.3	7.5
批发和零售业	7.3	6.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2	4.6
住宿和餐饮业	7.2	6.9
金融业	3.8	6.7
房地产业	6.9	8.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1.0	20.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8	11.7
其他服务业	7.0	6.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下同）

（二）三次产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速回升

2017 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比 2016 年同期分别提高 0.4、0.3 和 0.2 个百分点。所以，2017 年上半年经济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是第一、二、三产业共同拉动的结果。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增长 6.5%，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增长 5.3%，比 2016 年同期回落 2.2 个百分点（见表 1）。所以第二产业增速的回升完全是工业增速回升拉动的。在工业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9%，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是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的主要动力。其中，3 月份和 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均增长 7.6%，为 2015 年以来月度最高增速（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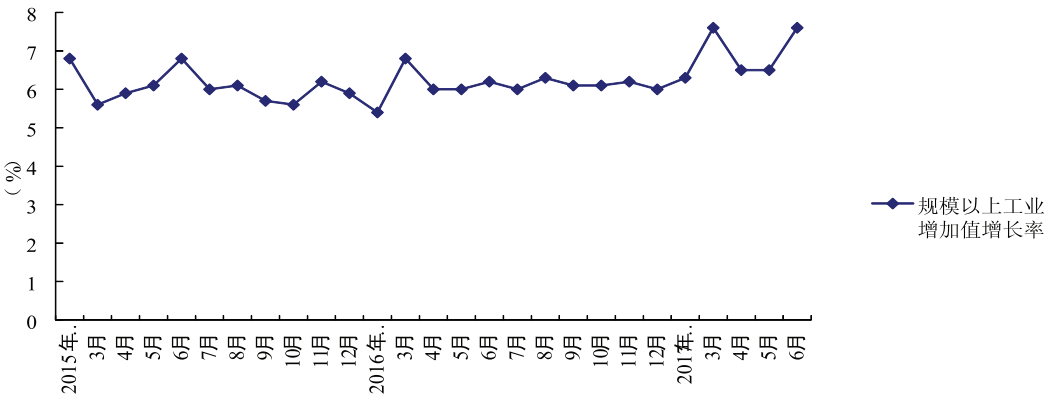


图 1 2015 年以来月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均高于 2016 年同期，所以第三产业增速的回升是这些行业增速回升拉动的。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速由 2016 年同期的 4.6% 回升到 9.2%，回升的幅度最大。

二、从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需求角度看，2017 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速比去年同期略有回落，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明显回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下降转为增长。

（一）最终消费支出增速略有回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有下降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结果显示，2017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7.6%，实际增长 6.1%。比 2016 年同期分别回落 1.2 和 0.5 个百分点（见图 2）。这表明支出法 GDP 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比 2016 年同期有所回落。

2017 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15.8%，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财政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速相应上升。因此，政府消费支出增速比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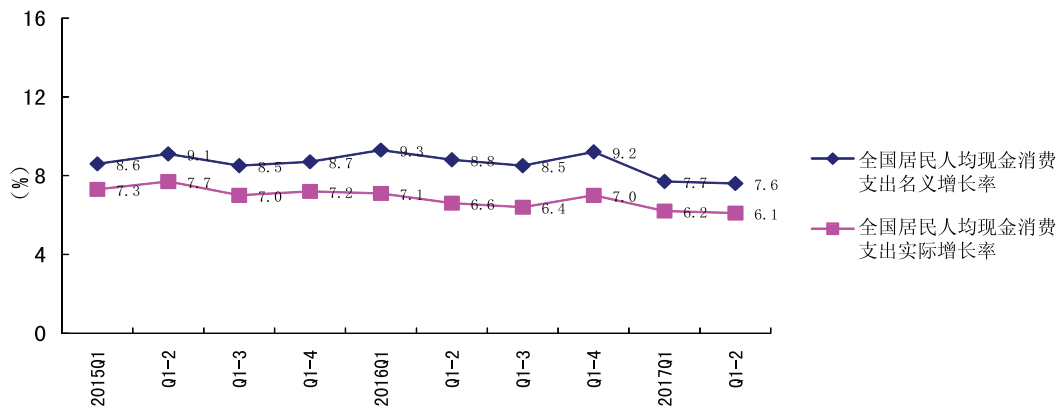


图 2 2015 年以来季度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名义和实际增长率

同期有所上升。

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上述表现决定了 2017 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速比 2016 年同期略有回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 2016 年同期略有下降。2017 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4%，比 2016 年同期下降 0.8 个百分点。

（二）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明显回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

2017 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长 8.6%，比 2016 年同期回落 0.4 个百分点。考虑价格因素后，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实际增速明显低于 2016 年同期，决定了 2017 年上半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速比 2016 年同期明显回落。这是全部投资需求增速明显回落的决定因素。

从名义增速看，制造业、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三大领域投资增速比 2016 年同期均回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快，近几年在其他方面投资增速较低的情况下，它是支撑全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 21.1%，比 2016 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8.5%，比 2016 年同期加快 2.4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近几年一直在往下走，2016 年 9 月开始回升，2017 年上半年增速为 5.5%，比 2016 年同期加快 2.2 个百分点（见图 3）。

从投资主体看，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 7.2%，比 2016 年同期加快 4.4 个百分点；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12.0%，比 2016 年同期回落 11.5 个百分点。两者之间差距显著缩小（见图 4）。没有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不可能有 8.6% 的增长，所以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对于稳定全部投资名义增速起到了重要作用。

存货变动方面，2017 年 5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 9.3%（见图 5），2016 年同期为下降 1.1%，支出法 GDP 中的存货变动也由 2016 年同期下降转为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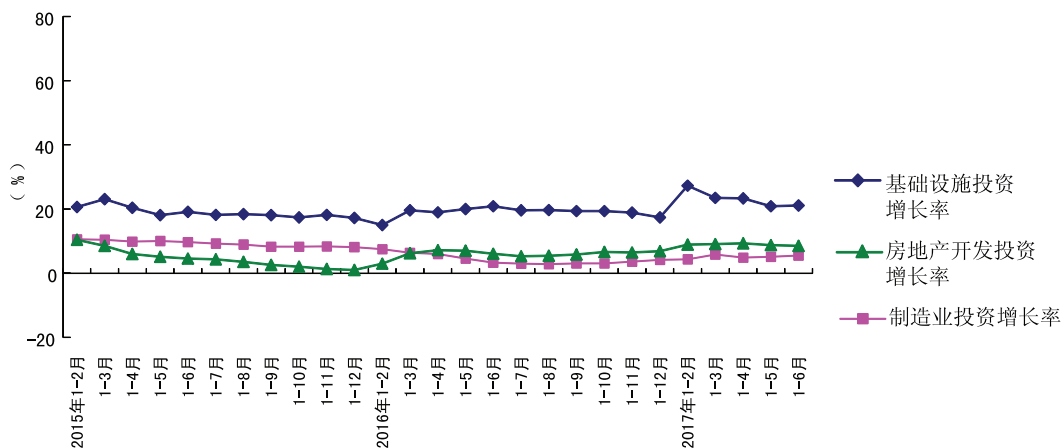


图3 2015年以来月度制造业、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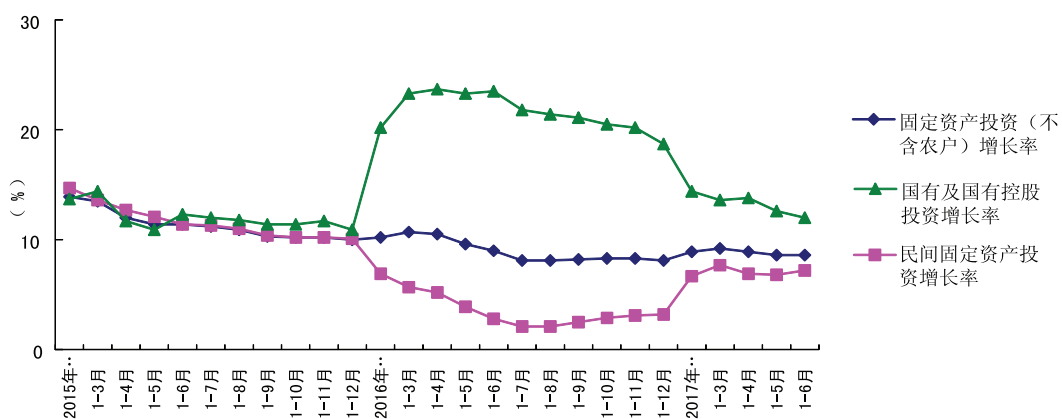


图4 2015年以来月度民间、国有控股和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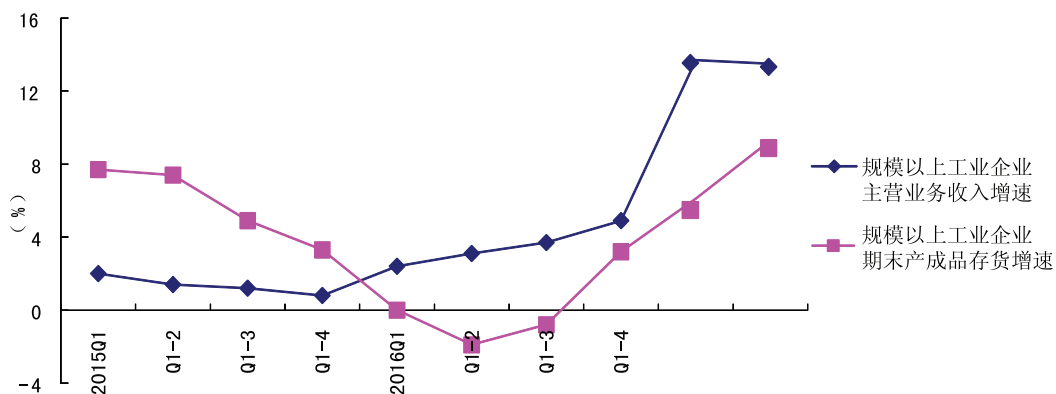


图5 2015年以来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和期末产成品存货增长率

注：图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13.5%为2017年1—5月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期末产成品存货增长率9.3%为2017年5月末数据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的上述表现，决定了 2017 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比 2016 年同期明显回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 2016 年同期明显下降。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2.7%，比 2016 年同期下降 9.6 个百分点。

（三）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下降转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负转正

2017 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差额同比下降 17.7%，降幅比 2016 年同期明显扩大，但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 2016 年同期下降转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负转正。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9%，而 2016 年同期为下降 6.5%。

货物贸易差额降幅比 2016 年同期明显扩大，但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 2016 年同期下降转为增长，主要原因在于货物进口价格涨幅明显高于货物出口价格涨幅。上半年，货物进口价格同比上涨 12.8%，而货物出口价格同比上涨 5.5%。货物进口和出口通过价格指数缩减之后，导致实际货物贸易差额比 2016 年同期上升，从而支出法 GDP 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去年同期的负数转为正数。

综上所述，从需求角度看，2017 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速比 2016 年同期略有回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有下降；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明显回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下降转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负转正。

三、从收入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收入角度看，2017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速比去年同期略有回升，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升；1—5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明显加快。

（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速略有回升

2017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8.8%，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0.1 个百分点（见图 6）；实际增长 7.3%，提高 0.8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名义增长回升的幅度比较小，实际增长回升的幅度略大一些。

（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明显加快

2017 年 1—5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2.7%，比 2016 年同期加快 16.3 个百分点。1—5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比 2016 年同期明显加快，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工业产品销售增速加快。1—5 月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3.5%，比 2016 年同期加快 10.6 个百分点。二是工业产品价格明显上涨。1—5 月工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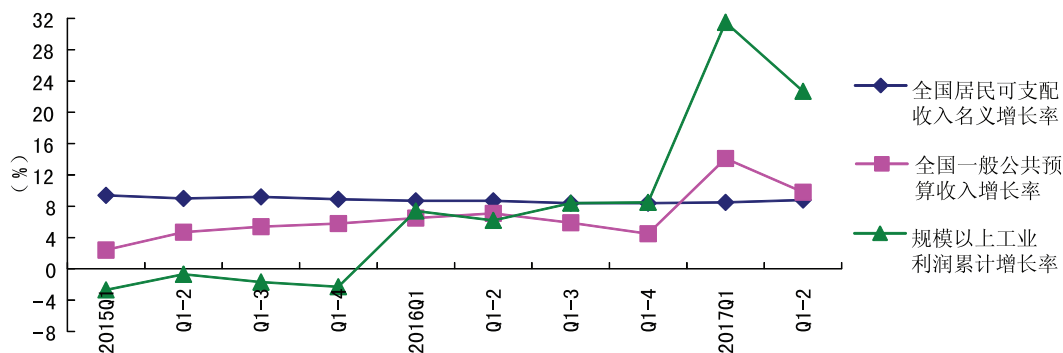


图6 2015年以来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长率

注：图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22.7%为2017年1—5月数据

产者出厂价格上涨6.8%，涨幅比2016年同期提高10.9个百分点。初步测算，因出厂价格上涨6.8%，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加约30563亿元，因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9.0%，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增加约26164亿元，收支相抵，利润增加约4399亿元。三是单位成本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62元，比2016年同期减少了0.04元。

在销售加快、价格上涨等因素作用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行业利润大幅度增加，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显著提高。

同时应当看到，1—5月工业利润出现较快增长，较多依靠煤炭、钢材和原油等价格的快速上涨。虽然煤炭、钢铁和石油开采等行业利润增长较快，但仍属于恢复性增长。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升

2017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9.8%，比2016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见图6）。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升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速回升。2017年上半年经济增速比2016年同期回升0.2个百分点，尤其是名义增速回升的幅度更大，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长产生影响。二是价格上涨。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2016年同期明显上涨，带动以现价计算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快增长。三是企业利润明显增加。受经济增速回升、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企业利润明显增加，带动工业和服务业税收较快增长。四是一般贸易进口价量齐升，进口总额大幅增长，带动进口环节税收同比增收较多，拉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升。

四、从价格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价格角度看，2017 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去年同期收窄，工业生产者价格和货物进口价格明显上涨。

（一）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去年同期收窄

2017 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4%，涨幅比去年同期收窄 0.7 个百分点。从月度看，2017 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呈 V 型走势，其中，1 月份涨幅最高，为 2.5%；2 月份涨幅最低，为 0.8%；5、6 月份回升至 1.5%（见图 7）。

2017 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中八大类七涨一降。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下降 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1%，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食品价格下降主要是受部分鲜活食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上半年气候条件适宜，鲜菜市场供应比 2016 年同期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14.7%。受前期效益好的影响，养殖规模扩大、供应增加，鸡蛋和猪肉价格出现回落，分别比 2016 年同期下降 13.7%和 6.1%，鲜菜、鸡蛋和猪肉三项合计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下降 0.67 个百分点。

2017 年上半年，受消费需求升级、人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服务价格继续呈上升趋势。其中部分服务项目价格上涨明显，医疗服务价格上涨 5.2%，旅游价格上涨 4.1%，教育服务价格上涨 3.3%，合计影响 CPI 上涨 0.53 个百分点。居住类价格上涨 2.4%，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0.52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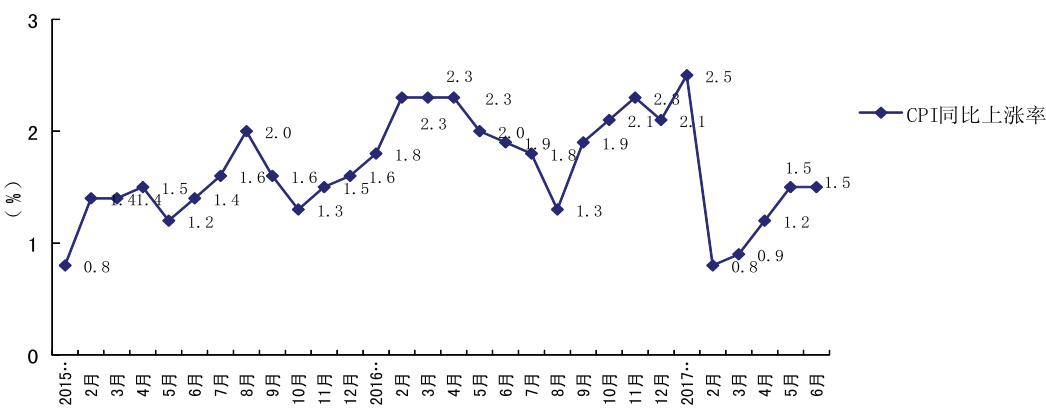


图 7 2015 年以来月度 CPI 上涨率 (%)

（二）工业生产者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上涨，3、4 月份涨幅开始回落

2017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6.6%，2016 年同期为下降 3.9%。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8.8%，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6.4 百分点，占总涨幅的

97%左右；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7%，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0.2 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 3%左右。可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的决定因素。

2017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8.7%，而 2016 年同期为下降 4.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的 9 大类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涨幅最高，达到 17.8%；其次是燃料、动力类，涨幅为 16.3%；再次是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涨幅为 15.4%；涨幅最小的是农副产品类，为 2.0%。

从月度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分别于 2012 年 3 月份和 4 月份进入下降区间，分别于 2016 年 9 月份和 10 月份开始进入上涨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从 2016 年 10 月份起涨幅逐月上升，2017 年 2 月份达到峰值 7.8%，然后涨幅逐月回落，5 月份回落到 5.5%，6 月份涨幅与 5 月份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从 2016 年 11 月份起涨幅逐月上升，2017 年 3 月份达到峰值 10.0%，然后涨幅逐月回落，6 月份回落到 7.3%（见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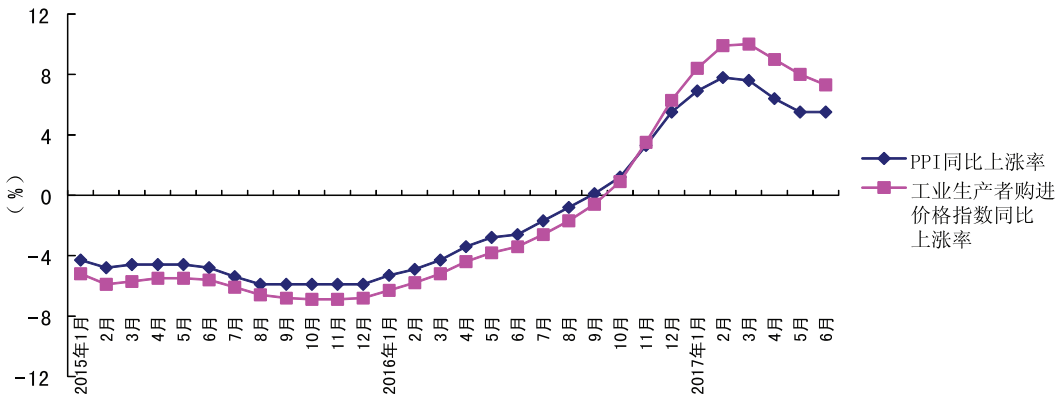


图 8 2015 年以来月度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率

（三）货物进口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上涨

2017 年上半年，货物进口价格同比上涨 12.8%，2016 年同期为下降 7.7%。其中 2017 年一季度上涨 14.4%，二季度上涨 12.1%。

2016 年一季度货物进口价格同比下降 11.4%，二季度下降 4.0%，三季度下降 0.8%，四季度上涨 4.6%。前三季度降幅逐季收窄，四季度转为上涨。2017 年一季度，货物进口价格延续了去年的季度走势，二季度涨幅比一季度有所落（见图 9）。

2017 年上半年货物进口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上涨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上涨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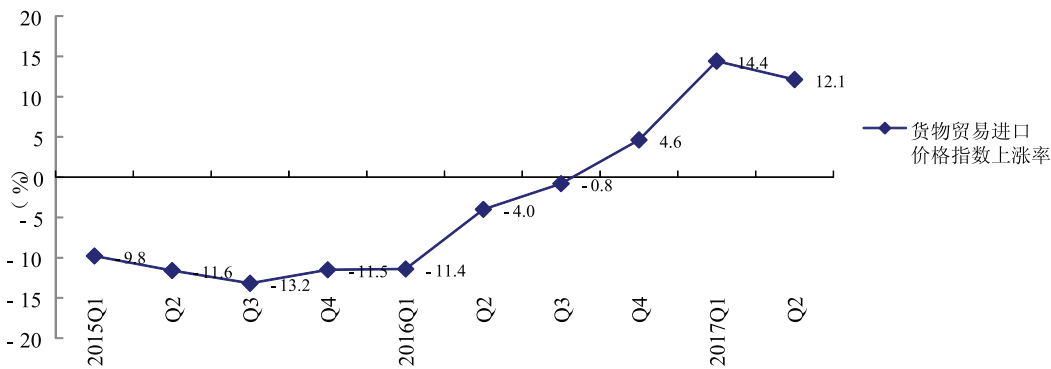


图 9 2014 年以来季度货物进口价格上涨率

五、从结构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结构角度看，2017 年上半年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

产业结构继续改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三产业比重明显高出第二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 2013 年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 年超过 GDP 的 50%，2016 年达到 51.6%，2017 年上半年为 54.1%，高于第二产业比重 14.0 个百分点。二是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提高。2017 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12.2%，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0.1 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继续改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投资需求。2017 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4%，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 30.7 个百分点。其次，投资结构继续改善。一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2017 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1.8%，增速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8.7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6.8%，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二是高耗能制造业投资比重继续下降。2017 年上半年，高耗能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 1.0%，高耗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6.9%，比 2016 年同期下降 0.7 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斜。2017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为 7.3%，高于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说明实际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斜。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2017 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8.5%，实际增长 7.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8.1%，实际增长 6.5%。因此，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速，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

六、从新动能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新动能角度看，2017 年上半年工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网上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新动能继续积累。

工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2017 年上半年，工业中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9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2017 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1%，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6.2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15.5%，医药制造业增长 11.6%，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1.7%，均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新产品保持快速增长。2017 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52.3%，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 40.5%，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8%，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 21.6%，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产量增长 19.7%。这些新产品产量增速都远远超出传统产品产量。

网上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2017 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3.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28.6%，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51.6%。

七、从重点改革任务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的角度看，2017 年上半年“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新进展。

去产能方面，通过化解过剩产能，工业产能利用率继续提高。2017 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 76.4%，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3.4 个百分点。但是与 80%~82%的正常产能利用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需要继续努力。

去库存方面，商品房待售面积降幅继续扩大。2017 年 6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9.6%，降幅比 3 月末扩大 3.2 个百分点。

去杠杆方面，工业企业杠杆率继续降低。2017 年 5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1%，比 2016 年同期降低 0.7 个百分点。

降成本方面，企业单位成本继续下降。2017 年 1—5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62 元，比 2016 年同期减少 0.04 元。

补短板方面，短板领域投资得到加强。2017 年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6.0%、17.5%、14.7%和 17.8%，均明显快于同期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经济 ·

中国软件出口：现状趋势与战略机遇^{*}

王晓红

摘要：当前，虽然中国软件出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但总体规模实力明显提升，出口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价值链不断向高端拓展。软件出口市场已经形成面向全球的发展格局，软件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实力增强，软件人才结构向知识化和高端化发展。然而，中国软件出口仍存在成本全面上升、创新投入不足、人才缺口较大等制约因素。2017 年中国软件出口仍面临有利的发展机遇，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推动全球软件业增长和创新的动力，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具有双向拓展空间，国内软件业加快发展、营商环境改善等都有利于扩大出口。未来促进中国软件出口应提高软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软件强国人才体系建设、积极拓展软件出口市场空间、优化软件出口政策和营商环境。

关键词：软件出口 信息技术 服务外包 软件产品 自主创新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一、导 言

“软件定义”成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标志和新特征。软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灵魂，也是引领科技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核心动力。软件出口是国家软件业竞争力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服务”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软件出口竞争力是构建外贸竞争新优势、打造外贸持续发展新动能的

^{*} 本文为商务部课题《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 2016》的总报告，感谢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冼国义、汤军、王旭阳、姜义茂、敬艳辉在研究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必然要求。

2015—2016 年，全球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状态。2016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 3.1%，与 2015 年持平。全球治理重构、政局不稳、金融动荡、汇率波动，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都导致全球贸易增速处于艰难困境之中。2016 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为 15.96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3.24%。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 2015 年由正转负，同比下降 6.12%；2016 年服务贸易出口额 48077 亿美元，出现 0.4% 的微弱增长。2015 年全球软件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约为 1.3 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比重约 10%。全球软件业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企业投资乏力、市场需求疲弱、IT 深化转型等因素影响，遭遇压力。这些因素都给中国软件出口带来了严峻挑战。但是，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调整软件出口政策，中国软件出口仍然取得了较好成绩。

总体而言，中国软件出口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的拐点。但增长质量不断改善，对服务贸易发展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多元化格局日益丰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加速拓展，软件出口基地和软件园区的产业集聚能力不断增强，软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2017 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新产业革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新动能不断成长，传统动能与“互联网+”紧密融合，都将为全球软件市场带来增长效应，也为中国软件出口提供新机遇。应把握有利时机顺势而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软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软件出口质量和综合效益，推动出口价值链迈向高端水平。

二、中国软件出口现状及主要特点

（一）软件出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但整体规模实力明显增强

2015 年中国软件出口增速明显放缓，软件出口执行金额 333.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0%，较 2014 年的 18.51% 下降 7.4 个百分点；协议金额 425.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89%，较 2014 年的 17.55% 下降 4.7 个百分点；合同数量 52173 份，同比增长 -0.18%，较 2014 年的 -0.81% 微弱上升。

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增速继续出现回落，执行金额 34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1%，较上年回落 8.6 个百分点；协议金额 464.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19%，较上年回落 3.7 个百分点；合同数量 52790 份，同比增长 1.18%，较上年有所回升。尽管如此，中国软件出口实力明显提升。从 2010—2015 年整体来看，2015 年执行金额相当于 2010 年（97.3

亿美元) 的 3.43 倍, 平均增速为 29.50%; 2015 年协议金额相当于 2010 年 (126.2 亿美元) 的 3.37 倍, 平均增速为 27.62%; 2015 年的合同数量相当于 2010 年 (39044 份) 的 1.34 倍, 平均增速为 9.82%。说明业务大单逐渐增多, 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表 1、图 1)。

表 1 2010—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规模与增速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2010 年	97.3	34.01	126.2	24.42	39044	27.17
2011 年	143.39	47.36	190.68	51.09	46159	18.22
2012 年	194.16	35.4	234.2	22.82	53887	16.74
2013 年	253.56	30.59	320.71	36.94	52683	-2.23
2014 年	300.57	18.51	377.15	17.55	52265	-0.81
2015 年	333.93	11.10	425.78	12.89	52173	-0.18
2016 年	342.3	2.51	464.89	9.19	52790	1.18

数据来源: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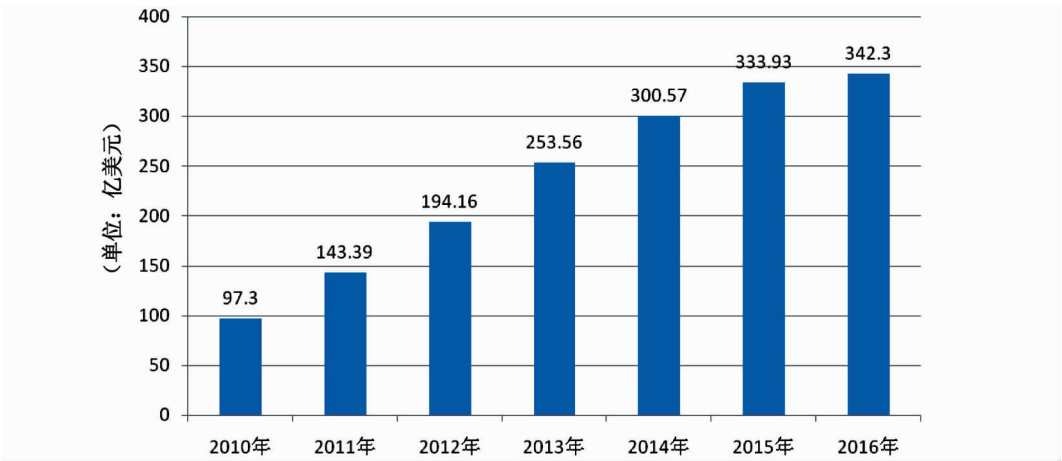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规模

数据来源: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二) 软件出口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 价值链不断向高端拓展

1. 信息技术外包 (ITO) 居主导地位, 软件产品出口波动发展。软件出口主要包括软件产品和 ITO 两大类。ITO 一直是软件出口的主要方式, 软件产品出口仅占很少部分。2015 年和 2016 年, ITO 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316.85 亿美元和 330.48 亿美元, 占比分别为 94.88%和 96.55%, 同比增长分别为 7.96%和 4.30%; 软件产品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7.08 亿美元和 11.82 亿美元, 占比分别为 5.12%和 3.45%, 较 2013 年、2014 年均有所上升, 同比增长分别为 140.96%和 -30.78%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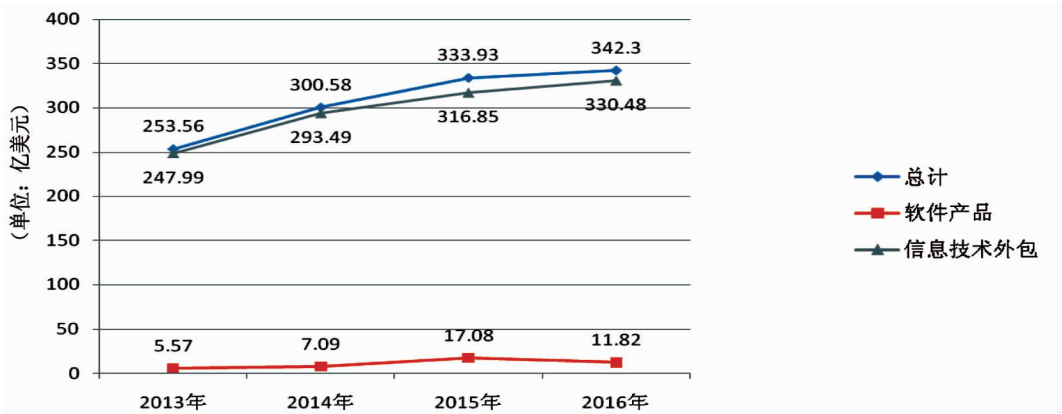


图 2 2013—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分类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2. 软件产品出口以应用软件为主，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呈波动发展。从软件产品出口结构看，应用软件占比最高，其次是系统软件。2015 年，应用软件出口执行金额 13.64 亿美元，占 79.86%，同比增长 190.54%；系统软件出口执行金额 3.39 亿美元，占 19.83%，同比增长 44.77%；支撑软件出口执行金额 0.05 亿美元，仅占 0.29%，增速下降 3.2%。2016 年，应用软件、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出口额分别为 10.49 亿美元、1.2 亿美元、0.1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88.73%、10.39% 和 0.87%；其中，支撑软件同比增长 99.93%，应用软件和系统软件同比分别下降 23.09%和 63.72%（表 2）。

表 2 2014—2016 年软件产品的出口规模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合同类别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软件产品	7.09	27.18	17.08	140.96	11.82	-30.78
系统软件	2.34	189.21	3.39	44.77	1.23	-63.72
应用软件	4.70	0.03	13.64	190.54	10.49	-23.09
支撑软件	0.053	-24.15	0.052	-3.20	0.103	99.93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3. ITO 以软件研发外包为主，高端业务不断发展。2015 年，软件研发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外包、运营和维护服务三项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217.9 亿美元、59.5 亿美元和 37.51 亿美元，占 ITO 总额比重分别为 68.79%、18.78%和 11.84%；2016 年，三项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228 亿美元、59 亿美元和 42.5 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4.64%、-0.75%和 13.23%，占 ITO 总额比重分别为 69.01%、17.87%和 12.85%。在软件研发外包

中，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软件技术服务占比较高，2016 年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61.2 亿美元、66.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5%、-1.18%，分别占软件研发外包的 70.7%、29.13%。

其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继续占主导地位并保持较好发展态势。2015 年，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测试外包服务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41.81 亿美元、1.93 亿美元和 10.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5%、59.57%和 -6.82%；2016 年，三项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40.19 亿美元、1.28 亿美元和 10.8 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3.87%、-33.68%和 -1.55%。

此外，其他新增五项软件出口也呈现总体增长态势，反映了多元化出口结构日益拓展。2016 年，IT 解决方案、其他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及其他运营和维护服务三项类别执行金额分别为 0.80 亿美元、5.57 亿美元、0.91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6.15%、61.82%、335.52%（表 3）。

表 3 2014—2016 年中国软件 ITO 的出口规模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合同类别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ITO	293.49	18.32	316.85	7.96	330.48	4.30
软件研发外包	200.40	20.25	217.95	8.76	228.06	4.64
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	120.40	19.54	150.17	24.73	161.20	7.35
软件技术服务	78.00	21.35	67.24	-15.95	66.45	-1.18
其他软件研发外包业务			0.54	-	0.41	-23.60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46.60	93.98	59.50	27.67	59.05	-0.75
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	33.62	100.82	41.80	24.35	40.19	-3.87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1.21	17.19	1.93	59.57	1.28	-33.67
测试外包服务	11.77	88.36	10.97	-6.82	10.81	-1.46
IT 咨询服务			0.60	-	0.40	-32.42
IT 解决方案			0.75	-	0.80	6.15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业务			3.44	-	5.57	61.82
运营和维护服务	40.96	-9.71	37.52	-8.42	42.48	13.23
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	24.31	22.85	25.43	4.61	31.19	22.66
基础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	16.66	-34.89	11.88	-28.68	10.37	-12.66
其他运营和维护服务			0.21	-	0.91	335.52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三）东部地区继续成为增长主力，中西部逆势而上，东北地区有所下降

从软件出口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作为主力保持上扬态势。2015 年、2016 年，东部地区软件出口占比分别为 86.20%、87.40%；西部地区占比分别为 4.90%、5.70%，中部占比分别为 3.01%、3.15%，均有所上升；东北地区占比分别为 5.90%、3.73%，有所下降。由于东北经济总体处于困境，对于软件出口造成影响（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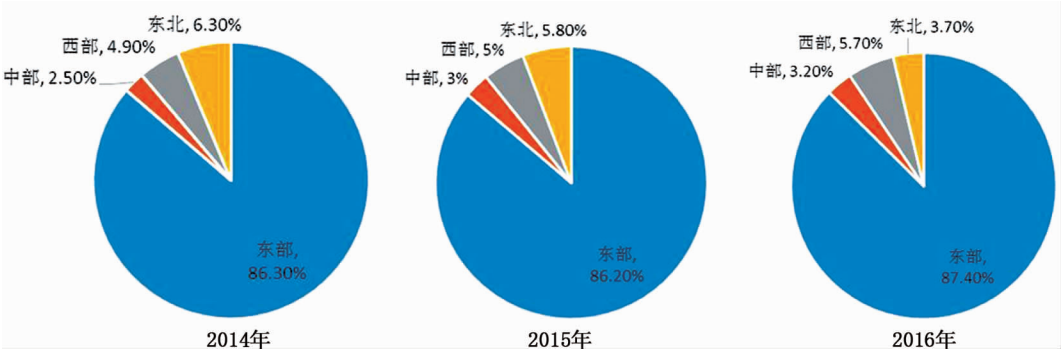


图 3 2014—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的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从东部地区内部看，2015—2016 年江苏、浙江、上海均列软件出口规模前三位。2015 年，这三个省市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18.95 亿美元、43.43 亿美元、35.52 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14.32%、34.31%、-7.73%；2016 年，这三个省市出口执行额分别为 119.59 亿美元、49.86 亿美元、36.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0.53%、14.80%、3.76%（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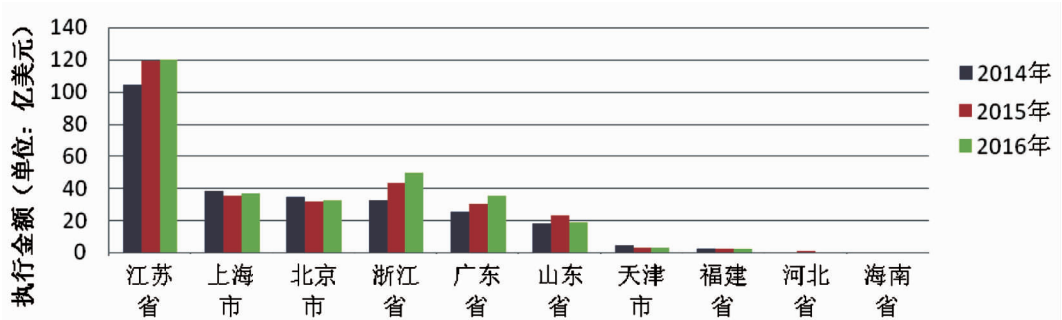


图 4 2014—2016 年中国东部地区软件出口省域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从中部地区内部看，2015—2016 年江西、湖南、湖北均分别列软件出口规模前三位。2015 年，这三个省份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4.12 亿美元、2.30 亿美元、1.99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55.86%、52.45%、11.43%；2016 年，这三个省份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4.02 亿美元、3.08 亿美元、2.54 亿美元，其中江西省呈现负增长，湖南和湖北的同

比增长分别为 33.57%、27.78%（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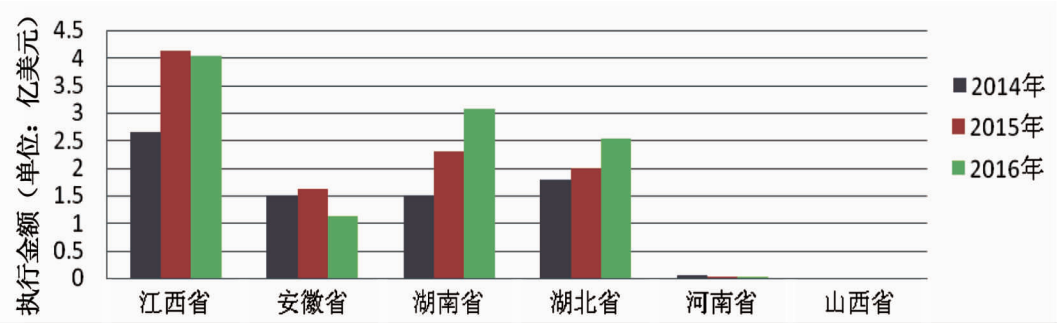


图 5 2014—2016 年中国中部地区软件出口省域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从西部地区内部看，2015—2016 年四川、重庆、陕西列软件出口规模前三位，其中重庆表现尤其出色。2015 年，这三个省市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1.33 亿美元、2.82 亿美元、2.17 亿美元，其中四川、重庆分别增长 22.12%、0.36%；2016 年，这三个省市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2.61 亿美元、4.03 亿美元、2.84 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11.35%、85.8%、0.44%（图 6）。说明西部地区仍具较大发展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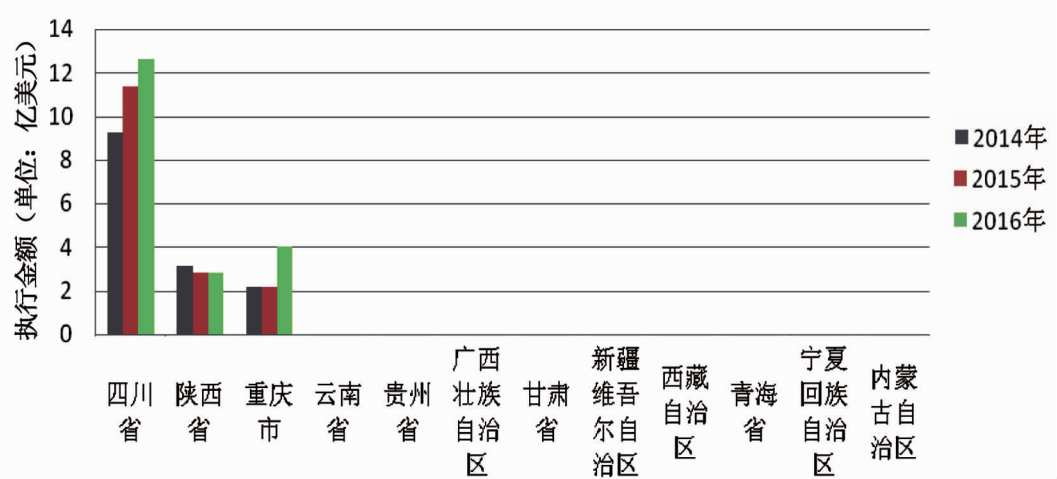


图 6 2014—2016 年中国西部地区软件出口省域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从东北地区内部看，辽宁一直遥遥领先。2015 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7.25 亿美元、1.84 亿美元、0.61 亿美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9%、96.21%、9.65%，其中黑龙江增速最高；2016 年，这三个省份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1.74 亿美元、0.37 亿美元、0.67 亿美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31.92%、-79.84%、10.76%，仅吉林表现为正增长（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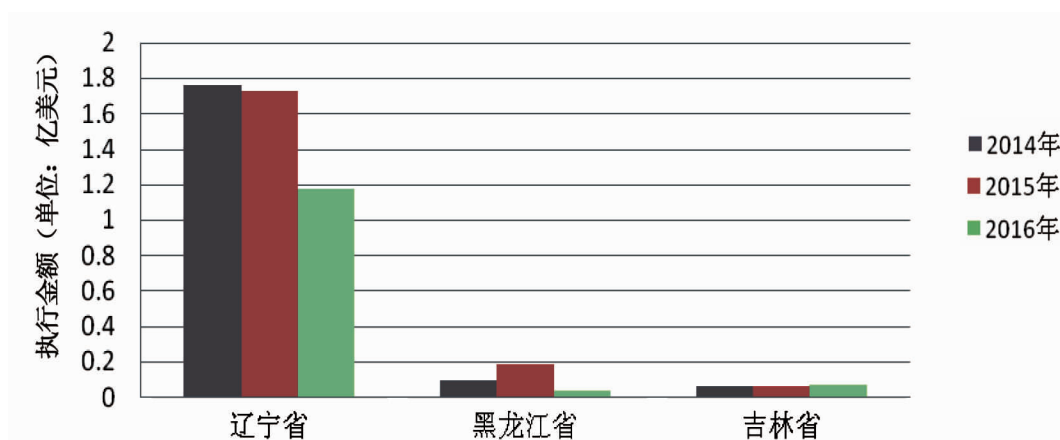


图 7 2014—2016 年中国东北地区软件出口省域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四）软件出口市场已经形成欧美日为主，面向全球的发展格局

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市场达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前 10 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德国、英国、芬兰、瑞典。其中，德国市场增速最高达 137.71%；其次为瑞典、韩国、中国香港、英国，分别同比增长 29.58%、25.79%、19.66%、9.72%；同时，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日本、芬兰分别同比下降 0.25%、3.93%、4.85%、10.08%、23.2%。说明欧盟市场潜力较大（表 4）。

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占中国软件出口市场规模基本稳定在 50% 以上。2015 年、2016 年，对三大经济体共计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70.50 亿美元、170.38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51.06%、50%。美、日都表现出下滑态势，其中日本连续两年下降。2015 年、2016 年，对美国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87.47 亿美元、83.22 亿美元，同比增速为 13.62%、-4.85%；对日本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39.88 亿美元、35.86 亿美元，同比增速为 -5.51%、-10.08%；对欧盟软件出口则出现回升态势，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43.15 亿美元、51.30 亿美元，同比增速为 -55.89%、18.9%（图 8）。

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德国、英国、芬兰、瑞典 8 个国家（地区）在中国对全球出口市场中的占比由 2015 年的 33.75% 上升到 2016 年的 39%，保持了增长态势。2015 年、2016 年内地对中国香港的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38.87 亿美元、46.52 亿美元，分别增长 25.69%、19.66%；中国对韩国的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9.34 亿美元、24.32 亿美元，分别增长 4.92%、25.79%，增幅较大（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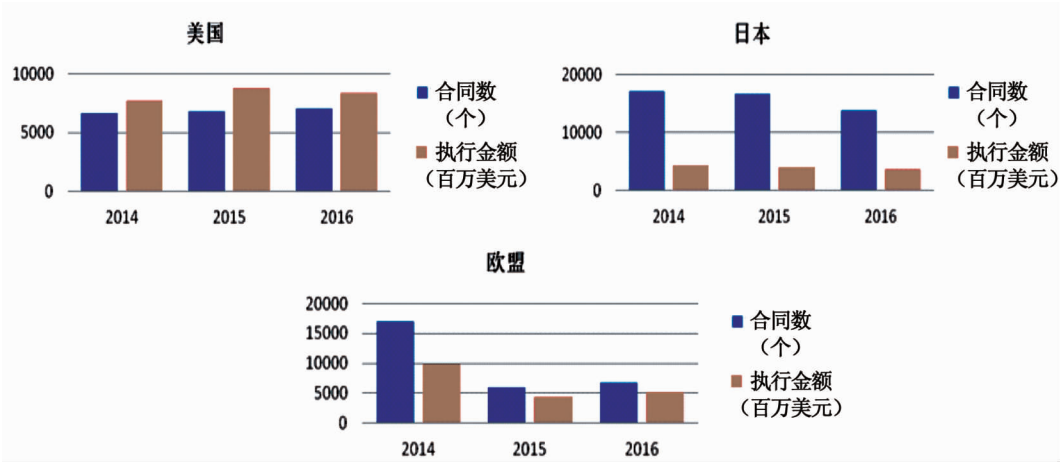


图 8 2014—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美日欧的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表 4 2014—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目的地主要国家（地区）规模及增速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地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全球	300.58	18.51	333.93	11.10	342.30	2.51
美国	76.98	4.65	87.47	13.62	83.22	-4.85
中国香港	30.93	26.74	38.87	25.69	46.52	19.66
日本	42.21	9.92	39.88	-5.51	35.86	-10.08
韩国	18.43	35.91	19.34	4.92	24.32	25.79
新加坡	16.45	45.27	20.55	24.90	19.75	-3.93
中国台湾	13.42	7.62	18.18	35.43	18.13	-0.25
德国	7.02	72.35	5.98	-14.84	14.20	137.71
英国	6.07	48.85	6.75	11.10	7.40	9.72
芬兰	4.66	-25.67	8.13	74.39	6.25	-23.20
瑞典	3.83	107.99	3.60	-6.05	4.66	29.58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取得积极进展。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六大经济走廊加快建设，中国软件出口市场也正在积极布局拓展。目前，中国软件出口已经遍及除波黑和阿联酋以外的沿线 63 个国家和地区，2014—2016 年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44.48 亿美元、54.64 亿美元和 48.75 亿美元，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14.8%、16.36%和 14.24%（表 5）。

表 5 2014—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一带一路”沿线

前 10 位国家（地区）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地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合同数 (个)	执行金额	合同数 (个)	执行金额	合同数 (个)	执行金额
总计	8598	44. 48	8454	54. 64	9436	48. 75
新加坡	1274	16. 45	1479	20. 55	1483	19. 75
印度	1480	4. 71	1467	4. 24	1598	3. 91
俄罗斯	570	5. 65	440	3. 02	425	3. 29
马来西亚	485	2. 46	657	4. 35	609	2. 94
泰国	584	1. 40	530	1. 76	733	2. 22
印度尼西亚	267	1. 17	293	2. 14	344	2. 19
沙特阿拉伯	288	1. 21	334	1. 62	308	1. 33
越南	291	1. 23	276	1. 21	297	1. 33
捷克共和国	75	0. 17	64	0. 18	180	1. 14
巴基斯坦	202	0. 61	208	2. 21	223	0. 97
其他国家	3082	9. 42	2706	13. 36	3236	9. 68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五）软件出口企业结构呈现以内资为主导的多元发展态势

中国软件出口企业结构已经由外资企业主导向内资企业主导转变，内资企业成为出口的半壁江山。2016 年尽管下降至 48. 04%，但仍是绝对主力。2016 年在内资企业中，集体企业占 34. 09%、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企业共约占 9. 35%；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占 40. 57%，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 32. 94%，中外合资企业占 5. 73%；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11. 39%左右（图 9）。

（六）以软件出口（创新）基地城市为核心、软件园区为载体的集聚效应日趋明显

中国软件出口已经形成以出口基地城市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以园区为空间载体聚集发展的态势。

1. 软件出口（创新）基地城市在全国软件出口中发挥主力军作用。2016 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大连、西安、天津、广州、成都和济南等 11 个基地城市软件出口额共计 217. 56 亿美元，占全国软件出口总额的 63. 6%；软件从业人员 132804 人，占比 34. 3%；软件企业总数 1081 家，占比 21. 4%。反映了上述 11 个城市软件企业的综合效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引领带动作用明显（表 6）。在 11 个基地城市中，杭州、南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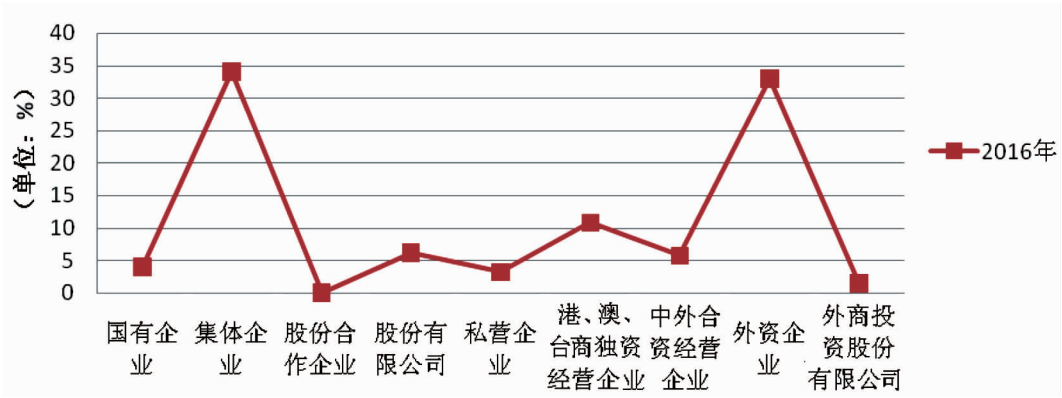


图 9 2016 年中国软件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海列前三位，执行额分别为 41.7 亿美元、37.52 亿美元、36.85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12.18%、10.96%、10.77%，企业竞争实力明显提升；从业人数前三位的城市为广州、北京、南京，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8.11%、7.46%、7.45%；企业数量列前三位的城市为南京、上海、广州，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3.6%、3.23%、3.03%。

表 6 2016 年 11 个软件出口（创新）基地城市情况

	地区	执行总额 (亿美元)	占比 (%)	从业人数 (人)	占比 (%)	企业数 (家)	占比 (%)
	全国	342.30	100.00	386655	100.00	5053	100.00
1	杭州市	41.70	12.18	3411	0.88	56	1.11
2	南京市	37.53	10.96	28787	7.45	182	3.60
3	上海市	36.86	10.77	13074	3.38	163	3.23
4	北京市	32.37	9.46	28844	7.46	109	2.16
5	深圳市	26.93	7.87	9850	2.55	135	2.67
6	成都市	12.60	3.68	1787	0.46	68	1.35
7	大连市	11.15	3.26	5723	1.48	42	0.83
8	广州市	7.91	2.31	31376	8.11	153	3.03
9	济南市	4.89	1.43	4959	1.28	90	1.78
10	西安市	2.82	0.82	2326	0.60	46	0.91
11	天津市	2.81	0.82	2667	0.69	37	0.73
软件出口（创新） 基地城市合计		217.57	63.60	132804	34.30	1081	21.40

资料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2. 软件园区成为软件出口和软件业发展的主要载体。近年来，软件产业园积极吸引优势企业 and 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日益增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软件园区 200 多家，成为全国软件出口的主要集聚区。2015 年，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43 个园区总收入 23792 亿元（软件收入 17623 亿元），占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比重达 41%，同比增长 21.36%，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4.76 个百分点；其中，2015 年园区软件产品收入为 5054.6 亿元，占全国的 36%。2015 年 43 家园区实现总出口额 334.1253 亿美元，其中软件出口额 206.5627 亿美元，增长 15.85%，占全国软件出口总额的 62%。

（七）软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化竞争实力不断提升

2015 年，全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 29.24 万件，同比增长 33.63%；2016 年，全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 40.8 万件，同比增长 39.5%，首次突破 40 万件大关，也是 2010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截至 2016 年底，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累计获得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CMM）等国际资质认证 6750 项。基础软件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产品质量和解决方案成熟度显著提升。软件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掌握核心技术，依托移动互联网和云服务进行服务模式创新，竞争力明显增强。部分重要行业领域取得突破，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大型枢纽机场行李分拣系统、千万吨级炼油控制系统等重大应用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新兴领域创新活跃，一批骨干企业转型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平台化、网络化、服务化的商业模式创新成效显著，涌现出社交网络、搜索引擎、位置服务等一批创新性产品和服务。

工信部发布的 2016 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中，华为、中兴通讯、海尔分列第一、二、三位。其中，华为 2015 年软件业务收入增长 20.5%，2016 年研发投入达 630 亿元。2015 年软件前百家企业共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6005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共实现利润总额 1524 亿元，同比增长 48.2%。软件业务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有 7 家，其中，京东尚科、科大讯飞、金山软件、华讯方舟、阿里云软件业务收入分别增长 79%、73%、69%、68%、63%。软件前百家企业中民营企业共 55 家，实现软件业务收入占前百家的 60.7%。一批有实力的软件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海外融资、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活动明显增多。2015 年蚂蚁金服收购印度支付服务业者 One97 Communications 25% 股权，同年阿里巴巴与蚂蚁金服投资印度电商 Paytm 成为最大股东，2016 年以 10 亿美元收购东南亚主流电商平台 Lazada；中兴通讯、京东正加快在俄罗斯、印尼、印度、巴西等“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布局；华为在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

（八）人力资源结构以大学生为主，不断向知识化和高端化发展

中国软件企业从业队伍不断呈现知识化、年轻化、高端化趋势，为提升软件出口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软件从业人员数量由 2010 年的 260.3 万增长到 2016 年的 855.7 万人，年均增长 38.1%，成为各产业吸纳就业增长率最高的产业之一。其中，大学（含大专）占 65%，成为中国向数字化社会转型的人才储备库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从业人员以 30 岁以下为主（占比约 80%），30 岁以上的开发者以高级工程师、架构师、技术专家等职位居多，40 岁以上的开发者主要从事架构设计岗位。从产业分布来看，除 IT 领域达 35% 占主要份额之外，制造、交通、教育、电信、金融等领域的软件从业人数占比超过 48%，说明软件业与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性越来越强。从软件人才的区域分布来看，南京、济南、成都、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杭州 8 个软件名城占 60% 以上。软件研发人才增长较快。2015 年软件百强企业研发人员共 55 万人，总人数占比达 54%。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报告显示，美国占世界软件开发人员 19.2%，中国、印度分别列第二、三位，分别占 10.1%、9.8%。

三、中国软件出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

（一）要素成本全面上升，削弱了软件企业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软件业人力成本及土地、资金、交通、通信、电力、税收等要素成本全面上升，已经成为影响软件出口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2010 年以来，软件服务外包业人力成本以每年不低于 10% 的速度递增。据调查，2016 年一些软件企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 15.3%。2016 年全国软件开发者中，平均月薪 1 万元以上的开发者占 45%，较上年上升 12%；月薪 2 万元以上的开发者数量占比增长 67%。如，博彦科技 2015 年营业收入 17.2 亿元，员工近 8000 人，其中薪酬总额 11.9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69%，远高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自 2010 年，软件服务外包业逐渐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向西安、武汉、成都等二三线城市转移。近年来二三线城市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上升较快，成本优势也逐渐减弱。

（二）软件企业创新投入不足，竞争力仍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软件出口产品附加值低、企业抗汇率风险能力差，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由于大部分软件企业以服务外包为主，缺乏核心技术，绝大多数软件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没有设立研发机构，不能进行自主研发，重点领域知识产权缺乏积累，尤其缺乏面向垂直行业的咨询与解决方案的能力。根据 2016 年 7 月普华永道发布的“全球软件百强企业”

报告，全球软件重点企业美国占 75%，排名前 20 的企业有 15 家为美国企业；其次为欧洲、加拿大、日本，占 22%；中国企业仅东软集团一家入围。中印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2015 年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营业额达 145 亿美元，而我国 43 家火炬软件计划产业基地园区 2015 年平均每家企业收入 6075 万元，多数为中小企业。

（三）软件人才缺口较大，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中国软件人才培养规模仍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缺乏领军型、复合型、高技能、国际化人才，这是制约中国软件出口和软件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据统计，未来 5 年中国信息化人才需求量将达 1500 万~2000 万人，其中软件开发、网络工程、网络营销等人才缺口尤其突出。中国软件人才需求量以每年 20% 的速度递增，每年新增需求近百万人，Java 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软件工程师、Android 开发工程师等 IT 人才缺口很大。软件业长期呈现中间人才多、“高精尖”和基础性人才缺乏的“橄榄型”结构。目前，全行业取得国际认证资格的软件人才较少。截至 2015 年，11 个重点软件出口园区中，仅中关村软件园获得国际软件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CSDP）的人数占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企业人员比重为 7.5%，其他园区此项指标皆为零。由于院校毕业生多数不适应软件企业需求，软件企业和外包商大都设有自己的培训学校和基地，以完成就业上岗“最后一公里”。这一阶段的培训，企业需要投入 5%~8% 的经济成本和 6~18 个月的时间成本。同时，大部分院校仅开设英语课程，语种严重不足，语言成为对日本、欧洲外包业务的最大障碍。

四、中国软件出口市场前景与发展机遇

2017 年中国软件出口虽面临全球政治局势动荡、贸易增速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持续等挑战，但仍面临许多有利因素。智能制造、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将扩大全球软件市场需求。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型全球化中将更加积极可为，全球治理话语权不断提升，为软件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推动全球软件业增长和创新的动力

1. 全球软件市场将保持增长态势。据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预测，2017 年全球 IT 与软件支出将增长 2.9%，其中数据中心系统支出 1770 亿美元，软件支出 3570 亿美元，IT 设备支出 6000 亿美元，IT 服务支出 9430 亿美元，分别增长 2%、7.2%、0.4%、4.8%。预计 2017 年全球软件服务支出达 108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以云计算、大数

据和移动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开启服务外包的新时期。预计到 2020 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 1.65~1.8 万亿美元，其中离岸服务外包规模约 4500 亿美元。从发展领域看，未来软件业的优势领域主要有数据库、支撑软件包、虚拟现实、WAP 技术、基于神经系统的多媒体应用、实时和对安全性要求高的软件，以及金融、财务软件和娱乐软件等。

2.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发展趋势。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3D 打印、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VR/AR/MR）、区块链等新技术加快应用，众创、众包、众筹等平台经济模式加快成长，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作为未来新经济的主要引擎将带动软件业发展。2016 年，全球移动互联网规模达 7000 亿美元左右。据相关机构预测，2017 年全球云计算行业规模将达 1070 亿美元，年均增速 20% 以上；2020 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将突破 2630 亿美元。大数据的发展将带来金融风险管控、智能控制、社交营销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变革，围绕大数据的汇集挖掘、处理分析、开发存储等新的外包服务将保持增长。传统软件系统架构难以支撑大数据发展，需要建立以虚拟化、并行计算、分布式存储和自动化的云计算架构。智能制造发展将加速软件研发创新。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 3D 打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制造在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推动了软件业和制造业加速融合。个性化定制、数字制造、网络智能制造、软硬件融合等新的制造范式正在兴起；传统制造业正在朝着绿色低碳、网络智能、超常融合、共创分享的高端新型制造发展，围绕智能制造的软件产品和信息技术服务将呈现爆发式增长。

3. “软件即服务”成为软件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趋势。未来软件服务增长将快于软件产品增长，增值服务将成为软件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软件企业在发展中更加注重服务模式创新。一些规模较大的软件公司由过去销售产品发展成与客户签订服务协议的方式，由一次性购买发展成年度订购的方式。依托云计算有效降低了软件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实现了交付模式创新。众包平台通过一对多的方式提高了服务规模效益。在合作模式上，发包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更加注重利润分享、共享风险回报等新的合作方式。

4. 软件产业链和价值链呈现融合化、高端化发展的趋势。在新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驱动下，发包方更注重利用外包实现自身业务转型。提升创新能力和构建核心竞争力，需要外包企业提供更多具有创新性、高端化和集成化的服务，因而促进软件企业向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导致软件产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业务领域发

展。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将越来越融合发展，KPO 业务将保持较快增长。

（二）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具有双向拓展空间

1. 美欧日传统市场有望保持稳步增长。美国作为全球最大软件发包国，发包规模占全球市场的 55% 以上，欧洲和日本分别占据第二、三位，市场份额分别为 25% 和 10% 以上。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全球投资，实施振兴制造业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美投资，同时带动软件产品和服务出口。通过扎实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BIT）、深化探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谈判（BITT），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都将为软件出口便利化创造有利条件。“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中国与欧盟、中东欧 16 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随着《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积极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将为对欧软件出口创造有利环境。

2. “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前景广阔。“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及地区信息化和工业化程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网络覆盖率低、数字鸿沟巨大，为中国软件企业输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建立自主标准、扩大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随着海陆空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数字信息共享水平不断提高。中哈、中吉、中塔、中巴国际跨境陆地光缆系统，亚欧信息高速公路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为软件出口提供了技术支持。国际产能合作、装备合作不断发展也将带动软件出口市场发展。

3. 非洲地区工业化和信息化空间巨大。近年来，非洲开放水平日益提高，尤其是南非、加纳、纳米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投资环境日益受到投资者好评。中国对非投资截至 2015 年已连续 15 年增速超过 30%，为扩大对非软件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

4. 全球自贸区网络不断扩大。截至 2016 年，中国已经签署 14 个自贸协定，涉及 22 个国家和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RCEP）、亚太自贸区战略等稳步推进。有效提高自贸区的使用效率，将扩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

（三）国内软件业加快发展，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2016 年，全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业、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38.2%、20.8%、32.5%、18.0%，均实现了高速增长。《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战略以及新兴业态发展，都将提高国内软件业创新能力，为软件出口打下坚实基础。根据科尔尼咨询公司（AT Kearney）发布的“全球离岸服务目的地指数排名”显示，2014 年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在财税吸引力、技术

人才及商业环境方面综合实力居前三位。近年来，国家从税收和研发经费等方面不断加大软件企业的扶持力度，更加注重鼓励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及国际化发展，为国内软件企业做大做强创造了有利政策环境。

五、促进中国软件出口的主要发展思路

（一）着力提高软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提高软件企业增值能力，推动价值链迈向高端的先决条件。应在政策环境上为提高软件企业的自主研发设计能力、制定自主标准、打造自主品牌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软件产品出口规模，提高 ITO 高端服务能力。一是增强软件业融合创新能力。利用智能制造带来的机遇，推动软件业与制造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融合发展，通过推动生产装备智能化、工艺流程改造、基础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加强绿色设计、智能设计、网络设计软件研发等，提高软件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软件业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融合。二是引导企业增加研发设计创新投入。重点加强核心关键技术、基础性研发设计投入，注重发挥财税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自主研发软件产品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风险补偿力度。三是引导软件企业加快服务模式创新。引导大企业向提供综合化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转型，提高服务增值能力。四是鼓励国内软件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联盟合作等方式，加快形成创新能力强、有品牌影响力的软件领军企业。五是优化中小软件企业创新创业生态。鼓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软件企业提供综合服务，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和服务平台建设。加强重大创新项目支持力度，推动形成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生态。

（二）加强软件强国人才体系建设

把创新型人才作为提升软件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一是营造包容、宽容、兼容的创新环境，建立吸引软件人才和激发创造性的激励机制，健全绩效分配和股权激励机制。二是提高软件人才国际化水平。建立国家及地区国际软件人才库和人才信息平台，形成软件人才共享机制。鼓励海外人才回流，吸引留学生回国创新创业。积极参与国际软件企业和人才认证，在国际软件业的相关规则、标准制定方面提高话语权。三是引导高校设置适应企业需要的软件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大力发展职业院校，培养各类软件基础性人才，形成“金字塔”形的软件业人才结构。四是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鼓励大学生和研究生在校期间参与企业科研项目，鼓励软件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

（三）积极拓展软件出口市场空间

一是寻求新一轮全球化机遇，挖掘美日欧传统出口市场潜力。在加快对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投资的同时，扩大相关软件出口。加快制定欧盟地区软件出口战略，提高语言、标准、技术等服务能力，促进欧盟释放软件外包业务。鼓励中国软件企业在美国、日本、欧盟设立研发机构，提升本土软件开发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二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布局，利用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装备合作等项目扩大软件出口，推广使用自主研发设计、自主标准、自主品牌的软件产品，增强自主知识产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扩散效应。推动建设中东欧、俄罗斯、东南亚、南亚、中亚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软件产业联盟，建立共商共建共享机制，加强共同研发和贸易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大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相关国家信息服务，加强监测分析，强化风险预警机制。三是有步骤地实施走进非洲战略，发展对非软件外包业务。

（四）优化软件出口政策和营商环境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提高创新能力为重点，不断完善软件出口相关促进政策。注重发挥产业、科技、金融、财税、外汇等政策组合拳效应，提高软件产业政策的协调联动效应，从不同方面优化软件出口企业发展环境。鼓励大企业向中小软件企业分包业务。支持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企业通过工程承包、对外投资等方式推动软件出口。进一步完善出口信用担保、出口保险体系，减少国际市场波动性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加强软件出口大数据建设，提高信息共享水平和服务企业能力。

参考文献：

1. 王晓红、艾冰：《中国软件出口的现状、趋势及“十三五”战略思路》，《全球化》2016年第5期。
2. 杜振华、刘智颖：《打造软件出口强国的人才体系建设研究》，《全球化》2017年第8期。
3. 刘志斌、祝琳：《欧洲软件业与贸易发展的现状、特点及趋势》，《全球化》2017年第8期。

责任编辑：李蕊

推进沿边重点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研究^{*}

——以瑞丽经验为例

周先平 朱新蓉 张健 邱龙宇

摘要：在沿边重点地区的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进领域和方向。瑞丽市作为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前沿阵地，在跨境结算渠道建设、中缅货币兑换、中缅边境地区银行间合作三大领域开拓创新，推动了中缅跨境交易中的人民币使用。沿边重点地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存在诸多问题，瑞丽市“创新突破、先行先试、风险可控、稳步推进”的实践能够为其他沿边重点地区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瑞丽经验 沿边重点地区 人民币跨境使用

作者简介：周先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滇西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朱新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张 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邱龙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家级口岸、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重点地区，是我国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沿边地区经济

^{*} 本文得到 2016 年、2017 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省金融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滇西金融研究院项目资助。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确保边境和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其正在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先手棋和排头兵，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推动沿边重点地区的开放发展，201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沿边重点地区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有天然的优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与有关邻国就已开始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2003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边境贸易外汇管理办法”，允许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2008年12月，国务院决定对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公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由此可以看出，在沿边地区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从一开始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进领域和方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紧邻缅甸，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拥有2个国家级口岸和2个省级口岸，自古便是中缅两国贸易往来发展的核心集散地。其中，德宏州瑞丽市与毗邻的缅甸木姐州均已成为两国贸易往来最大的陆路口岸地区，双边贸易额占云南省对缅贸易近75%，占全国对缅贸易超过20%。

瑞丽市作为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前沿阵地，始终坚持“创新突破、先行先试、风险可控、稳步推进”的原则，全力推进沿边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瑞丽市在跨境结算渠道建设、中缅货币兑换、中缅边境地区银行间合作三大领域开拓创新，推动了中缅跨境交易中人民币的使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多，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交汇点。现阶段沿边重点地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存在诸多问题，瑞丽市因地制宜、开拓创新的实践能够对其他沿边重点地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从跨境交易人民币使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文献非常多，从跨境交易人民币使用的视角来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研究热点。李婧（2004）分析了人民币跨境流通的主要途径、规模和境外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基本特点，总结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主要原因和特点，讨论了人民币跨境流通与使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李东荣（2009）研究了如何从计价结算入手，更好地在对外交往中行使人民币的各种货币职能。宗良（2010）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应该从贸易结算、投资等领域分阶段推进。汪洋（2011）指出，跨境贸易以人民

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他分析了对外贸易结算货币的不同组合及其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并对中国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特征进行了讨论。孙杰（2014）从文献、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展开分析，强调推进跨境交易的人民币化是当务之急。潘润枫（2015）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影响。

许多学者结合跨境人民币业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李婧（2011）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运行效果及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切入点，对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进行展望，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要在亚洲相邻国家、地区获得巩固和拓展。孙志军（2012）提出，中国应立足国情，充分结合实际，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的顺序，扩展使用地域范围，逐步推进人民币的计价结算，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朱珊珊（2014）强调，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不断推进，逐步暴露出清算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短期来看，要将境外清算行模式、代理行模式等清算模式协调运作的效益最大化，长远来看，要开发独立的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郑之杰（2015）建议，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以多边性安排提升人民币使用效率。

（二）云南沿边地区跨境交易的人民币使用

牟怡楠（2010）指出，扩大人民币跨境流通，实现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的重要环节。云南省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边境地区人民币的广泛使用，使得研究该地区人民币跨境流通具有重要意义。杨国辉（2011）认为，随着跨境结算带来的云南周边国家人民币流通规模的增加，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深入开展以及由于跨境结算使人民币货币职能和服务对象的外延化，需要在昆明建设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白琳（2012）将研究置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设、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及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大背景下，以德宏州为例，对云南沿边地区区际、国际等二重开放情况及特征进行研究，探索沿边地区开放的路径及选择。王元涛（2015）在对滇桂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内容及意义解读的基础上，借鉴温州、上海、深圳前海及滇桂两省区改革中的精髓，提出了滇桂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实现路径。

综合来看，学术界对人民币国际化高度关注，但对沿边地区的人民币跨境使用研究欠缺。沿边地区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市场的人民币国际化差异比较大，有其独特的地方。瑞丽市在跨境结算渠道建设、中缅货币兑换、中缅边境地区银行间合作三大领域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可以为推进沿边重点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借鉴。

三、瑞丽在推进沿边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经验

（一）因地制宜，丰富跨境结算渠道

商业银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一般有两种模式，即代理模式和清算模式。代理模式，主要是指中资行委托外资行作为其海外的代理行，境外企业在中资企业的委托行开设人民币账户的模式；清算模式主要是指在中资行境内总行和境外分支行之间进行的业务，即境外企业在中资行境外分行开设人民币账户。

目前，中资银行中仅有工商银行设立了仰光分行，中国银行设立了仰光代表处，缅甸银行没有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在中缅之间代理模式和清算模式等银行间正式结算渠道都不顺畅的情况下，瑞丽市因地制宜，多种措施并举，拓展了跨境人民币结算渠道。

1. 用活外籍人士、境外机构账户管理政策

2008年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出台了《云南省边境地区涉外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并得到了人民银行总行的批复，明确了对外贸易机构、境外边民账户开立和使用的管理办法。德宏州进一步简化了开户手续，创新推出了缅甸籍人士人民币结算账户。2009年7月13日，国家外管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境内银行为境外机构开立境内账户。

外籍人士、境外机构的人民币 NRA（Non-Resident Account）结算账户，为边民互市贸易大开方便之门，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币在中缅贸易中的计价结算，推动了人民币在缅甸的区域化。

2. 在缅甸设立非现金跨境支付服务点

2014年4月3日，银联商务云南分公司与瑞丽金通进出口有限公司决定在缅甸木姐市设立非现金跨境结算服务点（取现限额为1000元/笔，转账限额为2万元/笔），为中缅双方企业、居民、游客提供销售终端（POS）转账和自动取款机（ATM）小额取现跨境支付服务。此项业务的开通，不仅填补了我国在缅甸边境地区无跨境支付服务点的空白，而且对双边经贸往来和金融合作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4年11月27日，瑞丽市金通公司与瑞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缅甸木姐市合作设立金融支付便民服务点，成为瑞丽市非现金支付工具境外沿边地区使用的又一重大突破，对于提高中缅边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促进与缅甸建立更紧密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3. 开创基于“本土”的跨境结算渠道

鉴于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短期内难以建立基于双边的银行间对开账户，在此

背景下，瑞丽市主动作为，在政策允许、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致力于开创基于瑞丽本土的单边跨境结算渠道，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

(1) 2015 年 12 月，瑞丽市政府与银联云南省分公司、云南惟诚银通网络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瑞丽市人民币跨境结算合作框架》《瑞丽市电子招投标及跨境贸易电子服务平台合作框架》。同日，在瑞丽市姐告举行云南省首个刷卡无障碍示范区启动仪式，银行卡刷卡无障碍示范区正式落户瑞丽市。

(2) 2015 年 12 月，瑞丽市政府与银联云南省分公司、银联国际东南亚代表处以及一家跨境电商合作，为德宏州量身打造“银行卡+跨境结算”渠道，通过银联国际在缅甸的业务拓展，为德宏跨境贸易、边民互市群体提供现实可操作的银行卡跨境结算服务。目前，小额银行卡双币种结算在国内和缅甸众多城市已经能够实现。

(3) 近年来，瑞丽市先后促成缅甸经济银行、缅甸合作社（CB）银行、环球财富银行等缅甸国有和私人银行到国内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富滇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并正式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中缅跨境银行间的账户结算有望真正实现。

(4) 2015 年，以建设银行作为试点，成功实现对缅内陆地区银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欧元、美元直汇，初步构建起对缅银行外汇跨境结算通道。

（二）疏堵并举，规范民间兑换市场

中缅货币兑换及其汇率是中缅边贸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服务中缅两国经贸方面，民间兑换机构发挥的效用要比银行大得多。在银行间市场没有挂牌缅币汇率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汇率定价权，规范民间兑换，确实是一个难题。瑞丽市确定了疏堵并举的工作思路，通过两项措施逐步规范民间兑换市场。

1. 打造中缅兑换中心，发布瑞丽指数

瑞丽市自 2011 年底开始扶持特许兑换机构参与市场竞争，尝试引导和建立有监管的货币兑换机制。2012 年，瑞丽大通和台丽两家公司获批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权，成为云南省首家获取个人本外币兑换业务经营权暨首家挂牌缅币兑换业务的企业。2015 年 3 月 31 日，瑞丽市以抱团发展、统筹定价的发展模式整合了现有 4 家特许兑换机构，成立了全国首个中缅货币兑换中心，围绕货币兑换最核心的汇率问题，推出每周定期发布的中缅货币兑换“瑞丽指数”，使规范民间兑换市场实现了阶段性突破。

在中缅两国互不挂牌经营对方货币的情况下，“瑞丽指数”的形成主要综合各家兑换机构人民币与缅币兑换汇率，同时参考缅币兑美元汇率，定期发布 7×24 小时的区域性中缅货币兑换中间指导价。“瑞丽指数”的提出为特许业务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代表着

国内首次出现人民币与缅币兑换汇率的官方价格。

2. 辖内农业银行正式挂牌经营缅币

2016年6月22日，瑞丽农行泛亚中心成立，正式挂牌经营缅币，同时搭建货币报价平台。目前，农行通过两种渠道掌握人民币与缅币汇率定价：一是瑞丽市民间兑换市场日间价格指数；二是省农行及农总行根据美元及缅甸官方公布的兑换价格折算兑换指数。从近半年的操作实践来看，可以说，农业银行已初步具备了人民币缅币的汇率定价能力，公布的兑换指数基本符合兑换市场指数，目前的瓶颈仅在于如何拓展客户市场、如何获取用于兑换的缅币以及如何平盘的问题。

（三）因势利导，推进地区银行合作

中缅之间缺乏国家层面的金融合作协议，没有签署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在此背景下，瑞丽市先行先试，与缅甸毗邻的木姐州建立了银行间的合作机制。

1. 建立基层银行合作机制

瑞丽市大胆探索，在云南省率先建立“中国·德宏州——缅甸·木姐州”和“中国·瑞丽——缅甸·木姐”两个层次的基层银行间定价会晤机制，每年组织活动不少于2次，成为了中缅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的标志性事件。在不断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双方合作开展了诸如人民币和缅币反假知识培训、两国金融业务发展讲座、销售终端（POS）、自动取款机（ATM）业务知识培训、现金管理知识培训、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业务培训、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讲座等活动。

目前，会晤成员不断增多，联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德宏州辖内13家银行、缅甸木姐地区14家银行均参与其中，银联云南省分公司、银联国际东南亚代表处、银联国际缅甸代表处、德宏州4家特许兑换企业先后成为定期会晤机制会员单位，成员范围从银行逐步向外发展，影响力与日俱增。从缅甸方面的情况看，会晤机制目前已经完全能够调动缅甸木姐地区的银行金融资源参与合作，并有能力与缅甸各家商业银行总行、各大城市分行甚至缅甸央行取得联系并保持沟通。

2. 建设银行与缅甸合作社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2015年1月，建设银行与缅甸合作社银行签署了人民币代理清算协议、人民币清算协议、边贸结算网上银行协议，进一步推动中缅边贸及跨境人民币结算进程，更好服务中缅经贸企业，帮助企业实现跨境资金落地，为企业“走出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沿边重点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存在的问题

虽然沿边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由于沿边地区及边贸的特殊性，

导致沿边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现金结算比例高，民间兑换机构活跃，资金监管难度更大。

（一）银行结算渠道有待完善，现金交易占比很高

中国大部分边境省份（自治区）与邻国铺设了一些银行渠道，但数量还是偏少。比如，中国银行是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与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 余家机构建立代理行关系，为 119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理行客户开立跨境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 1508 个。虽然中国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数量比较多，但是分布在接壤国家的机构网点仍然较少。截至 2016 年底，中国银行在港澳台拥有 9 家主要机构，亚太地区拥有 23 家主要机构，欧洲地区 19 家，美洲地区 7 家，非洲地区 7 家，在沿边接壤国家只拥有 6 家主要机构，其中 2 家还是代表处（见表 1）。

表 1 中国银行在沿边国家的主要机构

哈萨克斯坦	中国银行哈萨克有限公司
越南	胡志明市分行
老挝	万象分行
缅甸	仰光代表处
蒙古	乌兰巴托代表处
俄罗斯	中国银行俄罗斯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2016 年中国银行年报

另一方面，沿边国家在中国设立的机构数量也非常少。截至 2015 年底，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 5 个国家设立了 22 家机构，其中绝大部分是代表处。^①

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优势在于资金雄厚、信用好，缺点在于成本高、需要提供相关单据证明。银行渠道中的代理模式还存在耗时长、效率低的问题，也不能很好的解决双方客户的汇率风险问题。边境贸易和旅游购物具有金额小、灵活的特点，因此，银行渠道的匮乏加上银行渠道的缺点，导致费用低廉、成交方便的现金交易更具有竞争优势。

（二）沿边外币在银行间市场挂牌的极少，民间机构成为货币兑换主体

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欧

^①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概览》，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年版。

元、日元、港币、英镑等 23 种货币的中间价，只有卢布一种货币是沿边国家的货币（见表 2）。

表 2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汇率中间价的币种

美元	韩元	土耳其里拉
欧元	阿联酋迪拉姆	墨西哥比索
日元	沙特里亚尔	澳元
港元	匈牙利福林	加元
英镑	波兰兹罗提	新西兰元
林吉特	丹麦克朗	新加坡元
俄罗斯卢布	瑞典克朗	瑞士法郎
南非兰特	挪威克朗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由于没有在银行间市场挂牌交易，国内银行无法在外汇市场对冲风险，因而不愿意持有境外货币头寸；由于沿边国家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落后，境外居民持有人民币头寸没有显著的收益。因此，往来账户不留头寸、实时平盘成了许多边贸结算银行的最优选择。

民间机构提供的兑换手续简单、费用低廉、业务灵活，成为边境地区结算的主力军。民间机构通过掌控边境地区的清算环节，牢牢控制了人民币兑外币汇率的定价权。由于民间机构的汇率报价具竞争力，在缺乏银行间市场的情况下，银行基本上选择民间机构作为头寸交易对象，对冲风险，导致民间机构反而掌握了汇率的定价权。

（三）境外人民币存量有限，现钞跨境调运仍是难点

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一个前提是境外需要有足够的人民币资金池，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渠道很多，主要有探亲馈赠、随身携带、旅游消费、边贸结算、银行渠道、投资、走私等方式。在沿边地区，通过正规渠道流出的人民币较少，携带出境是一个重要方式，但是携带的人民币主要是一些交易零头和服务贸易项下的款项，携出量不大。而且，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为 20000 元。这些都导致人民币在境外的存量有限，境外的人民币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制约了人民币在贸易往来中计价结算职能的推进。

另外，人民币现钞的调运仍是难点，需要双方金融监管机构、商业银行、海关、边防等多部门合作协商。

表 3 人民币沿边地区跨境流动的渠道

人民币流出	人民币回流
边贸地区通过银行渠道对外支付	边贸顺差
民间兑换机构携带现钞出境	边贸外方人员携带入境
境外直接投资	探亲、旅游外方人员携带入境
中方人员出境旅游、经商、探亲携带出境	中方出国人员回国时将所携人民币带回
外方人员回国时将未用完人民币携带出境	民间兑换机构将人民币携带入境
	非居民用人民币到境内购买商品、劳务、资产

（四）非合规的人民币现钞流动频繁，监测和统计非常困难

沿边地区非合规的人民币跨境流动频繁，主要以现钞的形式进行，游离于统计之外，导致对其监测相当困难。一是边贸进口项下的人民币对公支付和对私支付混乱，居民支付和非居民支付混淆，国际收支申报失真的情况十分严重。二是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仅统计银行部门的数据，但是大量的资金通过民间机构兑换。三是受地理环境的因素影响，一些边境地区历来是非法交易的主要通道。比如，云南省由于陆路边境线较长，邻国边境地区政治、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很多边境地区成为毒、赌、洗钱等非法经济活动的密集地带。非法经济活动导致的非法资金运转，增加人民币资金规范识别与反洗钱监管难度。

五、推进沿边地区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

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 14 个，分别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宗教等差异巨大，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经贸关系各不相同，如何在沿边地区拓展与这些国家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供使用。但是，瑞丽经验的实质是可以参考的。瑞丽经验的实质是坚持人民币跨境使用正规化的长期目标，从实际出发，主动作为，建立了适合中缅沿边地区特色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体制机制。

（一）从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多层次的结算渠道

中国与接壤国家人民币结算的顶层制度安排仍然不够。截至 2016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已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盖东南亚、西欧、中欧、中东、北美、南美、大洋洲和非洲等地，只有老挝是接壤国家（见表 4）。

表 4 中国境外的人民币清算行及成立时间

国家和地区	成立时间	清算行
中国香港	2003 年 12 月 11 日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澳门	2004 年 9 月 11 日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中国台湾	2012 年 12 月 1 日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
新加坡	2013 年 2 月 1 日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柬埔寨	2014 年 3 月 18 日	中国工商银行金边分行
英国	2014 年 6 月 1 日	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
德国	2014 年 6 月 1 日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
韩国	2014 年 7 月 1 日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
法国	2014 年 9 月 1 日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
卢森堡	2014 年 9 月 1 日	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卡塔尔	2014 年 11 月 1 日	中国工商银行多哈分行
加拿大	2014 年 11 月 1 日	中国工商银行（加拿大）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2014 年 11 月 1 日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
马来西亚	2015 年 1 月 1 日	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泰国	2015 年 1 月 1 日	中国工商银行（泰国）有限公司
老挝	2015 年 3 月 26 日	中国工商银行万象分行
智利	2015 年 5 月 1 日	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
南非	2015 年 7 月 8 日	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
阿根廷	2015 年 9 月 18 日	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有限公司
赞比亚	2015 年 10 月 9 日	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
瑞士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中国建设银行瑞士分行
美国	2016 年 6 月 8 日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信息整理而得

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与 3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14 个接壤国家中，仅包括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见表 5）。

在顶层制度安排不够的背景下，可以借鉴瑞丽经验，建立多层次的结算通道。作为正规的银行渠道，以下几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双边银行依照商业银行原则互开本币账户，提供双边结算安排；二是中国境内银行作为境外银行的代理行，实现跨境支付清算，境外银行人民币清算需求可以通过其境内代理银行在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中完成；三是如果将来条件成熟，可以将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延伸至境外国家，提供支付清算服务。

表 5 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央行或货币当局

国家或地区	数量	国家或地区	数量	国家或地区	数量
韩国	3	泰国	2	斯里兰卡	1
香港	3	巴基斯坦	2	俄罗斯	1
马来西亚	3	阿联酋	2	卡塔尔	1
白俄罗斯	2	土耳其	2	加拿大	1
印尼	2	澳大利亚	2	苏里南	1
阿根廷	2	乌克兰	2	亚美尼亚	1
冰岛	2	巴西	1	南非	1
新加坡	3	英国	2	智利	1
新西兰	2	匈牙利	1	塔吉克斯坦	1
乌兹别克斯坦	2	阿尔巴尼亚	1	摩洛哥	1
蒙古	2	欧央行	1	塞尔维亚	1
哈萨克斯坦	2	瑞士	1	埃及	1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除了正规的双边银行间渠道，还可以通过境外机构的人民币 NRA 账户、基于“本土”的通道提供结算服务。银联卡、非现金跨境支付服务点也是旅游、探亲、边民互市贸易等交易的有效结算方式。

（二）纳入民间金融机构，建立区域性货币兑换市场

建立区域性的货币兑换市场不是瑞丽首创。2011 年 12 月，人民币对泰铢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正式启动，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等银行可以办理人民币对泰铢跨境结算业务。2014 年 12 月，人民币对坚戈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正式启动，参与行包括已对客户挂牌人民币对坚戈汇价、具备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资格的在新疆的商业银行（包括新疆地方性商业银行、中外资商业银行新疆分支机构）以及境内哈萨克斯坦银行（包括哈萨克斯坦银行境内分行、哈萨克斯坦银行境内法人银行及其分行）。

瑞丽的情况比较特殊，民间机构的交易量占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区域性货币市场中纳入民间机构。截至 2016 年 12 月，全国经批准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有 67 家（见表 6）。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9 个沿边省市区中，新疆 1 家，云南 6 家，黑龙江 2 家，广西 3 家，辽宁 1 家。可以看出，整个

云南省的民间机构比较活跃，但是其他沿边省市区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数量偏少，有些沿边省市区还没有。

表 6 经批准设立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

外汇管理分局/管理部	数量	外汇管理分局/管理部	数量
天津市分局	4	福建省分局	4
辽宁省分局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	3
上海市分局	5	海南省分局	1
山东省分局	2	云南省分局	6
广东省分局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局	1
北京外汇管理部	8	深圳市分局	8
山西省分局	1	青岛市分局	1
黑龙江省分局	2	厦门市分局	3
浙江省分局	6	宁波市分局	1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还没有兑换特许机构的沿边省份，要积极争取获批。已经拥有兑换特许机构的沿边省份，要充分发挥这些机构的作用。可以纳入这些机构，设立边境地区的外汇交易市场，甚至允许符合条件的邻国商业银行进入外汇市场交易，调配各商业银行持有的对方国家货币头寸。这种构架的货币兑换市场有利于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的建立，拓宽人民币的流出流入渠道，确保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汇率的主导权不旁落。

（三）加强地区间银行合作，建立现钞跨境调运机制

瑞丽市先行先试，在没有顶层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与缅甸毗邻的木姐市建立了银行间的合作机制。其他沿边地区可以积极行动，争取与毗邻国家银行建立跨境现钞调运机制，既可以充实境外人民币存量，又可以创设人民币重要的回流机制。

比如，2015 年 10 月，哈尔滨银行通过人民银行北京营管部和哈尔滨中心支行的审核批准，经北京海关采用航空运输的方式成功向俄罗斯亚洲太平洋银行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 500 万元。此次调运是我国首笔由金融机构通过航空方式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标志着黑龙江省人民币现钞向俄跨境调运渠道正式建立。

参考文献：

1. 白琳：《云南省沿边地区经济开放评价及对策——以德宏州为例》，《特区经济》2012 年第

7 期。

2. 李东荣：《人民币跨境计价结算：问题与思路》，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
3. 高海红：《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的潜力》，《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 2 期。
4. 李婧：《人民币跨境流通的现状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管理世界》2004 年第 9 期。
5. 李婧：《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世界经济研究》2011 年第 2 期。
6. 露口洋介、吴冰：《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 3 期。
7. 罗忠洲、吕怡：《我国企业跨境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问卷调查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4 年第 6 期。
8. 牟怡楠：《人民币跨境流通对银行业金融安全的影响》，《国际经贸探索》2010 年第 4 期。
9. 潘润枫：《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武汉金融》2015 年第 7 期。
10. 彭红枫、陈文博、谭小玉：《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述评》，《国际金融研究》2015 年第 10 期。
11. 孙杰：《跨境结算人民币化还是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研究》2014 年第 4 期。
12. 孙杰：《务实推动跨境结算人民币化》，《中国外汇》2014 年第 11 期。
13. 孙志军：《基于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使用视角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 年第 9 期。
14. 汪洋：《跨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路径选择与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 2 期。
15. 肖彤、田松光、薛跃进、张维新等：《边境贸易中的货币流通及结算问题》（续），《金融研究》1992 年第 11 期。
16. 杨国辉、孙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昆明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建设》，《经济问题探索》2011 年第 3 期。
17. 王元涛、霍强、秦绍娟：《滇桂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路径研究》，《学术探索》2015 年第 7 期。
18. 郑之杰：《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2015 年第 6 期。
19. 朱珊珊：《跨境人民币清算体系存在的问题及立体式发展思路》，《国际金融研究》2014 年第 11 期。
20. 宗良、李建军：《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和战略对策》，《国际贸易》2010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 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

——基于 2010—2015 年相关数据与引力模型分析

于 倩 王雁芸

摘要：本文在对次区域经济合作及其边界效应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中国西北五省（区）和中亚五国为主体，探究二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问题。先对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现状进行分析；然后采用 2010—2015 相关数据和边界效应模型衡量此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情况，实证得出具有较高的屏蔽效应，并对此作相关说明；最后就弱化此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屏蔽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 边界效应 西北五省（区） 中亚五国

作者简介：于 倩，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雁芸，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一、引言

中亚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和欧亚大陆的中心，因其丰富的自然、矿产、能源、土地等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被称为 21 世纪的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也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成为大国博弈之地。目前，中国已是中亚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位于“中国—中亚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中国西北五省（区），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条黄金开放带，有 17 个国家一类口岸、11 个二类口岸，与哈萨克斯坦就有边境口岸 7 个，具有发展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独特地缘优势。

从目前合作现状来看，因中国西北五省（区）和中亚五国^①发展阶段不同，存在经济政策、文化传统以及政治体制差别大、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协调难度大等问题及因素，决定该区域目前尚不具备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的条件。而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可以提高经济相互依存度，实现共同发展和利益共享，而且可以成为建立更高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

二、文献综述

关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一方面，从研究主体来看，Czeslaw Tubilewicz (2015) 探讨了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进而说明中国地方政府采取的国际化 and 区域化的策略。国内学者主要探讨大湄公河（卢光盛，2016）、图们江（杨东亮，2016）、泛北部湾（孟祥宁，2016）、珠港澳（袁持平，2015）等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而对西北与中亚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偏向研究新疆与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高志刚，2006；刘云彤，2009）、中国—中亚自贸区建设（向洁，2015；韩永辉，2017）。其中也有学者（张海兴，2016）提出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建立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深化新疆与中亚的经贸合作。少数学者如陈晓娟（2008）从理论上提出我国西北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想，康岚（2016）在全面分析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合作现状、问题、内部条件、外部动力和阻碍因素的情况下，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段（即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模式、机制构建等。

另一方面，从研究视角来看，因图们江次区域合作受政治影响强烈，国外多位学者从地缘安全角度分析此次区域经济合作（Euikon Kim，1992；Balanchard，Tean - Marc F，2000；Carla P. Freeman，2010）；我国文献多集中在经贸（卢光盛，2016）、法律机制（李艳芳，2016）、合作机制（高志刚，2015）、国际关系（邢树君，2014）方面，而针对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的文献较少，且以定性分析为主。汤建中（2002）认为国家边界有屏蔽和中介两种效应，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并提出跨国界经济合作有通道、贸易口岸和开发区三种模式；李铁立（2004）对边界效应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系统性地分析与阐述，并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或跨境经济合作中边界效应转化的动力是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同时冯邦彦（2007）将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看

^① 中国西北五省（区）指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五国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作是边界效应转化的根本动力。定量方面，屠年松（2016）通过实证显示我国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五国（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的边界屏蔽效应逐年降低，在2009—2013年间与我国边界屏蔽效应最强的为老挝，最弱是越南，且柬埔寨与我国的边界屏蔽效应下降最快；周余辉、李郁（2006）运用1996—2003年相关数据衡量出珠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两地区的边界效应值从1996年的12上升至2003年的28，说明此时两地逐渐趋向于非一体化。其他关于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的文献则散见于跨境经济合作（李天籽，2015）、沿边开放（张梅，2015）、跨境自贸区（范艳娟，2011；李理甘，2012）等边界效应问题的研究。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在理论和经验上为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及其边界效应提供可供借鉴的分析角度与测度办法，仍有一定局限性。一是少有学者对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相关论述；二是在定性、定量方面很少学者将西北五省（区）作为主体来分析其向中亚地区沿边开放，或跨境经济合作等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的边界效应问题。因而本文研究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在探讨次区域经济合作主体和视角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三、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相当广泛，但总体主要以贸易、投资和产业为主，其中产业包括基础设施、旅游、能源、农业、电信、金融等领域。基于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合作现状，本文将从下述三方面作出分析。

（一）贸易方面

贸易作为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经济联系与区域合作的主要途径往来已久、源远流长，近年来又蓬勃发展。

首先，贸易规模方面。2016年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是130.77亿美元，同比增长14.7%；2015年为113.99亿美元，比前几年有所下降。2010—2014年二者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为149.71、181.38、184.27、200.13、181.45亿美元，各占历年中国对中亚五国贸易额的49.7%、45.7%、40.1%、39.8%、40.3%，^①其中哈萨克斯坦是西北和中亚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二者之间贸易量最多（见表1），约是西北与土库曼斯坦的70多倍。然而90%以上的贸易额由新疆与中亚达成，原因在于新疆是西北五省（区）

^①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海关总署的数据计算而得。

中接壤中亚五国的唯一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出口商品的 70% 多为内地产品，^① 即中国内地大多数省份（包括西北其他四省区）为新疆与中亚国家间的贸易保证产品补给。

表 1 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西北—哈	西北—吉	西北—塔	西北—土	西北—乌
2010	104.32	26.62	10.76	1.51	6.50
2011	117.26	38.07	17.29	1.19	7.57
2012	119.33	40.48	14.34	1.40	8.72
2013	130.68	41.86	16.46	1.64	9.49
2014	109.46	41.07	20.40	2.29	8.23
2015	60.32	32.49	14.22	0.99	5.97
2016	69.47	42.18	13.26	0.60	5.26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其次，贸易差额和商品结构方面。一方面从贸易差额来看，2010—2016 年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呈顺差状态，顺差额 2010 年为 68.05 亿美元，2016 年扩大到 104.3 亿美元。其中陕西、新疆对中亚贸易为顺差，甘肃为逆差，青海对中亚国家的贸易为顺差和逆差交互变动，宁夏始为逆差，后变顺差，表明宁夏对中亚国家的出口能力提升。此外，西北地区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保持在顺差状态，与乌兹别克斯坦 2012 年后由逆差转至顺差态势。另一方面就贸易商品结构而言，中亚五国向西北地区出口的产品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及其他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等，进口主要以机电产品、农产品、服装、鞋类、纺织品等快速消费品为主。

最后，贸易依存度方面。2010—2015 年中国西北五省（区）对中亚国家进出口的平均贸易依存度为 3.41%，出口与进口各是 2.58%、0.83%。^② 在此期间西北五省（区）平均外贸依存度为 10.91%，出口为 6.88%，进口是 4.03%。^③ 可知西北对中亚进出口的贸易依存度约占其整体的 30% 多，因而西北与中亚的贸易对促进西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是尤为重要的。

①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院。
②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③数据来源：根据 2010—2015 年各省统计公报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二）投资方面

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的投资合作比之贸易较迟，随西北地区整体投资能力的提升，其对中亚五国的投资规模缓慢增加。如新疆对中亚五国的投资总额和投资项目分别从2007年的25487.85万元、24个，上升至2011年的42156.12万元、43个。^①从投资方式看，主要以独资建厂或工程承包形式完成，如兰州瑞达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投资大量资金建设果蔬保鲜库及占地1公顷的销售市场项目。从投资范围来看，西北对中亚投资集中于石油勘探与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改造与建设、电力、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如在石油天然气开采方面，新疆石油公司及中石油、中石化在西北的分公司积极与中亚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矿产资源方面，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西部矿业公司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紫金矿业西北分公司在塔吉克斯坦均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电力方面，新疆特变电工与乌兹别克斯坦企业签订相关协议；在农副产品加工领域，驻哈萨克斯坦的新康食品公司利用当地资源生产番茄制品，连续10年获得哈萨克斯坦番茄及果酱业最佳企业称号。同时，中亚五国主要对新疆进行的投资，其领域涉及到能源、建材、皮革、电子、食品、汽车维修、化工、轻工等。

（三）产业方面

1、能源领域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总体情况是富煤、缺油、少气，中亚拥有存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两者间的能源合作举足轻重。西北地区既为国内能源供应地，也是中亚油气进入中国内地的聚合地和门户。自2003年至今，在多个能源合作协议签订的制度保障下，西北五省（区）内企业对中亚各国能源领域进行项目承包、投资建设，尤其在能源管道建设方面，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支持配合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经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与国内西气东输线路相通相接，方便了从中亚向国内运送原油、天然气，为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

2、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奠定合作基础。在国家政策支持和政府带动下，区域内交通网络纵横交错。五省（区）内部连霍高速、G312国道、新陇海、兰新线等公路、铁路干线连贯东西。外部对中亚五国方面，在我国与中亚多个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协议签订下，新疆已建成面向中亚五国的10个口岸，其中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岸已是集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于一体的重点口

^①卡比努尔·库拉西：《新疆与中亚五国农业经济合作研究》，新疆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岸。以这些口岸为支撑点，已开辟多条公路干线通向中亚五国。新欧亚大陆桥更是联通了西北与中亚间的铁路运输。亚洲公路 AH5、中吉乌铁路、中哈热特肯—霍尔果斯铁路、阿拉山口—多斯特克铁路的修建，长安号、天马号货运班列的运营及乌鲁木齐与中亚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航线的开辟，从全方位、多角度地推进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的道路畅通。

3、农业领域

农业是中亚国家的基础产业，2010—2015 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维持 20%左右，塔吉克斯坦超过 22%；哈萨克斯坦较低，约为 5%左右。^① 西北五省（区）亦是农业大省，2015 年农业产值占 GDP 的 11.5%。^② 两地区气候、农业环境与文化相通，有着深厚的农业互补基础，合作前景广阔，不止表现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如新疆 2006—2014 年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从 739.97 千万美元上升至 1713.64 千万美元，增长 131.58%。^③ 更重要的在农业科技领域，中国西北地区农业节水灌溉、病虫灾害防治、农业机械设备制造技术领先于中亚。中亚国家农业生产虽以粗放式为主，投入高、产出低，但种子资源储备量高于中国西北，因而两地区进行专家交流、农作物品种资源共享、开展育种与虫灾防治技术合作、推广并输出西北地区农业机械化、灌溉优势技术等科技合作行为源源不断。

四、中国西北五省（区）与
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边界效应主要以引力模型为基础，通过比较跨边境的贸易流量或边境两边的价格差来测量。

1、比较贸易流量测定边界效应。

此模型由 McCallum（1995）提出，他将引力模型的基准模型：

$$X_{ij} = A(\frac{GDP_i^{\alpha_1}}{GDP_j^{\alpha_2}})/D_{ij}^{\alpha_3}$$

经对数化后推导为 $LnX_{ij} = \alpha_0 + \alpha_1 LnGDP_i + \alpha_2 LnGDP_j + \alpha_3 LnD_{ij} + u$ 。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官网。
②数据来源：根据各省 2015 年统计公报数据计算而得。
③尼牧昆：《新疆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石河子大学硕士论文，2015 年。

其中 X_{ij} 表示 i 与 j 国间的贸易额； GDP_i 、 GDP_j 为 i 、 j 国的经济总量； D_{ij} 为 i 与 j 国间的贸易距离，其系数 α_3 符号为负；模型含义为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后来 McCallum 在模型中加入 dum 虚拟变量，用贸易额、距离、GDP、衡量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 dum 构建标准边界效应模型。

$$\ln X_{ij} = \alpha_0 + \alpha_1 \ln GDP_i + \alpha_2 \ln GDP_j + \alpha_3 \ln D_{ij} + \alpha_4 dum + u.$$

其中 $i=j$ 时， $dum=1$ ，表示 i 国内部贸易， $i \neq j$ 时， $dum=0$ ，表示 i 国与 j 国的国际贸易。其系数值的反对数 e^{α_4} 表示当控制经济总量、距离的情况下， i 国内部贸易是 i 与 j 国贸易的倍数。

2、比较价格差测定边界效应。

此方法是 Head 和 Mayer（2000）从 Krugman 的垄断竞争模型出发，由消费者偏好的不对称推导出来。其模型如下：

$$\ln \frac{m_{ij}}{m_{ii}} = \ln \frac{V_i}{V_j} - (\sigma - 1) \delta \ln \frac{d_{ij}}{d_{ii}} - \sigma \ln \frac{P_{ij}}{P_{ii}} - (\sigma - 1) [\beta + \ln(1 + u)] + (\sigma - 1) \eta A_{ij} + e_{ij}$$

其中 m_{ij} 是 i 地区对 j 地区进口产品的 CIF 值， m_{ii} 为内部贸易额， V_i 与 V_j 为 i 与 j 地区的 GDP， d_{ij} 为 i 到 j 地区的贸易距离， P_{ij} 为 i 地区对 j 地区进口产品支付的价格， P_{ii} 为内部贸易产品价格，常数项为边界效应值。徐明（2011）以中韩为研究对象，基于此模型运用 2006—2008 年相关的面板数据，实证得出内陆地区对韩的贸易边界壁垒高于沿海地区，同时中韩贸易边界效应趋于上升。

综上所述，本文利用 McCallum 设定的模型来研究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即

$$\ln X_{ij} = \alpha_0 + \alpha_1 \ln GDP_i + \alpha_2 \ln GDP_j + \alpha_3 \ln D_{ij} + \alpha_4 bor + u$$

此模型旨在运用 2010—2015 年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的相关数据来测定二者之间的边界效应情况。

（二）变量选择

模型中 i 为中国西北五省（区）， j 为中亚五国。

X_{ij} 指西北五省（区）向中亚五国的出口贸易额，当 $i=j$ 时，代表西北五省（区）内部“出口”贸易额。

bor 为衡量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 $i=j$ 时， $bor=1$ ， $i \neq j$ 时， $bor=0$ ，其系数的反对数 e^{α_4} 为边界效应值，表示当距离、GDP 被控制后，西北五省（区）内部“出口”贸易额是西北五省（区）向中亚五国出口贸易额的倍数，其中当 $\alpha_4 > 0$ 时，代表边界屏蔽效应，

即西北五省（区）内部“出口”贸易额大于其向中亚五国的出口贸易额；当 $\alpha_4 < 0$ 时，代表边界中介效应，即西北五省（区）内部“出口”贸易额小于其向中亚五国的出口贸易额。由于在理论和实际中边界更多的表现为屏蔽作用，因而其预期符号为正。

D_{ij} 指贸易距离，代表运输成本的高低，一般而言，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贸易壁垒越大，贸易额越小，因此其预期符号为负。

GDP_i 、 GDP_j 为西北五省（区）、中亚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值越大，经济水平越高，居民收入增加，需求旺盛，且企业生产规模扩张，推动贸易与投资，有利于经贸合作，故其预期符号为正。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前述从三方面分析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而在测定边界效应时只用贸易额，原因有三。一是丁斗（2001）将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根据实践形式分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方之间的投资型和贸易型两种，投资型由于大城市与周边地区间产业互补性很强，并有势差较大的垂直分工的潜力而表现出充足的贸易流和投资流。贸易型次区域都是远离本国经济中心的落后区，市场供给不充分，通常无中心城市可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由于合作方之间的产业互补性较弱，产业结构同属较低层次，故其合作以贸易为主，相互之间的资本流动较少。西北地区远离我国经济中心，与中亚五国经济发展同属相对落后地区，都依赖多数先天资源优势的初级产品，且二者经济合作以贸易居多，涉及投资金额较少，故可将它们之间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认定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方之间的贸易型。二是刘生龙、胡鞍钢（2011）认为多数研究表明贸易流反映区域间经济往来程度，用来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虽其合作内容包括贸易、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等，但贸易流最直观地反映二者经济联系程度及经济一体化进程。三是囿于数据限制，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投资额难以获取，且产业领域的数据无法准确量化。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0—2015 年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其中西北五省（区）对中亚各国之间的出口贸易额来自海关总署，各省之间的贸易额通过社会消费品乘以一定的权重得到。权重的设置是该地区的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重，通过各个省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乘以其他省市的权重得到该省对其他省市的出口额（李理甘，2012）。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贸易距离是省会到首都的空间距离，省际贸易距离是省会到省会的空间距离，均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测定。模型中亚五国的 GDP 和用来统一货币单位时用到的汇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官网，西北地区 GDP 来自中国统计

（四）实证结果

本文将实证分为两步，一是将中亚五国看做一个整体，衡量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整体的边界效应；二是将中亚五国单独分开，测定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的边界效应。

1. 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整体的边界效应回归分析

运用 2010—2015 年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分别向中亚（五国之和）的出口贸易额和五省各省之间“出口”贸易额及对应的距离、GDP 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来测定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 2010—2015 年的边界效应，选择混合 OLS 回归模型。同时运用西北五省（区）各省与中亚每年的贸易额及其他相关数据作为截面数据来测定 2010—2015 年各年的边界效应。其回归结果如下。

表 2 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整体边界效应的回归结果

模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年份	2010—201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c	-48.35633***	-65.46597***	-60.98296***	-61.56231***	-45.07768***	-55.74231***	-43.4025***
LnGDP _i	1.554799***	1.961813***	1.869789***	1.813448***	1.396243***	1.715747***	1.341632***
LnGDP _j	1.144715***	1.468357***	1.356291**	1.417853***	1.180935***	1.299688***	1.164790***
LnD _{ij}	-0.428819**	-0.644663	-0.581878	-0.565781	-0.384094	-0.508991	-0.375665
bor	2.620056***	3.722600***	3.312462**	3.363818***	1.971005**	2.257750**	1.912694**
边界效应值	13.74	41.37	27.45	28.90	7.18	9.56	6.77
R ²	0.567658	0.601192	0.584589	0.623082	0.574432	0.588581	0.564860
N	150	25	25	25	25	25	25

注：***、**、* 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 2 可见，两地区 GDP 促进贸易发展，距离对贸易有抑制作用，它们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符合引力模型设定的基本含义。但距离变量在各年模型中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本文所用的是谷歌地球测出的空间距离，没有考虑到西北与中亚间复杂的地域地形、实际的铁路或公路运输里程，因而具有一定偏差。模型①是测定 2010—2015 年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整体间的边界效应，bor 的系数为 2.62，十分显著，表明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整体间的边界屏蔽效应值达 13.74。②～⑦模型分别表示衡量西北五省（区）

与中亚五国之间历年的边界效应，其系数十分显著，均为正，即表现为屏蔽作用。整体上来看，边界效应值不断减弱，从 2010 年的 41.37 降为 2013 年的 7.18，下降幅度较大，说明二者经贸合作的壁垒因素减少，合作程度有所加深，且 2011 与 2012 年间边界效应相差较小。2013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与中亚五国的纷纷支持，受政策氛围的影响，两地区经贸扩张，进出口贸易额较之前有很大提升（见表 1）。2014 年边界效应值略有增加，可能因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和我国进入新常态时期，也导致西北五省（区）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缩减。同时，2015 年边界效应值趋于下降，表明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呈现良好合作的发展势头（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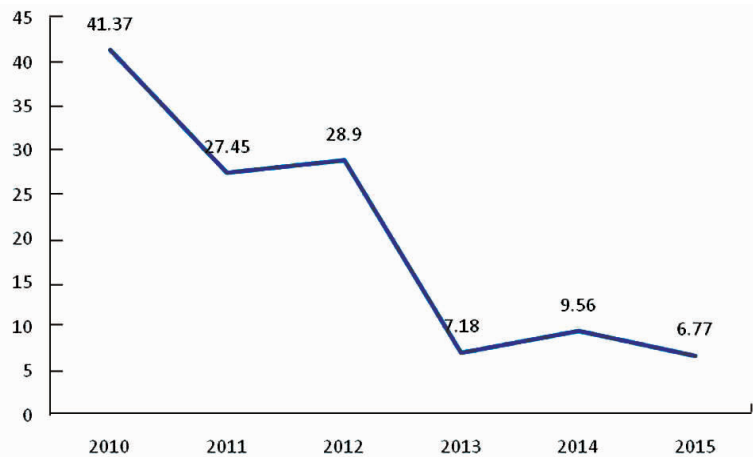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5 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的边界效应值

2. 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间边界效应的回归分析

在此实证中，分两步来说明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间的边界效应情况。

第一，通过 2010—2015 年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相关的面板数据（即 2010—2015 年甘肃、陕西、新疆、宁夏、青海分别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出口贸易额和五省各省之间的“出口”贸易额及对应的距离、GDP）来测定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间的边界效应，运用混合 OLS 模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中各变量系数十分显著，bor 系数均为正，即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间为边界屏蔽效应。其中西北五省（区）与土库曼斯坦的 bor 系数为 6.89，边界效应值达 977.6，即表现出很高的屏蔽效应。实际来看，土库曼斯坦是永久中立国，独裁统治现象严重，而且西北地区与土库曼斯坦不接壤，相比其他两国两地之间距离最为遥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差甚远。二者通商时要途经其他两国，且通商基础设施规模

小、条件差，故西北地区与土库曼斯坦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方面处于初期阶段，面临着诸多直接和间接合作壁垒。最直观的现象是西北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贸易额最少（见表1），所以此高边界效应值是贴合实际的。

表 3 2010—2015 年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之间边界效应回归结果

	西北与哈	西北与吉	西北与塔	西北与土	西北与乌
c	- 49. 64507 ***	- 73. 41910 ***	- 68. 97873 ***	- 81. 01072 ***	- 45. 37324 ***
LnGDP _i	1. 609523 ***	2. 455830 ***	2. 237348 ***	2. 429571 ***	1. 465452 ***
LnGDP _j	1. 172712 ***	1. 473392 ***	1. 446386 ***	1. 408214 ***	1. 109794 ***
LnD _{ij}	- 0. 592258 ***	- 1. 206381 ***	- 0. 880623 ***	- 0. 451382	- 0. 392628 ***
bor	2. 913112 ***	1. 981934	1. 547205	6. 885103 ***	2. 513798 ***
边界效应值	18. 41	7. 26	4. 70	977. 6	12. 35
R ²	0. 592945	0. 581302	0. 584735	0. 652242	0. 803174
N	150	150	150	150	150

注：***、**、* 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西北五省（区）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间边界效应值分别为 18. 41、7. 26、4. 7、12. 35，表明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屏蔽效应较大，与塔吉克斯坦最小。理论上哈萨克斯坦与西北地区的边界效应值应是最低，因为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中亚五国中经济总量、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与我国西北共有边境线最长，两者间的投资、贸易及其他领域合作较另外四国更为兴盛。但一方面，就哈萨克斯坦而言，其经济自足能力强、工业化水平高、与周边国家建交合作的紧密性强和程度广使得其对中国的依赖性弱，国内民族文化多元化和社会意识复杂性导致的多冲突影响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就西北五省（区）来看，因哈萨克斯坦各方面发展程度较其他四国良好，涉及的贸易投资机遇多、范围广，宽领域、深层次地与哈萨克斯坦开展经贸合作，二者所面临需要协调的一系列问题较其他四国更复杂、更困难，即二者间边界效应较高。

第二，通过 2010—2015 年的截面数据（即 2010、2011、2012、2013、2014、2015 年甘肃、陕西、新疆、宁夏、青海分别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出口贸易额与五省各省之间历年的“出口”贸易额及对应的距离、GDP）来测定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间的边界效应。

实证结果显示，西北五省（区）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历年边界效应系数显著，且为正（见图 2），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边界效应系数不显著。从边界效应系数显著的三个国家来看，2010—2015 年间，西北与此三国间的边界效应是不断减弱的，但总体仍呈现高边界屏蔽现状。在此期间，西北地区与土库曼斯坦的边界效应下降最快，但依然高于另外两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屏蔽效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相比于土库曼斯坦较为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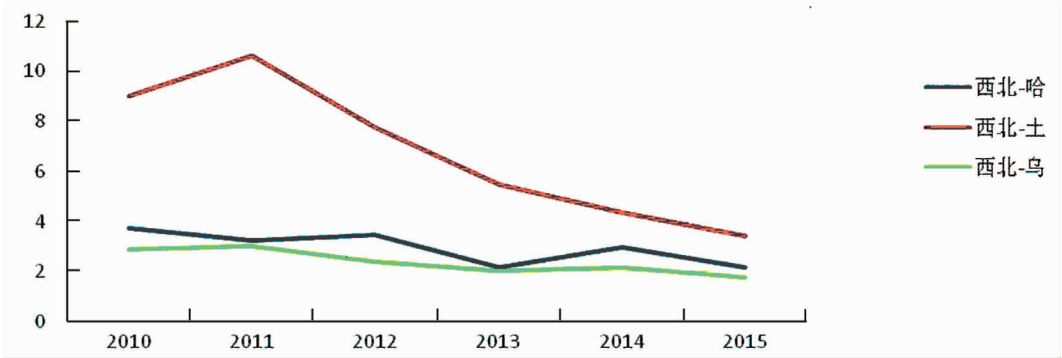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15 西北与中亚三国的边界效应系数值变化趋势图

（五）基本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虽总体下降，但仍处于高边界屏蔽状态。原因在于：第一，两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民众收入微薄，消费普遍缺乏，地域广、贫困人口比重大等特征成为制约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瓶颈；第二，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资源型产品富足，长期依赖先天优势而形成以低附加值为主的单一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相似性会加剧边界屏蔽效应的表现；第三，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及相似的文化背景，但在广阔无垠的地理范围内文化意识相差甚远，尤其是中亚地区多民族繁杂居住，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冲突性成为造成两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屏蔽效应的文化壁垒；第四，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通商口岸只设在新疆，且口岸条件差、运输成本高、运输时间长、通关手续繁琐等一系列问题较为突出，相配套的电子商务、信息、物流、法律等服务平台建设和贸易、投资、产业等政策亟待突破以及基础设施问题的存在增加了两地区间的边界屏蔽效应；第五，“三股势力”在中亚和新疆地区活动猖獗，严重影响着中亚各国及其周边邻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以及西北五省（区）与中亚间经贸往来，成为影响边界效应大小的安全因素。

五、弱化中国西北五省（区）

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屏蔽效应的政策建议

1. 推进经济区建设，促进协同发展

为促进西北地区发展，国家已批准建立关中—天水、天山北坡、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多个经济片区，各经济区特色分明，定位清晰，但总体工业为先，农业次之，服务业靠后。因此要积极调整区域内产业结构，实现区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互动，做好区内外城市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与分工，打造特色产品，构建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农业现代化，提升教育科技服务能力，共同实现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最终辐射到西北各市区，带动西北五省（区）经济快速发展。在建设的过程中，有效利用中亚国家的能源、资源，扩大经贸合作，使得区域内更多产品为中亚国家之所需，从而有效降低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屏蔽效应，实现互利共赢。

2. 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经济互补性

经济互补性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同一产业层次的要素禀赋差别，二是不同产业层次的产业结构差别。故两地区要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对产品的加工与处理能力，推动先天比较优势的转化，强化出口贸易产品的竞争优势，将先天要素禀赋的相对互补性逐渐转移到产业与贸易结构方面，促进可持续贸易。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可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积极寻找产业合作空白点，加深现有产业合作规模，完善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在特定产业项目与合作领域内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根据自身民族利益和生产技术要求加以实施。

3. 推动文化融合，深化文化认同感

推动文化融合是削弱文化边界效应壁垒的有效办法。基于此，一是要有效利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兰洽会、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平台，传承千年来丝路文化，加强中亚与西北文化联系。二是发挥陕西文化古都与高校优势，搭建西北与中亚地区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组织平台。三是利用新疆与中亚间固有的民族成分相似、语言和宗教信仰相通性等方面的优势，促进民族地区与中亚间的文化合作，并通过五省（区）内部交流将此优势扩散至其他各省，发扬民俗文化。四是以文化旅游为先导，联动丝路中星罗棋布的旅游景点，以旅游合作方式增强地区间文化认同感。五是企业要学会识别文化差异，突出地区文化优势，打造特色文化产品，以销售产品方式有效宣传地域文化。

4. 健全基础设施，完善配套服务

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是生产要素流动的载体，具有很强的正经济外部性，健全的

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地区经济的运行费用与交易成本。因此，一是应加大能源管道、公路、铁路、口岸、机场、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加大运输能力，提升运行质量。二是改进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经济合作区内部相配套的信息平台、法律法规、人才队伍、投资招商优惠政策，有效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与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三是积极推动沿线公路、铁路线路的修建以及航线的开辟，完善西北与中亚间的交通运输网络，提高综合交通枢纽的辐射能力。四是加强与中亚国家在政策方面的沟通，优化边境交易与货物过境运输制度，逐步统一标准，消除通关口岸、交通运输环节的非关税壁垒，彻底实现基础设施联通，贯通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联结。

5. 保障区域安全，营造良好经贸合作环境

一方面，“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难以根除的一大原因是：中亚国家存在种族优越政策和民族歧视，为清除“三股势力”，中亚国家应重新审视与合理调整其民族政策，取消民族歧视，完善民族管理制度，保障民族利益。另一方面，“三股势力”主要存在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克什米尔及阿富汗，因此要加强与各国在反对“三股势力”方面的国际合作。此外，我国与新疆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运用有效的手段，打击与防止“三股势力”、泛伊斯兰与泛突厥主义与新疆、西藏地区的分裂势力勾结，破坏地区安全，影响经贸合作环境。从这三方面出发，有效削减因非传统安全因素带来的边界屏蔽效应，进而为推进中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营造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 杨东亮、王科惠：《“新常态”下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新机制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2. 孟祥宁、张林：《技术外部性视角下的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3. 韩永辉、罗晓斐：《中国与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治理研究——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自贸区的可行性》，《国际经贸探索》2017 年第 2 期。
4. 卢光盛、金珍：《“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原因、困难与路径？》，《战略决策研究》2016 年第 3 期。
5. 高志刚：《构建新疆与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开放导报》2006 年第 3 期。
6. 刘云彤、王哲：《新疆与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7. 向洁、何伦志：《关于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若干思考——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框架》，《改革与战略》2015 年第 6 期。

8. 陈晓娟:《中国西北与中亚五国经贸发展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9. 康岚:《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段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10. 高志刚、王彦芳:《构建“环阿尔泰山次区域经济圈”合作模式与合作机制的思考》,《新疆财经》2015年第6期。
11. 汤建中、张兵、陈瑛:《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人文地理》2002年第1期。
12. 李铁立:《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3. 冯邦彦、段晋苑:《边界效应与港深跨境区域合作》,《特区经济》2007年第1期。
14. 周余辉、李邨:《CEPA效应下香港与泛珠三角一体化的实证分析》,《南方经济》2006年第9期。
15. 李天籽:《中国沿边的跨境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经济地理》2015年第10期。
16. 张海兴:《中哈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障碍因素分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36期。
17. 范艳娟:《基于引力模型的CAFTA边界效应分析》,《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第16期。
18. 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19. 丁斗:《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 李理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边界效应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1. J. McCallum. National borders matter: Canada – U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85, No. 3. (1995).
22. Czeslaw Tubilewicz and Kanishka Jayasuriya.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Chinese subnational state and capital: the case of Yunnan and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2. (2015).
23. Euikon Kim.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umen river basin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ast Asian*, Vol. 11, No. 2. (1992).
24. Carla P. Freeman. Neighborly Relations: the Tumen development project and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63, No. 19. (2010).
25. Wei, S. Intra – national Versus International Trade: How stubborn are nationals in global integration. 1996, *NBER Working Paper* No. 5531.
26. Chia Siow Yue. Whither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 ASEAN Perspective.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6, No. 3. (2007).

责任编辑:谷 岳

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四地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经验总结及路径探索

——基于贸易通关便利化视角

王珍珍 甘雨娇

摘要：通关便利化是当前自贸试验区推进“贸易便利化”核心任务过程中的重要探索内容，对于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意义重大。沪津闽粤四地自贸试验区共同围绕着贸易通关便利化建设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本文对四地自贸试验区在“三互”大通关体系、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以及创新通关监管制度三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指出未来发展中要找准“单一窗口”建设模式，深入“三互”大通关改革，加快通关一体化全面覆盖，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形成高效通关机制。

关键词：自贸试验区 贸易通关便利化 “三互”大通关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作者简介：王珍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甘雨娇，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

一、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要将自贸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打造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载体，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创新贸易监管模式、促进贸易便利化，而通关便利化是贸易便利化的核心问题。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运输与通讯方式的不断改善，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大幅度削减，以通关制度改革为核心的贸易便利化日益成为影响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加强通关在推进贸易便利化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各国海关以及国际贸易界

的新课题。上海、天津、广东以及福建在各自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中都具体提出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内容，并将贸易通关便利化改革作为自贸区试点探索贸易便利化任务的重要突破口。自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在以贸易通关便利化为导向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上已经初具成效，天津、广东及福建自贸区获批后不断推陈出新，形成多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由于其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与区域环境的多样化，四地自贸区的贸易通关便利化措施创新及监管模式改革存在非一致性，在开展贸易通关便利化工作过程中取得的进展与成效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试图从贸易通关便利化的视角出发对四地自贸区所实施的贸易通关监管制度及其进程进行比较与分析，找出当前贸易通关便利化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贸易通关便利化内涵及其对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战略价值

通关便利化是贸易便利化的产物，是指简化通关程序、协调通关法律规定、统一通关适用标准等手段，缩短通关时间，创造便利化的通关环境。通关便利化是指通过对通关程序的简化、使用法律和规定的协调、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和改善，缩短通关时间，降低通关成本，为外贸经济创造协调、透明、可预见的环境。^① 对于贸易便利化的定义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认为国际贸易程序的简化和协调，包括货物通过海关与港口的物流，以及相关海关单据、数据的流动效率的提高。2014年世贸组织通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指出，成员在履行贸易便利化义务需从进出口货物放行、结关措施、相关单证和手续的纪律、过境运输程序或法规等方面着手。因此，综合贸易便利化和贸易通关便利化的内涵来看，贸易通关便利化是贸易便利化的核心内容，是贸易便利化理论在有形货物和跨境环节流动便利化的集中体现。^②

国外学者研究中主要探讨了通关便利化所带来的贸易效应、通关便利化的有效举措以及通关便利化的影响因素。经合组织（OECD）（2003）利用CGE模型分析指出货物贸易交易成本每下降1%，将增加400亿元收入。^③ Gera等（2004）运用引力模型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内的工业化国家进行分析，显示简化海关程序可以有效推动进口增加7.7%~13.5%，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增加比例较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口增加比例相对大一些。^④

①陆真：《国内通关便利化的模式现状与发展途径》，《江苏农业科学》2012年第8期，第411~412页。

②朱秋沅：《国际贸易便利化发展进程新特征分析》，《国际商务研究》2011年32（2），第9~17页。

③OEC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of Trade Facilitation, 2003, (31)

④Gera Surendra. 2004: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from Shanghai to Bogor [M]. APEC Secretariat, 2004.

Kim等(200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① Chris Milner 等(2008)指出通过简化繁琐的海关通关手续、增加信息技术自动化的适用,加强各海关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贸易便利化。^② Shepherd & Wilson (2008)指出港口效率的提升可以带来 7.5%的贸易增加。^③ Andrew Grainger (2012)指出需提交的纸质单据较多、不同的行政部门程序冗余重复、通关耗时过长、海关工作人员素质差等影响了海关的通关效率。^④

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改革主要集中在通关便利化上。^⑤ 2001 年启动了促进全国海关报关业务无纸化,减少报关时间,降低贸易成本的“金关工程”;2005 年启动了重点在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的“区域通关”改革;2013 年启动实施全面深化区域通关业务改革。在理论探讨方面,陆真(2012)从检验检疫部门视角出发指出实现通关便利化必须从打造绿色通道、实现单证检验无纸化、实施预报即放,建立虚拟口岸等措施来改革现有通关模式。^⑥ 王淑敏和张丹(2016)从通关优惠政策、电子化程度、海关合作系统化程度三个维度比较分析了 TPP 协议与我国海关法规中通关便利化条款的差异。^⑦ 在贸易通关便利化效应分析方面,徐建飞、田香辉等(2011)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以 2007 年新疆与接壤的 8 个国家的贸易流量为研究对象,对其口岸便利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通关便利化是新疆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⑧在现状问题分析方面,主要围绕时代背景和区域的独特性展开。如匡增杰和凌定成(2009)指出我国在通关便利化方面主要存在如下问题:口岸通关各部门之间协作配合不够紧密,各查验部门信息资源难以实现共享,中国现有海关通关政策和法规不够简化和统一,缺少高效的执行系统,通关监管手段难

①Braddick Kim. Customs and Excise: Trad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England [J].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2004, (3): 18—24.

②Chris Milner, Oliver Morrissey and Eviou Zgovu. Trade Facili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2008.

③Shepherd B, Wilson J S. Trade Facilitation in ASEAN Member Countries: Measuring Progress and Assessing Priorit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615

④Andrew Grainger. Developing the Case for Trade Facilitation in Practice [J]. World Customs Journal, 2012 (5): 65—76.

⑤胡颖:《“贸易便利化”的学术论争与中国的改革路径》,《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119~127 页。

⑥陆真:《国内通关便利化的模式现状与发展途径》,《江苏农业科学》2012 年第 8 期,第 411~412 页。

⑦王淑敏、张丹:《TPP 与中国海关法中通关便利化规则之比较》,《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39~46 页。

⑧徐建飞、田香辉、袁列梦:《基于引力模型的新疆口岸通关便利化建设分析》,《中国商贸》2011 年第 31 期,第 238~239 页。

以适应现代化的物流。^① 覃娟（2010）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研究背景，对广西口岸建设与通关便利化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广西应大力推进区域内通关一体化，与越南积极合作建立“大通关协作区”，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② 王淑敏、翟雨萌（2015）针对三国经济走廊通关便利化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公约冲突、国际环境影响以及中蒙俄海关与过境运输的制约等问题，^③ 对“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蒙俄三国建设通关便利化现状进行分析。在对策研究方面，余波（2007）指出通过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模式、推动我国海关贸易便利化改革，实现无纸通关，可以促进中国海关的通关便利化。^④ 闻学祥（2010）指出中国应以“有效监管”为核心要求，优化综合监管格局，实行智能管理和科学规范，创新通关作业模式，提升查验管理实效，完善物流监控手段。^⑤ 江列平（2010）认为，中国海关应当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布有关便利通关举措、作业流程、操作时限等信息；在现有海关信息系统中增加智能化处理功能，提高通关便利的信息化水平；继续建立健全与相关国家的通关合作协调机制。^⑥ 程俊杰和唐德才（2010）运用博弈模型分析指出，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应该加快大通关建设。姚翠玲（2010）指出，海关可以通过实施便捷通关、推行无纸通关，并运用信息技术、加强管理，以提供优质服务来实现贸易便利化。^⑦

综上所述，贸易通关便利化可以通过简化通关程序、协调适用法律和规定、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为贸易经济打造一个透明、协调、高效、可预见性的有益环境。然而，目前对于贸易通关便利化尚未形成标准的测度指标体系，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仍然处于较为分散状态，且较少有文献涉及我国自贸试验区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的比较研究。我国自贸试验区试点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促进贸易便利化，而当前通关程序是提升贸易便利

① 匡增杰、凌定成：《我国海关实施贸易便利化的困难及对策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年第9期，第14～19页。

② 覃娟：《广西口岸建设与通关便利化——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的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9期，第1～6页。

③ 王淑敏、翟雨萌：《“一带一路”下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通关便利化问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2～15页。

④ 余波：《WTO贸易便利化背景下我国海关通关管理的对策研究》，《商场现代化》2007年第491期，第6～7页。

⑤ 闻学祥：《贸易便利化背景下加强海关有效监管的几点思考》，《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24～30页。

⑥ 江列平：《中国海关通关业务改革和发展方向初探》，《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63～67页。

⑦ 姚翠玲：《海关推动贸易便利化的措施与效果》，《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0年第5期，第150～151页。

化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以自贸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探讨其贸易通关便利化的建设路径和成效，对于自贸试验区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四地自贸区的贸易通关便利化改革成果和经验总结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三互”大通关模式以及“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通关监管制度三个维度。“单一窗口”已成为国际上贸易通关便利化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有力突破口。大量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作为贸易通关便利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通过简化通关环节、促进信息共享、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为国家带来正向经济影响（方晓丽和朱明侠，2014；陈红升和李碧华，2014）。^{①②}“三互”大通关模式和创新通关监管制度是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背景下围绕企业对贸易便利与安全的需求而产生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优化口岸高效通关模式，形成良好的通关管理机制，提高通关效率和管理效率（陈立，2016；匡增杰，2015），^{③④}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通关环境。

三、四地自贸区贸易通关便利化的建设成效

1. 逐步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指贸易参与主体可以仅仅通过一个登记点向有关部门一次性提交所有进出口和转口监管规定的标准化单据以及数据信息，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审查之后将结果通过这个登记点反馈给申报人，通常包括关键角色、业务模式、服务范围、标准体系、法律框架以及技术水平等六大要素。^⑤与电子口岸建设目标相一致，单一窗口旨在通过一个平台深化各贸易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明确、协调各部门职责，为企业贸易通关提供便利化。在贸易电子化发展趋势下，四地自贸区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依托电子口岸建设并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其创造高水平贸易便利化国际贸易环境的必然选择。表 1 为四地自贸区建立“单一窗口”的具体情况。上海自贸区自 2014 年

①方晓丽、朱明侠：《构建“单一窗口”，提升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外经贸实务》2014 年第 2 期，第 21～24 页。

②陈红升、李碧华：《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国家单一窗口建设与通关便利化研究》，《东南亚纵横》2014 年第 11 期，第 22～30 页。

③陈立：《试论海关推进口岸“三互”大通关改革的困境与策略》，《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63～72 页。

④匡增杰：《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贸易便利化的视角》，《经济体制改革》2015 年第 4 期，第 65～69 页。

⑤高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构建机理与实施对策研究》，《生产力研究》2014 年第 10 期，第 74～77 页。

6月起运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至今，已完成“单一窗口”试点、1.0版和2.0版建设并已着手进入3.0版阶段，集成9项“监管+服务”业务功能并已上线运行，在已有版本的经验基础上继续增设或拓展关于物流、保险、支付、代理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并优化数据对接。当前上海自贸区“单一窗口”业务处理规模居于全球首位。目前广东自贸区的单一窗口平台已推出2.0版，功能板块已达12项，通过增设国际会展等业务功能，同时以“物流动态”功能板块为基础建立“通关物流动态系统”，从而获取货物物流信息，为大数据分析决策提供便利。天津和福建自贸区的功能板块为7项，仍处于2.0版建设中。天津自贸区“单一窗口”秉承“互联网+”理念并为企业实现免费报关与服务。福建自贸区“单一窗口”是除上海自贸区“单一窗口”外唯一被入选为在全国范围推广的自贸试验典型案例。按照“一个平台，两个运营体，^①统一宣传”进行建设，不仅在业务功能上开发具有特色的“对台”及“一带一路”专区业务功能，还将厦门口岸建设为全国唯一实现检验检疫业务“单一窗口”申报的地区。

表 1 四地自贸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比较

区域	名称	功能板块	参与建设部门	上线时间	运行效果
上海自贸区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1.0版	1. 货物进出口 2. 运输工具申报 3. 贸易许可 4. 资质办理 5. 支付结算 6. 信息查询	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等17个部门	2014年6月	截至2015年9月底，“单一窗口”平台开户企业已达1100户。报检报关作业达10万票；检验检疫全申报系统实现整体切换，完成申报200多万票；船舶申报基本覆盖主要船舶代理企业。 ^②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版	增加快件与物品、人员旅客、政务公开和自贸专区等功能，形成“监管+服务”9个功能板块	海关、国检、海事等23个部门	2015年底	覆盖95%货物申报和100%船舶申报，用户数近5000家，服务企业数17万家并在企业间普及， ^③ 货物和船舶申报数据项分别减少1/3和4/5，口岸通行效率大幅提高。 ^④

①两个运营体分别指“福州”“厦门”两个运营体。

②商务部：《关于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的函》，http://wzs.mofcom.gov.cn/article/zt_zymysyq/column02/zhl/201611/20161101753992.shtml。

③《上海：这家总理点赞的公司有啥门道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改革试点》，http://www.gov.cn/xinwen/2016-11/25/content_5137408.html。

④《上海自贸区单一窗口新版上线》，http://www.gov.cn/xinwen/2016-11/18/content_5134086.html。

续表：

区域	名称	功能板块	参与建设部门	上线时间	运行效果
广东自贸区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1.0 版	1. 货物申报 2. 运输工具申报 3. 跨境电子商务 4. 信息查询	涵盖海关、国检、海事、港务等多个部门	2015 年 6 月	截至 2015 年 7 月，12 家企业参与试点，南沙航线增加 20 条，通关效率提升 50% 以上。 ^①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2.0 版	增加以下功能 1. 舱单申报 2. 国际邮件快件 3. 国际会展 4. 企业资质 5. 物流动态 6. 进出口许可 7. 支付结算 8. 物流服务	涵盖海关、检验检疫、边检等 21 个部门	2016 年 4 月	截至 2016 年 12 月，通关时间缩减至 5 分钟，企业进出口货物申报时间效率提高 30% 以上，“单一窗口”货物申报使用率达到 90%，国际航行船舶运输工具和舱单申报业务使用全面覆盖。 ^②
天津自贸区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1.0 版	1. 货物进出口 2. 运输工具申报 3. 人员申报 4. 支付结算 5. 贸易许可 6. 企业资质 7. 自贸专区	海关、检验检疫、海事、商务等 4 个口岸部门和 9 个海港服务模块	2015 年 7 月	截至 2015 年 10 月 8 日，205 家企业安装平台客户端共 330 台，平台累计报关作业 26 万余票，约占天津口岸报关总量同期的 2/5。
福建自贸区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1.0 版	1. 货物申报 2. 运输工具申报 3. 关检“三个一” 4. 政务服务 5. 金融服务 6. 贸易许可业务 7. 对台及“一带一路”专区	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共同建设，30 多个相关部门参与	2015 年 8 月	截至 2015 年底，直接服务 3700 多家企业，间接服务 2.5 万多家外贸企业，日单证处理 3 万多票；船舶进出境和货物进口检疫的申报以及空运海关物流和海运海关物流的监管等四个业务模块业务覆盖 100%。电子账册监管及关区转关等环节业务覆盖 95% 以上。 ^③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自贸试验区官网及相关网页资料整理而得

①《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试运行国际货物转运仅 3~5 小时》，<http://gd.people.com.cn/n/2015/0701/c123932-25422067.html>。

②《广州全面推进单一窗口建设 地方财政每年补助近 2 亿元》，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701/07/139995_50716333.html。

③《福建省自贸试验区功能性平台建设不断深化》，<http://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2275.html>。

2. 构建“三互”大通关模式

构建“三互大通关”模式，既是自贸区作为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者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有利于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实施相辅相成。“三互”是指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为落实统一性、规范性和时效性要求，全面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三位一体的简称。^①通过“三互”改革，强化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防等口岸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推动口岸通关流程之间由“串联式”向科学的“并联式”转变，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国际的全方位互联互通，真正实现通关便利化。

四地自贸区在全面展开通关无纸化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关检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进而实现以往的通关一体化模式向“三互”大通关模式转变，具体推进情况如表2。从中可以看出，四地自贸区在开展通关无纸化以及关检合作“三个一”等重点举措上，尽管启动时间不一，但都取得了较大成效。而对于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四地均以地缘因素与历史因素为基础，各有侧重。广东侧重于强化与港澳海关合作，建立与港澳联动的口岸监管机制；其中横琴片区积极推进珠澳口岸查验机制创新和口岸综合部门联合执法试点；南沙片区实施“四个信息互换^②、四个监管结果互认^③、五个执法互助^④”新型合作模式，建立数据交换、合作会商和业务协调等长效机制。天津自贸区在以深化津京冀合作为导向，实施津京冀区域海关通关一体化和检验检疫一体化改革，并建立无水港运营模式。福建自贸区一方面实施与泛珠区域和“一路”沿线区域的通关一体化合作，另一方面开展闽台口岸数据传输，推进两岸检验证书互查互认，深化闽台口岸基层海关“三互”实务合作。相比于粤闽津三地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上的步伐更快。2016年5月，上海自贸区已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海关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开启了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试点，率先走在一体化通关的前沿。

3. 逐步创新通关监管制度

四地自贸区成立以来，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不断创新通关监管制度，成为推动贸易便利化的首要部门。表3为四地自贸区成立以来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在贸易通关便利化领

^①钱锦、牛犇、邹毅：《我国海关“三互大通关”改革及其成因解析》，《中国市场》2016年第20期，第213～215页。

^②指企业管理资信、进出口货物申报、查验、放行四个方面。

^③指在监管过程中共用监管设施，对地磅称重、集装箱机检图像分析、辐射探测、视频监控等商品外观监管结果，商品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重）量等商品技术性监管结果，监管要求相同的可共享、互认对方监管结果，互认关检跨区域监管结果等四项监管互认措施。

^④在物流监控管理、商品鉴定和归类、原产地认定、固体废物属性鉴定及夹杂物超标认定、价格认定等五方面开展执法互助。

表 2 四地自贸区“三互”大通关模式重点举措推进情况

重点举措		上海自贸区	广东自贸区			天津自贸区	福建自贸区
			南沙片区	珠海横琴片区	前海蛇口片区		
关检合作“三个一”	启动时间	2013－09	2012－05	2014－9－23	2014－9－23	2014－12－31起全面推进	2014－10－15
	构建成效	“一次申报”占上海海关报关单总量的 80% 以上，相比 2015 年增长 6.3 倍	减少关检申报项目 30% 以上，查验环节时间及费用节省近 50%	全面覆盖进境一般贸易货物，申报数据简化 77 项，申报、查验时间分别节省 30%、50%	申报、查验时间分别节省 25%、50%，相关费用节省 50%。	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一次申报”系统的上线试点	申报时间从 4 个小时缩至 5－10 分钟；船舶进境、出境申报时间分别由 36 个小时缩至 2.5 个小时、1 个小时
通关无纸化	启动时间	2015－7－1	2015－4－21			2012 年	2013 年 6 月 17 日起
	构建成效	无纸化率 90% 以上	无纸化率达到 99.6%	无纸化率达到 93.8%	无纸化率达到 96.3%	对进出口企业实现无纸化通关作业全覆盖	无纸化覆盖率近 97%
通关一体化	启动时间	2014－12－1	2014－9－22			2015－4－21	2015－5－1
	构建内容	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	实施广东地区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2015 年 5 月 1 日后改革范围扩至福建、广西、海南三地海关			实施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设立了 10 个无水港	实现泛珠区域通关一体化以及“一路”沿线区域直属检验检疫局间检验检疫通关一体化
	构建成效	海运进口报关单通关时间缩短近 10 小时，24 小时放行率提升近 10%	通关时间由 8.3 小时减少至 5.96 小时，作业时间由 4.14 小时减少至 2.77 小时，24 小时通关率由 91.44% 提高至 92.45%			整体通关和物流成本减少近 30%，平均每批货物通关时间节省 0.5 天，口岸快速放行率达 88%	海关平均审单时间从 2.73 小时降低到 1.67 小时。五小时审结率由 87.3% 上升到 94.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地自贸区、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官网以及相关网页资料整理而得

表 3 四地自贸区通关监管创新制度

区域	创新制度内容	创新制度成效
上海自贸区	1. 一线进境货物“先进区、后报关”； 2. 区内货物流转自行运输； 3. 简化统一进出境备案清单； 4. 融资租赁海关监管制度； 5. 批次进出、集中申报； 6. 加工贸易工单式核销； 7. 仓储企业联网监管； 8. 保税展示交易； 9. 智能化卡口验放。	1. 一线实际进、出境平均通关时间较上海关区平均通关时间缩短 78.5% 和 31.7%，物流成本平均下降 10%。 2. 每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 20 至 30 万元。 5. 一年最高可为企业节省成本 150 万元，通关时间减少 2 个小时。 9. 卡口智能化验放率超过 50%，物流运输能力提升 25%~50%。
广东自贸区	1. 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进口提前申报、船边分流验放”“出口提前申报、卡口分流验放”，推进货物通关“零纸本”； 2. 支持横琴自贸区开发开放：启动进口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展示交易、智能化卡口、澳门单牌车便利进出等项目； 3. 简化 ECFA 货物澳门转运通关手续：建立 ECFA 货物经澳门转运快速通关模式； 4. 深化内澳海关监管结果互认：减少对同一进出境货物重复查验； 5. 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1. 港区进出口货物物流运转时间由 2~3 天缩至 1 天以内，海关通关时效提高 50% 以上，无纸化申报报关单占比超过 99%。 2. 2015 年 1~11 月经横琴口岸验放的 ECFA 货物货值达 2755 万元，减免关税 159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 和 16%。
天津自贸区	1. 海关先后出台“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制度、简化无纸通关随附单证、集中汇总征税制度、多样化涉税担保制度、联网原产地证书电子审核制度等三批共 29 项通关便利化措施； 2. 检验检疫部门先后出台“京津冀检验检疫一体化制度、天津口岸直通制度、检验检疫分线监管制度”等三批共 40 项通关便利化措施。	1. 整体通关物流成本减少近 30%。 2. 平均每批货物通关时间减少 0.5 天，每标准箱物流成本节约 120 元。
福建自贸区	1. 简化原产地证提交需求：“简化 CEPA 以及 ECFA 项下货物进口原产地证书提交需求”； 2. 加快闽台监管互认：对台商品实行快速通关模式、建立原产地证书核查机制、推进台湾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结果采信； 3. 推动交通工具便捷通关：台车入闽一体化快速通关模式、对厦金客轮实施分类管理； 4. 试点海运快件业务：简化海运快件的移场监管手续； 5. 推动台湾产品快速通关：对台湾输入自贸试验区的农产品、食品等实施“快审快核”的标签审核模式。	1. 平均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减少 2 天，通关成本节省 8%。 3. 符合要求的船舶电讯检疫率由零提高到 90%，通关提速 50%。 5. 内容简化 90%，时限缩短至 1 个工作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地自贸区官网、各地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官网以及相关网页资料整理而得

注：鉴于数据资料有限，此表中只列出部分创新制度的成效；“创新制度成效”一栏中的序号对应“创新制度内容”序号

域所推出的创新举措。上海自贸区成立较早，在制度创新方面较为成熟。在上海自贸区成立近一年后上海海关就已推 9 项贸易通关便利化措施。遵循“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原则。^① 上海自贸区初步形成了“海关通关一体化”的海关监管新模式，成为后期广东、天津和福建三大自贸区创新海关监管制度的成功典范并被竞相复制拓展。津闽粤三地自贸区围绕各自战略定位推出特色创新通关便利举措。广东自贸区将珠海横琴片区作为珠澳合作的重要窗口，致力于打造两岸口岸最畅通通关环境。为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天津检验检疫局首创津京冀检验检疫一体化新模式，通过京津冀三地检验检疫局协作实施“三通、两直、四放、五统一”和“无纸化”，从而改革现有通关模式和业务流程。福建自贸区是闽台两岸合作交流的平台，因此，在进行监管制度创新时，福建自贸区着重致力于推进闽台交流合作，先后推出 26 项对台贸易通关便利化措施。

四、四地自贸区贸易通关便利化发展路径选择

1. 找准“单一窗口”建设模式，持续推进完善“单一窗口建设”

随着平台版本的优化，“单一窗口”业务功能不断拓展，但从整体来看，四地自贸区的单一窗口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平台功能不够全面，各功能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一定差异，发展不平衡。因此，未来要进一步拓展功能板块项目，尤其是拓展优化与海关、质检部门相关的重点功能，优化企业用户相关体验。根据区域定位开发具有特色的功能板块。如天津自贸区可以设立京津冀专区功能，广东可以设立粤港澳专区功能，福建可以设立闽台专区功能。此外，平台应加快全面对接贸易流程相关部门进度，协调推动相应部门将其业务系统与单一窗口平台实现有效对接。目前，国际上“单一窗口”建设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以荷兰和瑞典为代表的“单一机构”模式，^② 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单一系统”模式，^③ 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单一资料自动处理系统（即公共平台）”模式。^④ 尽管目前自贸区侧重于建设高效率“公共平台”模式，逐步扩展“单一窗口”参与部门，但是离信息共享和协调沟通等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平台功能也有待拓展。结合长远

^①《在自由贸易区试行一揽子创新：上海的新引擎》，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7/09/c_124978209.html。

^②“单一机构”模式是指由专门制定的单一的政府监管机构集中处理所有进出口监管业务并协调其他部门工作。

^③“单一系统”模式是指建立一个特定的系统统一处理贸易业务，各个监管部门的职权仍然相互独立。

^④“公共平台”模式是指建立一个集成各个监管部门系统，实现信息共享的信息处理公共平台。通过该平台各个相互独立的监管部门可以实现共享协作，贸易商也可以享受一站式服务体验。

发展和我国国情特点，四地自贸区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单一系统”模式，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混合系统型”“单一窗口”，通过平台实现通关、商检等业务的一站式系统服务。另外，由于自贸区成立时间不同，加上各区域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四地自贸区“单一窗口”平台的建设模式和建设进度存在一定差异。如果缺乏一个统一标准，各自分散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会产生重复建设问题，导致人力与物力资源浪费、平台之间难以有效对接。未来各地政府以及政府部门之间要加强合作与沟通，在兼顾各地贸易情况和业务需求的前提下，保证在全国层面建设的一致性，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2. 深入“三互”大通关改革，建立先进口岸通关管理模式

在推进贸易通关便利化过程中，自贸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阻碍就是改革所涉及的利益相关部门缺乏协作。货物进出口涉及海关、检验检疫部门、港口码头主管部门、外汇管理局以及其他多个政府部门，然而我国长期实行各职能部门垂直化管理，^①各部门之间协调机制不畅，缺乏沟通与交流，在推进和实施便利化改革的措施时往往会带来许多问题。尽管在电子口岸和“单一窗口”建设下，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已实现互联，但由于货物通关涉及多个口岸管理部门，通关流程环节繁杂，且呈现出“串联式”，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就使整个通关流程难以正常进行，导致“三互”建设难以真正到位。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口岸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打破部门之间的僵化思维，必要时可建立利益共享分配机制。

3. 完善口岸生态环境，推动通关一体化全覆盖

通关一体化改革既要满足企业的需求，又要保证相关口岸管理部门的基本利益。单靠口岸建设投入远远不能创建一个高效便捷的口岸生态环境。未来各自贸区要从政策法规、信息平台、海关建设和基础设施等三方面的一体化推进区域大通关。在政策法规方面，建立科学统一的风险防控管理体制，制定完善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充分利用信息化监管进行风险把控。在信息平台上，与“单一窗口”建设目标相应，我国电子口岸主要依托国家电信公网，将口岸相关管理部门间与大通关流程相关的数据连接，实现数据共享和联网核查，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电子服务，是对“单一窗口”理论的特色实践，目前我国电子口岸建设已经初步进入集通关、物流、商务服务的大通关统一信息平台阶段。然而当前我国口岸管理部门还未完全达到信息的互联互通，口岸执

^①王立强、张凤：《中国贸易便利化进程及国际比较》，《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5期，第2页。

法机关全部实现业务联网还存在许多“堵点”，与国际“单一窗口”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因此要加大技术投入水平，加快以电子口岸为依托的“单一窗口”建设，将我国自贸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打造成为“一次申报”、满足企业通关便利化的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避免各部门业务统计数据之间的信息孤岛。在海关建设和基础设施上面，统筹使用口岸查验场地，采取统一规划、共享共用的方式推动资源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区域海关之间的优势互补。

4. 坚持制度创新，形成高效通关机制

通关便利化不仅涉及关检、信息平台等方面，还包括支付结算、保险、仓储、税收、物流运输等众多延伸环节。四地自贸区在加强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以贸易便利化为中心的通关监管制度创新力度的同时，也要注意贸易产品通关配套程序的便利化。以政府为主体制定整体改革方向，引导海关、检验检疫、金融保险、税收部门、知识产权部门以及行业部门共同以便利化为中心，协作制度创新，实现便利化制度涵盖整条价值链。此外，促进四地自贸区之间在通关监管制度创新上的交流与借鉴，按照“成熟一批推广一批”的原则充分发挥自贸区在全国的示范效应。同时，加大对相关制度及举措的宣传力度，鼓励企业积极配合和参与贸易通关便利化改革，充分发挥企业对于推进贸易通关便利化进程中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推动贸易通关便利化改革顺利进行。

责任编辑：谷 岳

编者按：2017年5月15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主题是“汇聚智慧、共谋全球发展”。峰会分为开幕式和四个平行圆桌会议。本期刊发“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战略对接”两个平行圆桌会议的综述。

“一带一路”建设 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

——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圆桌会议综述一

夏友仁

一、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一）应重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柱·查尔斯认为全球化中的不平等、不均衡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一是资本和劳动的不合理配置，全球化成果的不均衡分享；二是资本短缺和过度金融化并存；三是资本与政治合谋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应探讨新的模式来纠正这种趋势，中国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模式可资借鉴。全球绿色发展署署长弗兰克·莱博曼指出，全球化经济发展已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空气污染、贫困、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等。

（二）旧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

清华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世界人口的结构变化会影响可持续发展，这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挑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人口将会在20年后出

现负增长，而非洲情况则相反。由此带来的教育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全球问题。孟加拉发展研究院院长坎·艾哈迈德·塞义德·莫什德警告，如果继续按照西方的消费标准行事，人类将在未来 100 年进入绝望境地。世界需要更好的一体化模式、技术和市场准入，以克服贫穷和不平等问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联合主席约翰·桑顿指出，民粹主义可能给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政策变化。

（三）新型全球化应涵盖更多内容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阿扎马·迪卡莫巴耶夫强调，全球化发展应关注人类的精神与安全。局部冲突将长期存在，一些地区需要尽快稳定下来，不能只考虑经济与环境问题。

（四）科技进步可使全球化发展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认为，当今世界处在文明进步、发展模式、世界格局、科技创新和中国发展的历史转折期。未来将可能出现一个以人为本的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人类社会新形态，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信息组织和服务，可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种形态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机器成为伙伴，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都有望解决。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建设将开辟全球发展新路径

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认为，中国政府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及亚投行合作框架，中国能够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合作组织、机制和国际标准，并作为一个领导者引领经济全球化。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武汉大学战略研究院院长辜胜阻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把中国历史和现代连接起来的全球化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主体地位、新的平台、新的合作模式和创新引领的增长方式，通过“五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与各国战略对接，并尝试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从而克服以往全球化的不足。中国与全球化中心理事长王辉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多边的；贸易仍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元素之一，自由化和多边化仍是趋势；智库在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帮政府做出

更好的决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阐发两个观点：一是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钥匙。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发展不均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诸多问题，这些只有在发展中解决。二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务实的全球化发展框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仍有拓展空间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孟买）主席苏德恩德拉·库尔卡尼表示，非常希望印度能够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印度，印度也需要“一带一路”建设。印中都是文明之地，两国合作对亚洲和全球都有好处。他还指出，人口聚集的南亚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印中经济走廊和印巴经济走廊应该连接起来。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理查德·托马斯·格理菲斯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应包括更多内容，比如苏伊士运河的拓展。希望中国能够在改善世界经济失衡、连接欧洲与亚洲各国、改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更有作为。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一）“一带一路”建设应走绿色发展之路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马克·兰博蒂尼针对经济发展所伴随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经济发展规划要确保环境不被破坏；二是“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更好利用可再生资源；三是新建基础设施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美国环保协会总裁戴瑞格认为，绿色低碳发展才是共享繁荣的唯一路径。她期待并相信“一带一路”建设能够走绿色环保发展之路，并提出一些具体方案：推广绿色交易和绿色金融；利用先进技术对资源环境目标进行监测；采取激励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引入绿色供应链的管理系统等。莱博曼对“一带一路”建设所提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表示认可和赞赏，并着重建议“一带一路”建设要多普及电动汽车、共享单车这样的清洁能源和交通方式，建设清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市。日本综合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理事长高桥邦夫指出，日本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有很好的经验和技术，可以和中国加强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二）“一带一路”建设要走科技创新之路

太和智库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论坛前欧洲业务副总裁托斯登·耶里尼克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侧重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大量使用新技术、新方法，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迅速发展的知识革命将导致就业、消费的巨大转变，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

的战略设计应充分考虑到科技发展的影响。

（三）“一带一路”建设应加强政策协调

瑞士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执行主席理查德·美伦德·奥提兹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各国应就各自发展战略进行国际协调，具体内容包括数字化、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等，可以考虑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国际标准；二是要构建一个多边的贸易、投资框架；三是通过合作来解决气候、海洋和就业等问题。瑞典发展与政策分析办公室驻北京代表处主任哲瑞思提出，要确保“一带一路”项目在概念、规模、融资、环保和采购流程诸方面可以管控，应建立一系列跨境机构和机制，实施监测与评估，以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有效发展。加拿大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忠加提出，政策沟通协调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此外，全球智库应加强交流。匈牙利经济研究所所长安德拉斯·韦尔提斯指出，对于各国政策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各国智库应共同研究应对。

（四）“一带一路”建设要推进国际人文交流与合作

匈牙利察萨德维格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拉斯洛·吉奥尔吉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应建立在文化和精神之上，以实现长期收益。库尔卡尼提出：全球化需要新模式，“一带一路”建设应涵盖生态、文化、艺术等内容；应设立一个国际基金支持文化艺术发展，促进国际文明合作。德国罗德事务所柯泰乐表示，类似德国和中国的一些联合培训项目，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跨文化、跨国家的培训与交流，支持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副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和治理 注入新活力与正能量

——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圆桌会议综述二

任海平

一、“一带一路”倡议开启新的全球治理机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斯基，对战略对接的重要性和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建立北方通道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战略和政策的协调。实现战略对接是非常难的，毕竟战略规划是国家决策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也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独一无二的做法就是战略协调。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中俄可建立一种合作机制，比如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进行对接，建立相关的联合委员会，推动政策和策略的协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启了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可能发展成为新的二十国集团（G20）框架，成立新的国际组织。

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耶尔詹·萨尔特巴耶夫提出，现在全球贸易增长比全球经济增长要慢，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推动，对于全球增长非常重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可以在交通和物流方面建立非常强大的网络，同时会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哈萨克斯坦将会成为“一带一路”网络中非常重要的枢纽，也会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节点之一。哈萨克斯坦还希望通过交通网络的改善，让更多中国的设施资产能够从中国转移到哈萨克斯坦，合作领域从交通基础设施转向高科技方面，创造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很多国家有发展需求，可以帮助中国出口产能，中国也可通过这些产能帮助周边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在项目投资过程中必须把握风险，把“一带一路”建设和中亚国家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每个国际机制都有各自优势，应该是相互兼容而不是相互竞争。可以用上合组织的机制进行协调，使得欧亚国家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百年一遇的重大变局

中，过去一个时期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做大了经济蛋糕，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开始凸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同时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经济全球化带来新动力，打造全球化升级版。

二、“一带一路”建设将重构国际规则和改变国际关系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阿莱西亚·阿米西尼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要致力于成为包容、全面的区域合作机制，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也包括中东、非洲。目标还应包括消除增长的瓶颈，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推进共同发展以及互联互通。互联互通不仅是实体合作，还包括数字虚拟的互联互通，最重要的发展瓶颈也是互联互通。中亚地区可能是互联互通最差的地区，也是具有最大增长潜力的地区。从历史上看，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就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一直在推动发展。现在中国的贸易增长可能比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快 20% 左右。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改变国际贸易格局的包容性倡议。要更加关注交通枢纽建设，这将大大提高整个交通网络的效率。很多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常重要，比如东南亚、中亚、东非等。地中海地区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这个区域是“一带”和“一路”交汇的地方，是把陆地和海洋两个网络进行整合的重要地区。要建立更好的中欧交流平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使中欧联系更加紧密，让欧洲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推动国际贸易，同时也将加强国际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很多国际规则会重新改写，国际关系也会有所变化。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任务是推动“五通”，关键在于民心相通，其基础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同文明要相互尊重，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坚持文明价值的共同性，“同”远大于“异”。不同文明之间的“同”与“通”，正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纽带。还要尊重文明发展的互补性，坚持文明成果的共享性。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曲折复杂，不同文明更应携手发展。要共同努力，把文明交流互鉴具体化、机制化，使心灵相通成为全面合作的根本动力。

三、“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沿线国家创造巨大发展红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水平不同，但从战略上都可以实施有效对接，通过对接共享“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的红利。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在五个方面创造巨大红利：一是战略对接红利，二是 65 个国家占全球 44% 的人口红利，三是巨大市场空间红利，四是创新红利，五是共享红利。这五大

红利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更加美好的愿景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中国的传统人口红利，即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已经释放完了，但我们正在升级人口新红利，即人力资本红利。像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包括一些亚非欧国家，平均年龄都在35岁以下，印度平均年龄才28岁，新的人口红利和传统人口红利完全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成为共享人口红利、整体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已经开始，尤其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这些转移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和载体可以创造更多红利，使这些后发国家获得发展机会，使中国能够持续享受这些国家所创造的新红利。战略对接共享红利将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美好愿景的重要载体。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测算显示，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占全球GDP的60%，所创造的贸易总额将超过20万亿美元，未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比重将超过30%，所以面向未来的红利是巨大的。另外，将来“网上丝绸之路”创造的贸易会使大家更快地共同富裕，共同分享“一带一路”创造的红利。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建议，“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建立一个行动方案和两个电子平台。一个行动方案指贸易投资促进行动方案，需要大家共同制定，在制定贸易投资战略以及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软环境方面，统一行动、统一意志。两个电子平台是贸易投资管理简化平台和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投资管理简化很重要，因为很多国家投资环境差，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执行力度较差，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站式服务，通过一些软件使大家有统一的规划和简化程序，联合国已经为此设计了软件包，可以为沿线国家服务。

四、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美国能源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艾瑞克·鲍德曼·赫兹提出，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就是清洁能源市场，中国在清洁能源及节能方面的市场规模和投资都是引领者，其投资约占全球的1/3，相当于美欧总和。中国应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推进“绿色丝绸之路”的概念。首先要在建筑、基础设施方面提高节能水平，降低污染。其次是智慧城市设计和智慧基础设施设计，即所谓的一体化设计。最后，“绿色丝绸之路”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三赢”，即可持续的投资回报，以及环境、就业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改善。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蕊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7 年 7 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稳步复苏，美英增长预期下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称，随着中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改善，全球经济目前正稳步复苏。确信无疑的是全球经济正在获得持续稳定的增长动能，2017 年和 2018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 3.5% 和 3.6%，与 2017 年 4 月发布的预测值一致。但 IMF 调低了对美国、英国 2017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 2017 年经济增速为 2%，与 4 月预测值持平；2018 年增速较 4 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1.9%。其中，美国经济 2017 年、2018 年预计均增长 2.1%，较 4 月预测值分别下调 0.2 和 0.4 个百分点。2017 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较弱，且美国政府酝酿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力度可能不及预期，是 IMF 调低美国增速预期的主要原因。同时，还将英国 2017 年经济增长预测值调低了 0.3 个百分点至 1.7%，因为英国经济第一季度表现不及预期，并且英国“脱欧”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此外，考虑到欧元区 2017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且政治不确定性有所下降，将欧元区 2017 年和 2018 年经济增速分别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至 1.9% 和 1.7%。IMF 将日本 2017 年经济增速上调 0.1 个百分点至 1.3%，2018 年增速预期维持在 0.6% 不变。

此外，报告预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2017 年经济增长 4.6%，比 4 月预测值提高 0.1 个百分点，2018 年增速预期维持在 4.8% 不变。

（二）亚行上调 2017 年亚洲经济增速至 5.9%

亚洲开发银行 2017 年 7 月 20 日发布了《2017 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亚洲地区 2017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5.7% 调高至 5.9%，2018 年增长预期从 5.7% 调高至 5.8%，原因是全球对于亚洲出口的需求增加并且油价维持在低位等。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开了一个好头。尽管全球经济恢复仍面临不确定性，但该地区经济体已经做好面对潜在冲击的准备。”同时，亚行还调高了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预期，将 2017 年的通胀预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至 2.6%，2018 年的通胀预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至 3%。

亚行将东亚地区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增长预期分别从 5.8% 和 5.6% 调高至 6.0% 和 5.7%。受净出口增长和国内需求旺盛影响，中国 2017 年经济增长将达到 6.7%，2018 年将放缓至 6.4%；2017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6.9%，好于预期。报告指出，由于韩国新近选举了总统，消除了政治不确定性，经济增势看好。亚行表示，南亚将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维持对南亚 2017 年增长 7.0% 和 2018 年增长 7.2% 的预期。由于印度强劲的国内需求，亚行对其 2017 年和 2018 年经济增长预期仍维持在 7.4% 和 7.6%。报告预计，东南亚地区 2017 年将维持 4.8% 的经济增长率，2018 年增速将加快至 5.0%，其中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2017 年第一季度均维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速。东南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强劲的国内需求，尤其是私人消费和投资拉动。

此外，由于美国 2017 年一季度经济疲软，亚行将其经济增长预期调低，而欧元区和日本增长预期则因内需强劲而被调高。两者相抵，亚行维持对主要工业经济体 2017—2018 年经济增长 1.9% 的预期。

（三）全球投资资产截至 2016 年底同比增长 7%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7 年 7 月 12 日宣布，全球投资资产截至 2016 年底同比增长 7%，达到 69.1 万亿美元。全球股价走高推高投资资产余额的因素突出，整体来看资金流入有限。按地区来看，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率较高。波士顿咨询每年都发布有关全球投资资产市场的调查报告。本次报告依据对占全球整体投资资产 62% 的 153 家大型信投公司的调查，以及在 43 个国家的市场调查结果制成。

2016 年，全球投资资产增长 7%，但显示全球股价走势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上涨 6%。投资资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价走高，与年初相比资金流入额仅为 1.5%。自 2012 年以后，资金流入额始终徘徊在 1% 以上，仍未恢复 2008 年雷曼危机以前的水平（4%~6%）。

报道称，按地区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资产增长显著。中国增长 21%，资金流入额也增长 17%，表现突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均在加强。巴西的投资资产增加 17%，不含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亚洲增加 16%。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占全球投资资产约 50% 的美国尽管增长 5%，但出现 0.3% 的资金外流；日本也仅增长 3%，出现 1% 的资金流入。

（四）IMF 呼吁各国避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2017 年 7 月 28 日 IMF 发布《2017 外部风险报告》显示，经常账户盈余越来越集中于英美等少数发达经济体，这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并引发更多风险。IMF 研究部门主管库贝杜表示，报告的重点之一是不惜任何代价呼吁各国避免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无助于改善外部失衡，甚至还可能危害本国及全球经济。

报告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外部失衡情况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缩小，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土耳其等国经常账户赤字下降。发达经济体外部失衡情况则有所加剧。德国、韩国等国继续保持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而经常账户赤字越来越集中于英国和美国。IMF 呼吁，拥有经常账户盈余的经济体在财政空间富裕的前提下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刺激国内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经常账户赤字的经济体应推进财政整顿，根据通胀情况逐步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来提高竞争力和整体储蓄水平。

（五）全球约 10% 就业人口极度贫困

联合国 2017 年 7 月 17 日发表了力争到 2030 年消除贫困与饥饿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现状总结报告。报告指出，2016 年与家人同住的约 10% 就业人口是过着一天不足 1.9 美元生活的“极度贫困人群”，呼吁有必要加快相关工作。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尤为严重，2016 年时 34% 的就业者及其家庭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全球不满 5 岁幼儿发育不良比例虽从 2000 年的 32.7% 下降到了 2016 年的 22.9%，但据估算仍有 1.55 亿人。其中，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占 3/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关切称，“要到 2030 年达成目标，很多领域的进展都太迟”，强调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工作。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主要动力

2017 年 7 月 24 日 IMF 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版本，再次上调中国 2017 年和 2018 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 0.1 和 0.2 个百分点至 6.7% 和 6.4%。这是 2017 年

IMF第三次上调对中国本年度经济增长的预期，主要是考虑到 2017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强劲，并且未来有望继续获得财政支持。

IMF 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和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十分重要，中国将继续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于中国经济 2017 年上半年的表现，奥布斯特费尔德表示，“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非常强劲的增长，中国第二季度 6.9% 的增速同样超过预期”。从体量上来说，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推动了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今后中国将继续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对于亚洲地区的繁荣尤为重要。”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溢出效应非常大。“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影响不仅限于中国。”

奥布斯特费尔德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转向服务业主导、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对世界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中国保持强劲的增长数字，还在于中国以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式增长。中国经济面临信贷增长较快等风险，但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开始着手采取措施，包括与 IMF 展开建设性合作。

谈到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奥布斯特费尔德赞赏中国以积极方式加入有关全球化的讨论，认为中国能够采取切实行动推动全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不仅有望带来大量基础设施投资，而且能够降低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发展。”

（二）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

国际能源巨头 BP 集团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16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包括水电）同比增长了 14.1%，增加了 5300 万吨油当量，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其中，中国超过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在科技进步和环境需求驱动下，世界能源正加速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清洁转型的引领者。

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生产中的占比只有 4%，但增长势头非常强劲。2016 年可再生能源增长量占全球能源新增量的 1/3。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比重从 2015 年的 6.7% 上升到 2016 年的 7.5%。作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结构优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因子。截至 2016 年底，中国风电累计装机量和太阳能累计装机量均位居世界首位。BP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这是去年发生的最新变化”。中国正引领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2016 年中国贡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的 40%，超过经合组织总增量。

BP 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水电、核能增长的主要来源。2016 年全球水电

产量同比增长 2.8%，相当于 2710 万吨油当量。其中，中国贡献超过 40%。在核能领域，2016 年全球核能产量同比增长 1.3%，增加了 930 万吨油当量。而中国核能产量增速达到 24.5%，增量为 960 万吨油当量，相当于全球核能生产净增长全部源自中国。在戴思攀看来，当前中国核能产业发展受到全球瞩目。出于经济和政治等因素，欧美等传统核能领域的领导者正在放缓核能发展步伐，核能产量下降。而这些缺口正在由中国填补。随着技术突破，中国大力推动三代核电技术，安全性能进一步提高。如今，中国核能产业发展异军突起，在能源清洁转型中担当重任，未来也将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样板。

在二氧化碳排放领域，能源效率加速提高、能源结构加速调整使得全球碳排放增长步伐放缓。而中国碳排放已经出现下降势头。BP 统计年鉴显示，2016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同比增长 0.1%，而中国碳排放同比下降了 0.7%。戴思攀说，三年前全球碳排放每年增长 2.5%，而近三年碳排放几乎没有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离巴黎协定目标更近了。中国在这一变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继过去 10 年碳排放增长超过 75% 以后，中国碳排放在过去两年中实际已经有所下降，这种趋势将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变化。

（三）中国民企强势抢位世界 500 强

2017 年度《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正式揭晓，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达到了 115 家，较 2016 年增长 5 家。总体看来，尽管中国上榜企业依然保持国企央企占大比重的局面，但民营企业也呈现崛起趋势。

1. 数量继续上升。2017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 14 年增长，达到 115 家。其中，中国内地（含香港在内，不包括台湾地区）为 109 家企业。10 家中国公司首次上榜，它们分别是安邦保险集团、恒力集团、阳光金控、阿里巴巴、碧桂园、腾讯、苏宁云商、厦门建发集团、国贸控股集团和新疆广汇。新上榜公司最多的行业是贸易（3 家），其次是 2 家来自互联网服务和零售的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碧桂园是唯一新上榜的房地产企业。数据显示，这 109 家企业的总营业收入达到 6.04 万亿美元，占《财富》世界 500 强总营业收入的 22%，占中国 2016 年 GDP 的 55%。

在前五名中，中国占据三个席位。沃尔玛连续 4 年排名第一，其 2016 年营业收入达 4858.7 亿美元，同比提升 0.8%，位列三甲的其他两家为中国公司——国家电网和中石化，中石油和丰田汽车分列第四和第五。榜单中前 50 强的中国内地企业还包括：工商银行（第 22 位）、中国建筑（第 24 位）、鸿海精密工业（第 27 位）、建设银行（第 28 位）、农业银行（第 38 位）、上汽集团（第 41 位）和中国银行（第 42 位）。

在利润榜上，前五名中除了排在第一位的苹果公司，其余均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但对它们而言，似乎是利润和规模难以兼得，

包括苹果在内的这 5 家公司收入均有大幅下滑。按总资产来看，工商银行则排名第一位。

在净资产收益率（ROE）榜上，中国公司中排位最高的是华为、美的、腾讯、吉利和万科。其中，美的是 2016 年第一次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的中国家电企业，2017 年依然是该行业唯一的上榜公司。

2. 国企央企占优势。进入榜单的中国企业所在行业 and 所有制分布较过去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中国 80% 的上榜企业是地方国企或央企，主要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行业。以榜单上的中国前十大企业为例，它们的营业收入都在 1000 亿美元以上。这 10 家企业中，除了排名第五（全球排名第 24 位）的中国建筑和排名第九（全球排名第 41 位）的上汽集团外，其余 8 家企业都来自生产要素领域；10 家企业中，除了平安集团，其余 9 家都是央企。

2017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也呈现一些变化。首先，中国新增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整个榜单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增至 20%。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的顽强蓄积，民营企业相对而言有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更多民营企业的崛起反映出中国企业 2.0 时代逐渐到来。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阿里巴巴、腾讯上榜，加上 2016 年首次上榜的京东，2017 年上榜的全球 6 家互联网服务公司中国和美国各占 50%。美国的 3 家为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以及新上榜的社交媒体巨头脸书（Facebook）。

3. 盈利能力有待提高。中国上榜企业虽然数量上持续增长，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而不强的状况。伟大企业的界定标准不是销售收入，而是盈利能力。数据显示，中国内地 109 家上榜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仅为 1.65%，1 块钱的资产只能产生 1.65 分的税后利润；而美国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 4.79%，是中国企业的 2.9 倍。刘俏坦言，“国内上榜企业的资本使用效率确实不高。我们通过大量的银行信贷和投资形成的资产并没有产生足够的盈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是匹配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109 家上榜企业中有 10 家企业的盈利为负，这显然与世界 500 强这一身份极为不符。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催生出大批伟大的企业”。

当然，其中也不乏表现优秀的中国企业。2016 年首次上榜的恒大集团，2017 年以 318.28 亿美元营业收入位列 338 名，较上年大幅上升 158 位，成为世界 500 强历史上升名单年提升最快的企业之一。资料显示，恒大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高速稳健增长。截至 2016 年，恒大营业收入已较 2009 年上市之初增长近 40 倍，总资产、销售额、净利润等核心指标亦分别增长 21 倍、12 倍和 16 倍。恒大 2016 年销售 3734 亿元，成为地产“一哥”。

责任编辑：李 蕊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 年 7 月)				
世 界	3.4	3.2	3.5	3.6
发达国家	2.1	1.7	2.0	1.9
美 国	2.6	1.6	2.1	2.1
欧元区	2.0	1.8	1.9	1.7
日 本	1.1	1.0	1.3	0.6
发展中国家	4.3	4.3	4.6	4.8
印 度	8.0	7.1	7.2	7.7
俄罗斯	-2.8	-0.2	1.4	1.4
巴 西	-3.8	-3.6	0.3	1.3
世界银行(WB,2017 年 6 月)				
世 界	2.7	2.4	2.7	2.9
发达国家	2.1	1.7	1.9	1.8
发展中国家	3.5	3.5	4.1	4.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7 年 8 月)				
世 界	3.0	2.5	3.0	3.0
美 国	2.9	1.5	2.1	2.4
欧元区	2.0	1.7	2.0	1.8
日 本	1.1	1.0	1.4	1.1
印 度	7.7	7.1	7.3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世 界	2.6	2.3	4.0	3.9
进口				
发达国家	4.4	2.4	4.0	4.0
发展中国家	-0.8	1.9	4.5	4.3
出口				
发达国家	3.7	2.1	3.5	3.2
发展中国家	1.4	2.5	3.6	4.3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为 2017 年 4 月预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7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年 7 月)				
世界	2.8	2.8	3.5	3.4
发达国家	0.3	0.8	1.9	1.8
发展中国家	4.7	4.3	4.5	4.6
英国共识公司(2017 年 8 月)				
世 界	1.9	2.5	3.0	2.9
美 国	0.1	1.3	2.0	2.0
欧元区	0.0	0.2	1.5	1.3
日 本	0.8	-0.1	0.5	0.8
印 度	4.9	4.5	3.6	4.6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6 年		1.3	0.4	2.7
	7 月	1.5	0.5	2.9
	8 月	1.3	0.5	2.8
	9 月	1.4	0.7	2.9
	10 月	1.5	0.9	2.6
	11 月	1.6	1.0	2.5
	12 月	1.8	1.4	3.0
2017 年	1 月	2.3	1.7	3.2
	2 月	2.4	1.9	3.7
	3 月	2.6	1.8	3.9
	4 月	2.3	1.9	3.7
	5 月	2.1	1.6	3.6
	6 月	1.9	1.3	3.5
	7 月	2.1	1.5	3.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6 年		2.1	0.4	4.3			
	7 月	1.8	-0.1	4.2	51.0	52.1	51.5
	8 月	2.4	0.9	4.3	50.7	52.0	51.1
	9 月	2.4	0.6	3.9	51.0	52.0	51.4
	10 月	1.8	0.6	4.3	51.9	53.5	52.8
	11 月	3.0	2.0	4.8	52.0	53.3	53.0
	12 月	4.2	2.7	5.1	52.7	53.9	53.7
2017 年							
	1 月	3.6	1.2	5.4	52.7	53.6	54.0
	2 月	3.6	2.4	4.9	52.9	54.1	54.1
	3 月	4.2	2.6	5.9	53.0	54.2	54.2
	4 月	4.2	2.8	5.6	52.7	53.6	53.6
	5 月	4.8	3.3	6.3	52.6	53.5	53.6
	6 月	4.2	3.1	6.0	52.6	53.2	53.3
	7 月				52.7	53.1	53.6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 年		2.9	3.6	1.4
	3 季度	1.6	2.8	1.2
	4 季度	0.5	2.7	0.3
2016 年		1.5	2.7	0.8
	1 季度	0.6	1.8	1.8
	2 季度	2.2	3.8	-0.9
	3 季度	2.8	2.8	0.5
2017 年	4 季度	1.8	2.9	0.2
	1 季度	1.2	1.9	-0.6
	2 季度	2.6	2.8	0.7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9	0.4	5.0
	3 季度	3.4	-4.0	1.7
	4 季度	-2.4	-2.3	0.0
2016 年		0.7	-0.3	1.3
	1 季度	-0.2	-2.6	-0.2
	2 季度	1.4	2.8	0.4
	3 季度	1.5	6.4	2.7
2017 年	4 季度	1.7	-3.8	8.1
	1 季度	8.1	7.3	4.3
	2 季度	2.2	4.1	2.1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 年		2.9	3.6	1.4
	3 季度	2.4	3.6	1.4
	4 季度	2.0	3.0	1.6
2016 年		1.5	2.7	0.8
	1 季度	1.4	2.6	1.7
	2 季度	1.2	2.8	0.6
	3 季度	1.5	2.8	0.4
2017 年	4 季度	1.8	2.8	0.4
	1 季度	2.0	2.9	-0.2
	2 季度	2.1	2.6	0.2

表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9	0.4	5.0
	3 季度	3.1	0.0	5.6
	4 季度	2.4	-1.8	2.9
2016 年		0.7	-0.3	1.3
	1 季度	1.3	-1.3	1.2
	2 季度	0.5	-1.6	0.5
	3 季度	0.1	1.0	0.7
	4 季度	1.1	0.6	2.7
2017 年				
	1 季度	3.2	3.1	3.8
	2 季度	3.4	3.4	4.2

注: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8、表9)。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8、表9)。

表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6 年					
	7 月			4.9	29.1
	8 月			4.9	17.6
	9 月	3.3	0.1	5.0	24.9
	10 月			4.9	12.4
	11 月			4.6	16.4
	12 月	1.8	1.1	4.7	15.5
2017 年					
	1 月			4.8	21.6
	2 月			4.7	23.2
	3 月	-0.6	1.1	4.5	5.0
	4 月			4.4	17.4
	5 月			4.3	14.5
	6 月			4.4	23.1
	7 月			4.3	20.9

注: 除年度数据以外,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6 年	22121		-2.2	27126		-1.8	-5006
6 月	1827	0.8	-4.0	2278	1.9	-2.4	-451
7 月	1864	2.0	-1.9	2261	-0.7	-1.7	-397
8 月	1883	1.0	0.9	2288	1.2	-1.0	-405
9 月	1902	1.0	1.4	2262	-1.1	-1.0	-360
10 月	1864	-2.0	0.4	2290	1.2	0.8	-426
11 月	1860	-0.2	1.3	2315	1.1	3.0	-455
12 月	1910	2.7	4.3	2353	1.6	4.8	-443
2017 年							
1 月	1915	1.1	7.2	2403	2.6	8.2	-488
2 月	1917	0.1	6.0	2366	-1.5	4.6	-449
3 月	1915	-0.1	6.4	2367	0.1	9.0	-453
4 月	1912	-0.1	5.1	2388	0.9	8.4	-476
5 月	1920	0.4	5.4	2384	-0.1	6.6	-464
6 月	1944	1.2	5.8	2380	-0.2	4.6	-436

注: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 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4658	2626	2032
	2 季度	986	703	284
	3 季度	574	485	89
	4 季度	636	589	47
2016 年		4571	2807	1764
	1 季度	1414	777	637
	2 季度	1617	762	855
	3 季度	1091	889	203
	4 季度	448	379	69
2017 年				
	1 季度	790	1117	-327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 年		2.0	1.8	1.3
	3 季度	0.4	0.5	0.4
	4 季度	0.4	0.4	0.6
2016 年		1.8	2.1	1.8
	1 季度	0.5	0.6	0.7
	2 季度	0.3	0.5	0.3
	3 季度	0.4	0.4	0.2
	4 季度	0.6	0.4	0.3
2017 年				
	1 季度	0.5	0.4	0.3
	2 季度	0.6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2	6.6	6.8
	2 季度	0.1	1.2	0.9
	3 季度	0.9	0.5	1.2
	4 季度	1.3	0.8	1.5
2016 年		4.2	3.3	4.6
	1 季度	0.2	0.5	0.4
	2 季度	2.7	1.3	1.9
	3 季度	-0.1	0.4	0.4
	4 季度	1.4	1.6	1.9
2017 年				
	1 季度	-0.5	1.2	0.5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6 年			0.4	43.8	10.0
	6 月	0.0	0.9	55.6	10.1
	7 月				10.0
	8 月				9.9
	9 月	0.1	0.3	46.6	9.9
	10 月				9.8
	11 月				9.7
	12 月	0.2	0.1	55.5	9.6
2017 年					
	1 月				9.6
	2 月				9.5
	3 月	0.1	1.1	66.0	9.4
	4 月				9.2
	5 月				9.2
	6 月				9.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 年		2.0	1.8	1.3
	3 季度	1.9	1.9	1.2
	4 季度	1.9	1.8	1.6
2016 年		1.8	2.1	1.8
	1 季度	1.7	2.0	2.0
	2 季度	1.7	2.0	2.0
	3 季度	1.7	1.9	1.7
	4 季度	1.9	1.9	1.5
2017 年				
	1 季度	1.9	1.6	1.1
	2 季度	2.2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2	6.6	6.8
	2 季度	2.8	7.2	6.6
	3 季度	3.1	5.9	6.4
	4 季度	3.8	5.3	6.5
2016 年		4.2	3.3	4.6
	1 季度	2.6	3.0	4.1
	2 季度	5.3	3.1	5.1
	3 季度	4.2	3.0	4.3
	4 季度	4.2	3.7	4.7
2017 年				
	1 季度	3.5	4.5	4.8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年份	月份		(%)	(%)		(%)	(%)	口额
2016 年		20477		0.2	17758		-1.3	2719
	6 月	1802	0.3	-1.4	1513	2.5	-4.1	289
	7 月	1676	-0.7	-9.4	1428	0.8	-7.8	248
	8 月	1606	3.1	8.6	1431	0.9	4.4	175
	9 月	1771	-0.9	2.3	1527	-0.6	-1.1	244
	10 月	1726	0.0	-4.5	1530	2.0	-3.0	196
	11 月	1835	3.3	5.5	1593	2.3	5.6	242
	12 月	1792	2.0	6.2	1515	1.4	4.9	277
2017 年								
	1 月	1634	-1.0	12.8	1648	3.9	17.7	-14
	2 月	1715	0.8	5.1	1551	-1.0	7.0	164
	3 月	2053	2.3	14.6	1763	0.5	16.8	291
	4 月	1689	-1.7	-1.6	1521	-0.3	4.2	167
	5 月	1907	2.3	13.6	1704	2.5	17.9	203
	6 月	1872	-1.9	3.9	1607	-4.1	6.2	266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562	4143	- 3581
	6 月	- 133	- 109	- 24
	7 月	- 35	158	- 193
	8 月	141	606	- 465
	9 月	- 519	- 55	- 464
	10 月	246	959	- 713
	11 月	223	516	- 293
	12 月	- 451	73	- 524
2017 年	1 月	913	1082	- 169
	2 月	949	951	- 2
	3 月	106	228	- 122
	4 月	74	276	- 202
	5 月	152	229	- 77
	6 月	47	- 397	444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5 年		1.1	- 0.3	1.7
	3 季度	0.2	0.6	0.4
	4 季度	- 0.2	- 0.6	0.7
2016 年		1.0	0.4	1.3
	1 季度	0.6	0.3	1.4
	2 季度	0.3	0.1	- 1.3
	3 季度	0.3	0.4	0.2
	4 季度	0.4	0.1	0.0
2017 年	1 季度	0.4	0.4	- 0.1
	2 季度	1.0	0.9	0.3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0.1	2.9	0.8
	3 季度	0.4	2.4	2.5
	4 季度	- 0.2	- 0.4	- 0.3
2016 年		0.9	1.2	- 2.3
	1 季度	0.3	0.0	- 2.0
	2 季度	0.7	- 0.9	- 1.2
	3 季度	0.2	2.1	- 0.2
	4 季度	0.9	3.1	1.4
2017 年	1 季度	0.8	1.9	1.3
	2 季度	2.8	- 0.5	1.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5 年		1.1	- 0.3	1.7
	3 季度	2.0	1.3	1.6
	4 季度	0.9	0.0	2.2
2016 年		1.0	0.4	1.3
	1 季度	0.5	- 0.1	2.7
	2 季度	0.9	0.4	1.2
	3 季度	1.1	0.3	1.0
2017 年	4 季度	1.7	1.0	0.3
	1 季度	1.5	1.1	- 1.1
	2 季度	2.0	1.8	0.5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0.1	2.9	0.8
	3 季度	1.4	2.9	1.8
	4 季度	0.1	- 0.5	0.6
2016 年		0.9	1.2	- 2.3
	1 季度	- 0.7	- 1.4	- 2.4
	2 季度	1.6	0.7	- 1.1
	3 季度	1.1	0.8	- 3.6
	4 季度	2.0	4.6	- 2.0
2017 年	1 季度	2.3	6.6	1.2
	2 季度	5.2	6.6	3.9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6 年		- 0.4	2.06	3.1
	6 月	- 2.4	2.03	3.1
	7 月	- 2.8	2.03	3.0
	8 月	5.1	2.07	3.1
	9 月	0.3	2.10	3.0
	10 月	- 2.2	2.11	3.0
	11 月	4.4	2.15	3.1
	12 月	1.3	2.19	3.1
2017 年	1 月	3.9	2.13	3.0
	2 月	3.4	2.12	2.8
	3 月	4.7	2.13	2.8
	4 月	5.1	2.13	2.8
	5 月	3.7	2.31	3.1
	6 月	3.9	2.25	2.8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2016 年	700358		-7.4	660420		-15.8	39938
7 月	57284	-1.7	-14.0	52239	-0.1	-24.6	5045
8 月	53164	0.3	-9.6	53510	-0.7	-17.0	-346
9 月	59689	0.7	-6.9	54824	1.9	-16.1	4866
10 月	58702	1.8	-10.3	53891	0.1	-16.3	4812
11 月	59564	4.0	-0.4	58099	4.1	-8.7	1465
12 月	66789	2.1	5.4	60430	3.2	-2.5	6359
2017 年							
1 月	54220	0.9	1.3	65139	3.7	8.4	10919
2 月	63475	6.7	11.3	55364	-1.1	1.3	8111
3 月	72296	-4.2	12.0	66193	3.5	15.9	6103
4 月	63294	-0.6	7.5	58503	-0.4	15.2	4792
5 月	58512	0.3	14.9	60576	0.3	17.9	-2064
6 月	66084	-0.6	9.7	61686	0.3	15.5	4398
7 月	64949	2.8	13.4	60761	-1.2	16.3	4188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38307	183930	-145623
	6 月	12607	17259	-4652
	7 月	18142	22909	-4767
	8 月	-12931	-14142	1211
	9 月	-462	44740	45202
	10 月	-68	15478	-15546
	11 月	5688	12014	-6236
	12 月	654	21720	-21066
2017 年				
	1 月	-75	10964	-11039
	2 月	2176	24160	-21984
	3 月	2497	26252	-23755
	4 月	3171	7829	-4658
	5 月	1480	17662	-16182
	6 月	652	15267	-14615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5 年		0.9	2.2	1.3	-3.8	7.7	-3.3
	3 季度	0.8	1.8	0.9	-4.5	8.4	-3.2
	4 季度	0.4	1.7	0.6	-5.8	7.4	-3.8
2016 年		1.5	1.8	0.3	-3.6	7.9	-0.2
	1 季度	1.3	1.6	-0.6	-5.4	9.2	-0.4
	2 季度	1.1	1.7	0.3	-3.6	7.9	-0.5
	3 季度	1.5	2.0	0.7	-2.9	7.5	-0.4
	4 季度	2.0	1.9	0.7	-2.5	7.0	0.3
2017 年							
	1 季度	2.3	2.0	1.0	-0.4	6.1	0.5
	2 季度		1.7				2.5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5 年		2.8	2.6	2.4	0.8	5.0	4.9
	3 季度	3.0	2.8	2.3	-0.7	4.7	4.8
	4 季度	3.2	2.5	1.9	-0.8	4.6	5.2
2016 年		2.8	2.3	1.9	1.5	4.2	5.0
	1 季度	2.9	2.2	1.0	-0.2	4.1	4.9
	2 季度	3.4	2.6	1.8	1.1	4.0	5.2
	3 季度	2.6	2.0	2.0	2.1	4.3	5.0
	4 季度	2.4	2.3	3.2	2.9	4.5	4.9
2017 年							
	1 季度	2.9	2.8	4.3	2.6	5.6	5.0
	2 季度	2.7	1.8	3.8	2.1	5.8	5.0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6 年		7.0	4.9	11.3	5.5	26.7
	7 月	6.9	4.9	11.6	5.3	
	8 月	7.0	4.9	11.8	5.2	
	9 月	7.0	4.8	11.8	5.2	27.1
	10 月	7.0	4.8	11.8	5.4	
	11 月	6.8	4.8	11.9	5.4	
	12 月	6.9	4.8	12.0	5.3	26.5
2017 年						
	1 月	6.8	4.7	12.6	5.6	
	2 月	6.6	4.7	13.2	5.6	
	3 月	6.7	4.6	13.7	5.4	27.7
	4 月	6.5	4.6	13.6	5.3	
	5 月	6.6	4.5	13.3	5.2	
	6 月	6.5	4.4	13.0	5.1	27.7
	7 月	6.3			5.1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6 年		3.7	3.9	3.4	3.9	3.5
	7 月	3.6	4.0	3.4	4.0	3.5
	8 月	3.8	4.0	3.4	4.0	3.5
	9 月	4.0	4.1	3.4	3.9	3.5
	10 月	3.7	3.7	3.4	3.9	3.5
	11 月	3.6	3.5	3.3	3.8	3.4
	12 月	3.5	3.4	3.3	3.8	3.5
2017 年						
	1 月	3.6	3.6	3.3	3.8	3.5
	2 月	4.0	3.4	3.3	3.8	3.5
	3 月	3.7	3.2	3.2	3.8	3.4
	4 月	4.0	3.5	3.2	3.8	3.4
	5 月	3.6	3.6	3.2	3.8	3.4
	6 月	3.8	3.3	3.1	3.8	3.4
	7 月	3.6	3.4	3.1	3.8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3902	4030	-128	4093	6367	-2274
6 月	331.8	359.6	-27.8	350.4	572.0	-221.6
7 月	302.8	322.5	-19.7	314.4	524.0	-209.6
8 月	337.3	357.4	-20.1	308.1	544.5	-236.5
9 月	339.4	364.0	-24.6	334.4	601.4	-267.1
10 月	337.6	339.7	-2.2	330.4	489.7	-159.3
11 月	348.0	332.5	15.5	360.3	534.1	-173.8
12 月	339.5	315.0	24.5	391.5	477.0	-85.4
2017 年						
1 月	338.1	317.4	13.6	349.9	474.3	-124.4
2 月	323.2	324.6	-1.4	338.1	478.9	-140.8
3 月	372.2	372.1	0.1	388.0	560.9	-172.9
4 月	337.9	346.7	-8.8	336.4	485.7	-149.3
5 月	366.2	374.0	-7.8	378.3	523.7	-145.3
6 月	360.6	383.4	-22.8	361.7	534.8	-173.1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751	750	1	1853	1435	418
7 月	62.9	62.6	0.3	163.3	122.5	40.8
8 月	65.2	71.7	-6.5	169.9	134.1	35.8
9 月	70.7	65.8	4.9	158.0	125.2	32.8
10 月	63.5	65.9	-2.4	137.2	118.7	18.5
11 月	71.3	72.4	-1.1	165.2	119.6	45.6
12 月	67.6	58.7	8.9	159.4	120.4	39.0
2017 年						
1 月	59.3	67.5	-8.2	149.1	127.3	21.8
2 月	66.0	62.2	3.9	154.7	114.0	40.7
3 月	77.8	69.4	8.4	200.9	135.3	65.5
4 月	67.3	63.7	3.6	176.9	111.8	65.0
5 月	77.3	71.9	5.4	197.9	126.6	71.3
6 月	79.1	70.8	8.3	197.9	131.4	66.5
7 月				187.7	130.1	57.6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2642	3596	-954	2818	1914	904
7 月	216.5	295.0	-78.4	224.6	161.3	63.4
8 月	215.8	291.6	-75.8	232.0	184.5	47.5
9 月	228.8	319.9	-91.1	254.3	179.9	74.4
10 月	234.2	338.1	-103.8	249.0	183.0	66.0
11 月	200.8	327.4	-126.6	266.5	175.1	91.4
12 月	239.6	342.2	-102.5	311.3	192.9	118.3
2017 年						
1 月	222.9	319.2	-96.4	251.2	136.8	114.4
2 月	255.4	332.3	-76.9	257.5	155.8	101.7
3 月	291.5	396.7	-105.2	313.3	187.3	126.0
4 月	246.4	381.1	-134.8	261.0	180.9	80.0
5 月	240.2	378.6	-138.4	281.7	196.5	85.2
6 月	235.6	365.2	-129.6	295.2	208.3	86.9
7 月	225.4	339.9	-114.5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4954	4062	892	3739	3975	-236
6 月	452.1	338.9	113.2	319.5	333.4	-13.9
7 月	408.8	333.7	75.1	297.7	324.5	-26.8
8 月	401.3	351.0	50.2	324.5	352.7	-28.2
9 月	408.5	339.9	68.6	327.0	351.5	-24.5
10 月	419.8	350.5	69.3	326.0	344.1	-18.2
11 月	453.1	372.4	80.7	343.4	352.0	-8.6
12 月	450.7	383.0	67.7	331.9	341.3	-9.4
2017 年						
1 月	402.8	375.2	27.6	273.2	316.7	-43.6
2 月	431.8	361.5	70.3	313.4	314.4	-0.9
3 月	486.5	425.8	60.7	360.5	371.1	-10.6
4 月	508.7	380.0	128.7	317.5	317.3	0.2
5 月	450.3	393.5	56.8	354.7	375.4	-20.7
6 月	514.1	400.1	114.0	356.1	365.1	-9.0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5167	5473	-306	2804	2309	495
7 月	461.8	467.0	-5.1	241.0	205.2	35.8
8 月	435.6	456.3	-20.8	246.5	206.7	39.8
9 月	470.1	498.4	-28.3	225.6	181.9	43.7
10 月	447.8	484.9	-37.1	267.4	223.6	43.8
11 月	494.4	513.7	-19.3	253.3	210.2	43.1
12 月	476.3	542.1	-65.8	257.0	208.3	48.6
2017 年						
1 月	405.3	421.9	-16.6	237.4	202.5	35.0
2 月	355.5	403.9	-48.4	226.7	193.0	33.7
3 月	485.2	506.1	-20.9	257.1	217.8	39.3
4 月	447.8	456.7	-8.9	243.2	215.3	27.8
5 月	430.3	471.1	-40.8	255.2	220.7	34.6
6 月	491.8	525.2	-33.4	258.3	200.0	58.3
7 月				271.1	217.4	53.7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1894	1684	210	1445	1357	88
7 月	148.9	144.2	4.7	95.3	90.2	5.1
8 月	167.8	146.7	21.1	127.5	123.9	3.6
9 月	165.6	147.2	18.4	125.7	113.0	12.7
10 月	165.6	142.3	23.4	127.4	115.1	12.4
11 月	168.0	147.2	20.8	135.0	126.7	8.3
12 月	169.4	149.8	19.6	138.3	127.8	10.5
2017 年						
1 月	157.6	146.9	10.6	134.0	119.7	14.3
2 月	161.5	141.8	19.6	126.1	113.5	12.6
3 月	186.1	174.0	12.2	146.8	132.8	14.0
4 月	167.6	148.0	19.7	132.8	119.5	13.3
5 月	184.1	171.3	12.7	143.5	137.7	5.8
6 月	170.9	147.8	23.1	116.6	99.9	16.6
7 月				136.2	138.9	-2.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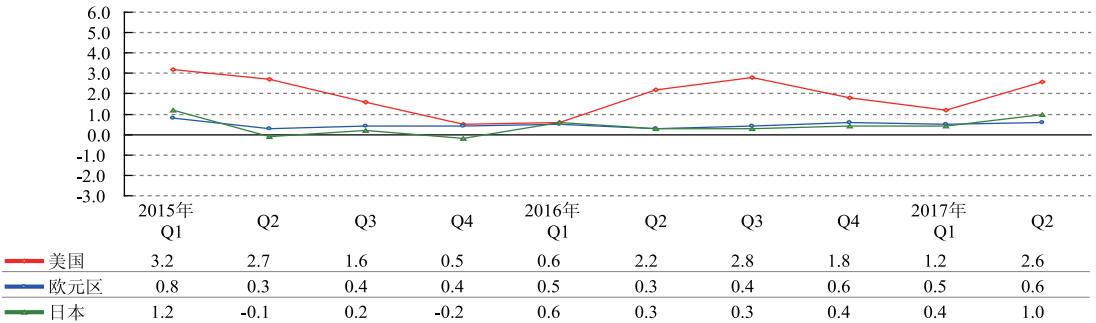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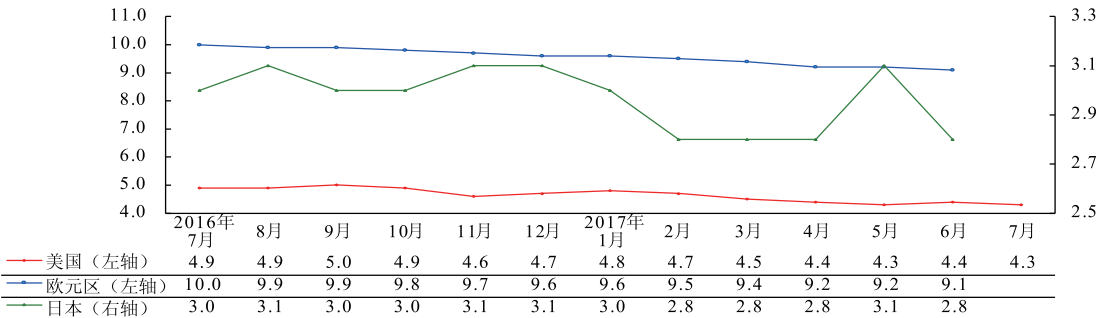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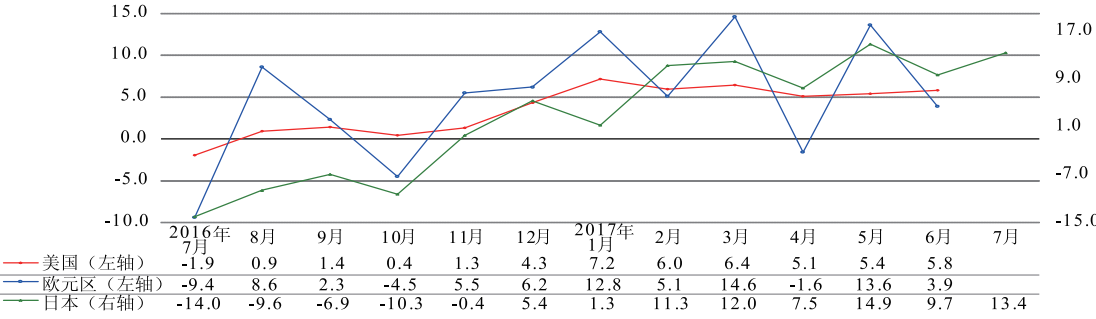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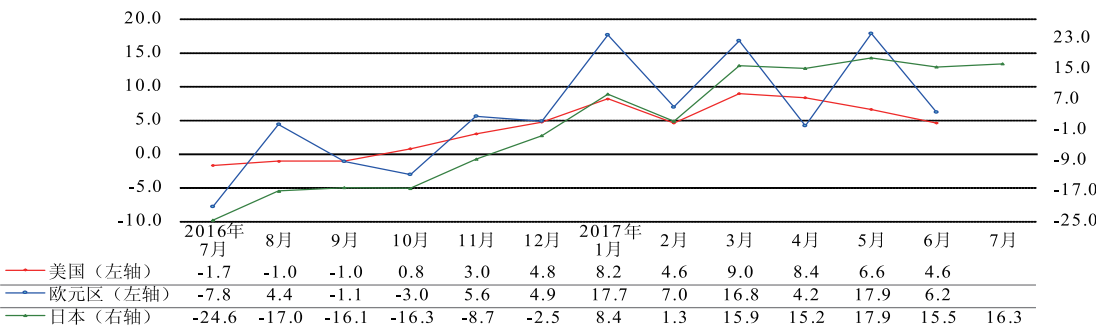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 Deepening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djustment of globalization

Zeng Peiyan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y has shown signs of recovery, but it is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ies, of which the Asian economies will bear the brunt. Globaliz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engine of Asian economies for decades, which have created several rounds of “Asian economic miracles”. As a historical tre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not reverse or end.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deepening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ll be an effective way for Asia to adapt to globalization adjustment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provide new ideas and new impetu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specially inserting a powerful wings to build upgraded version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2) Reform: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forty years of China’s reform

Gao Shangquan

On the eve of the upcoming nineteenth CPC congress,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enterprise is about to usher in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node of 40th anniversary. Nearly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ese socialism in China, after undergoing the four stages of “target exploration”, “framework construction”, “system improvement” and “one of the fiv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reform promoted five changes for the whole country, from taking class struggle as the key link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enter,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from closing the border to all – round opening up, from the rule of man to the rule of law, from poverty to fairly well – off, state and society have changed a lot, and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has made indelible achievements. Chinese’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still facing with challeng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he rule of law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and nearly 4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s an important weapon for us to continue making victory for the great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is Chinese socialism.

(3) Reconsideration of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Fan Hengsha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during the crucial period when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new normal and moved toward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 – off society in an all – round way. Since the eighteenth CPC congress,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been put in a more prominent position with good

momentum, but restricted by the foundation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still faced with the grim situation. To promote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we need high – level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advance. Especially for a number of issue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we should study in depth, raise awareness and clarify ideas. At present, China’s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we should focus on some key work including closely linking to the elimination of dual economic system,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realiz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4)Brief analysis of economic oper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Xu Xianchu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China economy consolidated the good development trend of steady progress. From the production point of view, the third industry plays a major role in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three industries together push quicker economic growth than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grew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total capital formation growth rate was dropped significantly, net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changed from decline to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the nation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maintained a steady and rapid growth, the growth rate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the general public budget revenue growth picked up; 1~5 months, the growth of total profit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from the price point of view, the consumer price increase narrowed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industrial producer prices and import prices rose significantly; from the view of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demand structu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continued to impro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nergy,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high – tech manufacturing, new products, online retail sales were in the rapid growth with new energy continuing to accumul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 tasks, “three elimination one drop one subsidy” has made new progress

(5)Chinese software exports: status, trend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ang Xiaohong

At present, although China’s software exports change from high – speed growth to medium and low growth, but the overall size and strength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port structure showe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the value chain developed towards high – end. The software export market has formed a glob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oftware exporting enterprises has been enhanced, and the structure of software talents has been on the knowledge and high – en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export of software in China, such as the overall increase in cost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nd a large gap in talents. In 2017 China software export is still facing favor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new technologies, , new industries, new models becom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global software industry growth and innovatio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markets have two – way expansion of space, the domestic software industry is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improved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expanding exports. In the future, to promote China’s software exports, we should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software enterpris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system for being a software powerful country, actively expand the market space for software exports, and

optimize the software export policie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6) A study on promoting cross—border use of RMB in key areas along the border

Zhou Xianping, Zhu Xinrong, Zhang Jian, Qiu Longyu

The use of RMB in cross – border transactions in key areas along the border is an important field and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s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Yunnan border and finance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area, Ruli city initiated innovation in three areas of the channel construction for the bank settlement of cross – border, China – Myanmar border currency exchange, bank cooperation in cross –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and promote the use of RMB in the cross – border trad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of the use of RMB for the cross border trade in key areas, the practice of Ruili, in terms of th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pilot, risk control, and steadily push forward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key areas in the border to promote cross – border use of the yuan.

(7) Border effect of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five provinces (regions) of Northwest China and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Based on relevant data and gravity model analysis from 2010 to 2015

Yu Qian and Wang Yanyun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boundary effect and fiv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regions) in China and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s the main bo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oundary effect of sub –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First, it analyzes the sub –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tatus between Chinese fiv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regions) and the fiv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then, it measures the border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ased on 2010 – 2015 related data and boundary effect model, produc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high shielding effect and relevant explanations; finally, it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weaken the shielding boundary effect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8) Innovation of trade supervision system: experience summarization and route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FTA in four areas——Based on the view of trade facilitation

Wang Zhenzhen and Gan Yujiao

The convenience of customs clearance i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trade facilitation” in the FTA pilot area,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free trade zone strategy. With the foundation of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Tianjin, Fujian and Guangdong FTAs, around the trade customs clearance facilitation construction, together with Shanghai FTA, launched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This paper car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three mutual” customs clearance system in four FTA test areas, international trade “single window” platform and innovative clearance and regulatory system,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single window” construction mode, deepen three mutual customs clearance reform, speed up integration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customs clearance, continue to promo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form efficient clearance mechanism.

Editor: Huang Yongfu